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年 第5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国别与区域研究

- 3 赵可金, 刘 军 /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空间——赵可金教授访谈
- 31 刘 娟 / 一级学科背景下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构想——基于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经验

中国与中亚 30 年

- 52 许 涛 / 从维护睦邻安邻关系到构建安全共同体——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 30 年
- 74 李建民 / 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 30 年——政策演进、重点领域进展及未来发展路径

大国关系研究

- 95 宋 伟 / 追求承认的斗争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
- 118 焦一强, 丁传彪 /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与俄罗斯关系变化态势、动因及影响

俄罗斯政治研究

- 148 费海汀 / “权力再集中”：俄罗斯政治趋势分析
- 170 朱积慧, 杨康书源 / 俄罗斯的复合型政党体制与政治韧性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本期执编：张 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 年 10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 年第 5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о Кэцинь, Лю Цзюнь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ая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Чжао Кэцинь (3)

Лю Цзюань

Концепци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модели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ю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ю в условиях дисциплин первого уровня: С учётом опыта построения учебной дисциплины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ах (31)

Сюй Тао

От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сообществ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30 ле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52)

Ли Цзяньминь

30 л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ей: 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ки, прогресс в ключевых областях и будущие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74)

Сун Вэй

Борьба за признание и изменение миров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95)

Цзяо Ицян, Дин Чуаньбяо

Измен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ША, Европой и Россией после вступления Байдена в должность (118)

Фэй Хайтин

«Пере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власти»: анализ тенден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48)

Чжу Цзихуэй, Ян Канишюань

Смешан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170)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2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o Kejin, Liu Jun

Academic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Space of Area Studie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Zhao Kejin (3)

Liu Juan

The Concept of China's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as a First-tier Discipline: Based on Experience of Russ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Developing Courses of "Extraterritorial Area Studies"..... (31)

Xu Tao

From Maintaining Good and Safe Neighborly Relations to Build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for Three Decades..... (52)

Li Jianmin

China-Central 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 30 Years: Policy Evolution, Progress in Key Area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aths..... (74)

Song Wei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nd Change of World Politics (95)

Jiao Yiqiang, Ding Chuanbiao

Changes, Motivation and Influenc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Europe and Russia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118)

Fei Haiting

"Power Reconcentration":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Trends in Russia (148)

Zhu Jihui, Yang kangshuyuan

Russia's Compound Party System and its Political Resilience (170)

国别与区域研究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空间 ——赵可金教授访谈*

赵可金 刘 军**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学是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的一级学科，是关于一国对其外部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事实上，区域国别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只不过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之下分散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世界历史和外国语言文学等众多学科之中。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知识和实践的发展，都要求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单独的一级学科，承担起中国与世界关系相关的知识建构、文化阐释、咨政建言和社会服务功能。从学科内涵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融合多学科资源、致力于自主构建域外知识体系的学问。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底蕴的国家，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应具有自身特色。建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需要借鉴既有的文明主义、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范式，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方法，努力建设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每个学校都应立足自身优势学科基础，创造性地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方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学科建设 新文科 交叉学科 国别与区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D5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5-0003(28)

* 为响应关于加强和改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精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编辑部于2022年10月5日对赵可金教授进行了电话采访。本文根据访谈记录整理而成，并经过赵可金教授本人的审阅认可。

**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长聘教授，教育部国别区域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军，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战略意义与学科定位

刘军：2022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在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为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 1407，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这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增设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的战略意义？设立区域国别学有着怎样的深层考虑？

赵可金：设立区域国别学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批示的精神、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加快推进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既符合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的知识逻辑，也符合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逻辑。

从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的知识逻辑来看，建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最主要动力是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交叉融合。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知识成长的逻辑越来越从片面强调专业细分向系统整合转变，基于学术工业化（Academic Industry）的知识逻辑也日益向学术生态化（Academic Ecology）的知识逻辑转变。在此背景下，鼓励学科交叉融合、跨界创新，越来越成为知识进步的强大动力。

长期以来，大量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学科已经存在，比如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区域学研究，世界历史一级学科中的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以及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中的世界经济等。所有这些相关学科在各自一级学科的框架内都对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进行了很好的探索。然而，在传统学科泾渭分明的框架下，区域国别学的相关学科受到各自一级学科标准、规范和研究布局的限制，不利于知识资源的立体化整合，不免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不利于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知识创新。

从知识创新的逻辑出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最主要动力来自在学科建设上的反对“两个霸权”与借助“两个优势”。所谓“两个霸权”，

其中一个指的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英语霸权。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处于英语语言文学的霸权之下。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中国域外知识体系构建长期受制于英美世界的视角，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受限。因此，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的建立可以为非英语学科、非通用语种视角的知识成长提供学科空间。另一个学科霸权指的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政治学理论霸权。冷战结束后，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一支强劲的域外知识体系力量，但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在学科资源分配方面却一直处于被挤占状态，导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一直在推动将其建设为一级学科，但一直没有成功。区域国别学的成立无疑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促进知识发展的新平台。

同时，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还需充分释放“两个优势”。其中一个优势是理论经济学优势。理论经济学是一门发展比较成熟的学科，学科容量大且资源丰富。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有利于迅速壮大区域国别学的阵容，并为区域国别学建设提供强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支持。第二个优势是史学优势，世界史、区域史和国别史研究学术积淀深厚，无论是学科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可以为区域国别学的建设提供巨大支持。因此，如何发挥两个学科的优势，助力挑战英语语言文学霸权和政治学理论霸权，是今后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

从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逻辑来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主要服务于中国“走出去”过程中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强调基于实践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攀升，却面临技术上的“卡脖子”和话语上的“哑嗓子”两个问题。因此，中国需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各类人才以应对各类挑战，这一切都急需区域国别学的武装。无论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还是在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方面，都越来越强调此种实践逻辑，要求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专业建设。

近期来看，区域国别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专业设置方面考虑新时期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向。目前，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一个重大机遇就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经批准设置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与已有学科重点培养学术型人才相比，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更看重培养具备一定实践经验的专

业型人才，区域国别学在短期内要勇于申请国际事务专业硕士来培养具有国际胜任力的人才。在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还未建设完备的情况下，遵从实践逻辑培养中国国际化战略需要的各类人才，可能是一个增长点，而且也不会对其他学科形成太大的挑战，对于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来说是比较有利的选择。

刘军：适应中国日益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客观需要，区域国别学应运而生。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是大国的标配，只要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就必然要求重视区域国别学，必然强调培养国别区域人才的战略意义，不断夯实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学术基础和学科基础。您认为，新设立的区域国别学承担着怎样独特的学科功能？

赵可金：区域国别学的确是国别的标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国家不必建设区域国别学。只要作为人类社会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也必然会关心域外世界。要而言之，作为一门域外世界知识建构的学问，区域国别学承担了针对某一特定区域国别生产学术知识和为本国提供咨询建议、塑造政府政策的双重功能。按照服务领域和对象划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知识建构功能。

知识建构是区域国别学的首要功能。所谓知识建构，是指人们通过累积相关经验材料，通过一定方法加工整理后，形成内在、本质和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并以此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工具。区域国别学能够帮助人们准确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取和积累必要的知识，成为人们应对和处理各种问题和挑战的强大工具。

最初，尚未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成为一门学科之前，区域国别学就已经作为一种知识建构的事业在实践中逐步确立。古今中外关于游侠、方士、僧侣、商贾、官员跨境远游、获取新知识和开拓新视野的记载十分丰富。在中国，先秦时期有徐福东渡，汉朝有张骞出使西域，还有东晋法显和唐朝玄奘赴天竺取经。历朝历代留下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诸蕃志》《岛夷志略》《异域录》《东西洋考》《职方外纪》《坤輿图说》等

大量关于域外知识的文献。^①还有近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②所有这些文献都构成了中国早期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对中国对外关系史、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和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在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古代希腊和罗马也都有大量关于异域文化和风土民情的相关记述。尤其是欧洲关于“埃及学”、“东方学”以及“斯拉夫学”等的研究成果，均属于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宝藏。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各自对域外地区的理解，组成了各自的域外知识体系。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苏联热衷于推动区域研究或区域学，依托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起了形式不一且相对独立的学科系所、研究所、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形成了比较研究、国际研究以及区域研究等学科方向，持续推进区域国别学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同时，有的区域国别学还提出了若干理论模型，也推动了学科基础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了大量新理论，例如学者基于拉丁美洲研究提出的依附理论，以及现代化理论、官僚威权主义、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③和格尔兹的“剧场国家”^④等。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期间，亚非拉等一批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建立新兴国家，这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修正和发展既有理论或建立新理论提供了可能性。一个典型案例是，1953年12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建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研究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政治，出版的多部政治发展研究系列丛中很多都成为政治学领域的名著，推动了政治学学科和理论的发展。中国推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首要的是建立自主的域外知识体系，不

① 参见吴玉贵：《佛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赵汝适：《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汪大渊：《岛夷志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图理琛：《异域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意]艾儒略：《职方外纪》，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比]南怀仁：《坤舆图说》，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② 参见魏源：《海国图志》，湖南：岳麓书社，1998年；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③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④ See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337-338.

仅要解决在域外世界知识体系上受制于人的情况，而且也要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的区域国别学知识，这不仅是大国的标志，也是大国的责任。

第二，文化阐释功能。

文化阐释也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功能。所谓文化阐释，是指将某一区域国别的文化进行重新编码、转译、解释，进而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体系所能理解的形态。文化阐释的根本任务是了解和理解其他区域国别的独特性，包容彼此间的差异。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区域国别学为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少数族裔研究、族群研究以及一系列文化研究项目奠定了制度基础，大量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有了快速发展。区域国别学与文化研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汇集成域外研究的强大力量。

近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步入民族国家时代，原本相互隔绝的不同大陆和海洋被连接为一个整体，过去地方性、局部性的多样文化在全球互联互通进程中频繁接触、碰撞。将各自的文化差异在不同区域国别中进行阐释和转译，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任务。区域国别学是一门针对某一特定国别和区域的外部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和对话过程。无论从人文学科的视角出发，还是走社会科学的路线，区域国别学所做的一切工作在本质上都是致力于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解释、阐释和转译，进而让存在于某一区域国别的独特文化现象易于被其他国别和地区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国别学本身就是跨国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国际关系、比较政治、世界经济和比较文化研究等学科都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都属于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

第三，咨政建言功能。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咨政建言，是区域国别学的内在使命，也是其承担的重要功能。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①只有真正准确地理解敌人和对手，才能更有机会赢得优势和胜利。区域国别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一些国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国别学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① [春秋]孙武著：《孙子兵法》，刘建立译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无论是美国的区域研究，还是苏联的区域学，都具有服务冷战战略需要的使命，一些从事区域国别学的专家学者，也往往是政府决策会议和领导人决策咨询常来常往的座上宾。

当然，区域国别学与政府政策不完全相同。与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区域国别学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完全与政府政策研究“卷”在一起，往往会受制于政治考虑或意识形态约束，这会对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形成制约和束缚。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批评美国的区域国别学与美国战略需要和政府决策走得太近，沦为政府“了解对手”的政治考量，甚至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工具。随着冷战的结束，政府对区域国别学的支持力度大大下降，甚至有人认为区域国别学已经过时，这大大削弱了区域国别学的科学性和自身发展能力。近年来，中国国际化进程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区域国别学也提出了新的战略需要，如何平衡知识建构功能和咨政建言功能，是中国区域国别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四，社会服务功能。

除了咨政建言之外，开展对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最初，区域国别学主要为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行为体开始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活跃角色，这些经济和社会行为体在开展国际化经营和参与国际事务时也有大量的咨询服务需求。为它们提供智力支持和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一项重要职能。

另外，为经济和社会行为体提供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渠道。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20世纪以来，智库，尤其是企业型智库、媒体型智库的兴起，就是区域国别学社会服务职能增强的一个集中体现。为满足企业扩大国际化经营和媒体全球传播的需要，很多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人员和团队，通过为企业、媒体和智库服务，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经费支持，设立了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和课题，而且也通过参与国际活动获得了大量田野调查、一手资料和亲身参与实践的机会，这对于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助力。二战以来，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一些

机构对美国的区域国别学给予了巨大的资金支持，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也设立了大量的情报分析和研究团队，依托智库设立了大量区域国别学项目，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经济和社会组织现实需求以及推动区域国别学科专业发展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加快，中国海外资产已超过 7 万亿美元，每年出入境人数超过 1.7 亿人次。^①中国大学、智库、媒体和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同时，通过加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也是区域国别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使命。

二、学科内涵与中国特色

刘军：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有着清晰的学科内涵和学科边界。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涉及的学科也非常多，如何整合多学科资源，聚焦学科研究对象，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首要课题。同时，区域国别学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比如欧洲国家的东方学、斯拉夫学、汉学等具有鲜明的人文学科特色，俄罗斯的区域学和美国的区域研究都带有很强的战略考虑。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学科发展之路，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请赵老师再讲讲。

赵可金：从学科内涵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融合多学科资源、致力于自主构建域外知识体系的学问，本质上是一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寻根立基之学。置身于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中，一个国家如何睁眼看世界，正确理解和认识其他文明，历来是一个引发各方争论的话题，而且文明之间的对话、摩擦、冲突甚至对抗，被不少思想家称为文明进步的动力。区域国别学的学术源头一直可以溯源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人类文明展露曙光的那一刻起，探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编：《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1 年，第 4 页；“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 2021 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2022 年 1 月 27 日，<https://www.nia.gov.cn/n897453/c1468017/content.html>

求区域国别现象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尚书》《左传》《战国策》《史记》，还是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梨俱吠陀》《政事论》，古代波斯的《治国策》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有大量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论述。^①区域国别研究在本国人眼里是国学，在他国人眼里就是区域国别学，毋宁说区域国别学是一种对“他者”逻辑的理解与认可。

区域国别学受制于跨境交流的程度，即跨境交流越活跃，区域国别学就越具有生命力。千百年来，从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和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②到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世界各地的游记，一直到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关于斯拉夫世界的研究、亚洲和非洲的研究，区域国别学聚集在文明和文化的旗帜下百川入海，渐呈大端。二战后，为服务冷战的战略需要，无论是美国领导的所谓“自由世界”^③，还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④，均掀起了一股服务冷战战略需要的区域国别研究浪潮。它们依托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一大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课题，大量在战争期间曾服务于作战需要的参谋人员、军事人员以及外围从事外语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加入其中，汇集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庞大团队。

尽管区域国别研究在冷战后开始减弱，但总体仍然保持了一定规模。归结起来，所有这些学术努力均围绕着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锁定某一地理、

① 参见《尚书》，顾迁译注，上海：中华书局，2016年；[战国]左丘明著：《左传》，[晋]杜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战国策注释》，何建章注释，上海：中华书局，2019年；[汉]司马迁著：《史记》，杨燕起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21年；[印]摩奴一世著：《摩奴法典》，马香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梨俱吠陀>神曲选》，巫白慧译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92；曾祥裕、魏楚雄：《<政事论>国际政治思想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波斯]尼扎姆·莫尔克著：《治国策》，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② 参见[东晋]法显著：《佛国记》，田川译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唐]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周国林注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③ 参见[美]约翰·伊肯伯里著：《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1-144页。

④ Khrushchev Nikita Sergeevich, et al.,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to the 22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rosscurrents Press, 1961, p.6.

国家/联邦、文化区域，通过开展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借鉴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语言、地理、文学等相关学科，解释国别与区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这一研究传统被称为“区域国别学”（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相比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言，区域国别学除了包括文化研究外，还包括了对某一国别区域的族群（移民）、政治经济、地区合作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探寻国别区域的多样性基因和变革之道，寻找理解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内在规律的学理之基，是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逻辑。具体来说，区域国别学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存在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获得政治经济独立和文化自觉，都有其安身立命之本、发展繁荣之基。区域国别学首先要求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基因，理解其背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逻辑。为什么会建立某一特定国家？为什么会形成明确的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其所赖以立足的根基何在？支撑其生命力的源泉来自哪里？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回答区域国别学的基因和生命力问题。区域国别学基因研究是关于特定国家和地区“从哪里来”的问题，在学术景观上主要是表现为语言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人文学科的相关研究，重在理解其国别和地区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其背后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生命力的核心。

二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内在运行规律是什么？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基因，同时也一直与内外环境进行着物质代谢、信息交流和能量转换，是发展着的活的社会有机体。在同一时代空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社会关系不同，这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战略规划和处世之道。为什么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处事之道？为什么某一社会规律在不同地区会发生变异？导致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什么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为不同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制度景观？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回答区域国别运行规律和变革动力的问题。对于区域国别运行规律和变革动力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国别地区“现在在哪里”的问题，在学术景观上主要呈现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

究，重在理解该国别地区的社会规律和政策走向。

三是多样性的国别地区背后是否存在、或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世界的统一性？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时刻处于变化之中，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处于互动之中。在互动变化之中，各国的多样性在进行交流对话，相互影响，在推动汇入世界统一性整体的同时，也推动其自身向着某一特定方向演化。因此，这些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特定问题领域中的多样性，回答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多样性的模式背后仍然具有内在统一性，进而回答人类社会不同国家地区走向统一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战略等问题。国别区域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主要关注特定国别和地区“向哪里去”的问题，在学术景观上呈现为形形色色的比较研究和对话研究，重在解释某一国别和地区的文化基因及其前进方向。

总之，区域国别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世界多样性和统一性研究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一种全面、综合和复合的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区域国别学是一种全面的研究，既涉及对地理景观和自然规律的研究，也涉及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的研究，世事洞明皆学问。第二，区域国别学是一种综合的研究，其既要求进行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研究，也要求进行个别性特殊性的经验研究；既要检验人类知识的一般科学规律，也要观照人类精神信仰和思想情感的文化价值观认同，始终在科学性和艺术性之间穿梭。第三，区域国别学还是一种复合的研究，其既支持纯理论的研究，也欢迎实践性、政策性的课题，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自由飞翔的使者。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域外知识体系。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核心问题，中国对域外知识体系建设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和强烈。这就要求建立强大的区域国别学科，为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一大批内知国情、外通世界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仍在成长，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了解还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需要一代代人做出崭新的探索和更大的努力。目前，推动建立国别区域研究一级学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统筹下，

应注重域外知识体系的学科建设、学术建设、话语建设和教材建设。

刘军：目前，关于如何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正在引起学界的热议讨论，包括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术单位都先后多次举行学术研讨会，《俄罗斯研究》《国际论坛》等期刊也发表了很多很有分量的论文，大家都在讨论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认为中国应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赵可金：环顾世界，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已取得显著成就，成为世界国别区域研究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要求在域外知识建构上“补课”的态度不同，新时代的区域国别学建设要确立自主创新、开放引领的理念，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融合提炼和自成一家为指导方针，认真解决好谁研究、研究谁、如何研究和为谁研究的基本问题，在国别区域研究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发展之路。

一是坚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谁研究，是界定区域国别学的出发点。只有解决了谁研究的定位问题，才能真正站稳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立场。不同的国家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面临来自域外世界的挑战也存在很大不同，这决定了其关注域外知识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与近代以来中学西学的体用之争、改革开放以来的“不争论”不同，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坚持区域国别学作为中国的域外知识体系的定位，明确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是中国人主导的域外知识体系建设。我们要广泛学习世界上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吸收一切国家的域外知识养分，但必须汇入到中国人主导的区域国别学主流之中，推动区域国别学与国学、全球学的对话交流、深度融通，实现域外知识体系与域内知识体系互联互通，将其共同汇入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伟大复兴进程之中。

二是坚持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研究谁，是界定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只有解决了研究谁的问题，才能明确区域国别学的攻关重点。当今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哪些国家和地区应该优先研究，以及哪些国家可以视作一个地区，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

区域国别学进行合理的顶层设计，集中有限研究资源分清主次轻重。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应坚持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的原则，将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列为区域国别学研究对象，但不囿于已有发达国家的研究图谱，应立足于开放创新的精神，在研究视角、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合理配置，梯次推进。既要聚焦国家战略重点，优先加强对主要大国、重点地区、关键小国的研究，也要侧重支持冷门绝学和基础性研究。既要对象国的基本国情、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族群、宗教等开展全面研究，也要优先加强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的研究。既要重视短平快的智库类和政策类研究，也要关注基础理论、基础学科和基础知识的研究。总之，要不拘一格地开展研究，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培养更多“国别通”“地区通”“中国通”和“全球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三是坚持融合提炼，优势互补。怎么研究，是界定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途径和研究方法。只有解决了怎么研究的问题，才能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工具。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文、史、哲、艺、经、社、政、法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均可对区域国别学做出贡献，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不同国别和区域日益被卷入一个共同漩涡，研究对象一体化和研究方法复合化并行不悖。因此，新时代的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融合提炼和优势互补的原则，推动跨学科融合对话，鼓励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先验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不断推进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建设，为区域国别学提供全面的方法支持。当然，大学、研究机构、智库、民间团体等受制于各自不同的资源基础，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上不免存在侧重，但这些都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坚持体用并举，自成一家。为谁研究，是界定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前进方向和价值标准。只有解决为谁研究的问题，才能明确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必然坚持以中国为中心，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既要能站在中国看世界，也要能站在世界看世界、看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国别学虽有立场之别，却并无门户之见，要打破学术和政

治藩篱，坚持天下一家、自成一体的方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鼓励中国之世界的研究与世界之中国的研究彼此为体、相互为用，实现体用并举、自成一家，真正以开放自信的面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刘军：刚才您提到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要遵循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不过，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已有学科资源和学科基础的借鉴和传承。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独特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自然离不开法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和理论经济学等母学科的支持和滋养，您如何看待区域国别学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基础呢？

赵可金：区域国别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科学研究规划，它经历了发生、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在某一特定阶段上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Paradigm）。“范式”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体系，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体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因此，范式的意义在于确立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等问题。另外，区域国别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作为多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它在特定时期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研究范式。

一是文明主义范式。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无论是上古、中古时期文明古国的皇帝去海外寻求长生不老药方，还是欧亚大陆各方打开丝绸之路的“凿空之旅”，不论是欧洲传教士远赴海外传播教义的不懈努力，还是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大规模船队七次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当时各方对海外知识建构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承载着播撒宗教福音、炫耀天朝鼎盛的文化使

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持节承命的使节、云游四方的游侠、取经布道的僧侣和教士、重利轻义的商贾、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所有这一切对域外知识感兴趣的群体，都不同程度地扮演着“文化搬运工”的角色，这些群体主要以留学生、外国技师、传教士、贸易商、殖民者、观光客为代表，他们将瓷器、茶叶、丝绸、香料、宗教、制度、习俗、观念等传递四方，推动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交融，形成了区域国别学的文明主义范式。作为区域国别学的第一个范式，文明主义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确立了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在本体论上，文明主义范式将区域国别学界定为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在认识论上，文明主义范式坚持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域外知识是人类经验的产物；在方法论上，文明主义范式强调人文学科的方法，强调归纳法和演绎法并重，强调知与行合一。

集中体现文明主义范式的典型案例，是长期持续影响西方人对世界理解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出现在欧洲，是人文学科路线的典型代表，它与欧洲殖民主义活动相伴随而生。当时，殖民者希望了解殖民地的风俗、人情、社会经济与政治，于是出现了对他者的研究，人类学的出现便是这方面的例证，并形成了东方主义的路线。“东方主义”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将其界定为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①在东方主义者看来，东方没有未来，只有西方有未来。因此，东方主义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区域国别学，它对区域国别的研究不是以东方本身为出发点，而是通过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中遇到的问题来理解亚洲、非洲和斯拉夫世界，其实质是承载西方的文化使命，而不是形成关于东方的客观认识。

二是国家主义范式。区域国别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问。18世纪以降，民族国家成为区域国别学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有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宗教和语言研究难以服务战争需要，人文学科的相关研究也过多关注过去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而战争需要区域国别学侧重关注现在和将来的研究，一些情报研究、战场调查、

^① See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p.2-3.

战略战术分析、政策研究等内容开始成为区域国别学的重点，一些原来从事语言学习、外国文学、外国历史、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加入军队情报参谋系统，推动了区域国别学的范式从文明主义转变为国家主义：在本体论上，国家主义范式将区域国别学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研究，区域国别学的相关知识被理解为国家战略资产，一切域外知识均强调服务国家的战略需要；在认识论上，国家主义范式崇尚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域外知识是专业人士理性研究的产物；在方法论上，国家主义范式更推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文明主义范式和**国家主义范式**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以西方的中国研究为例，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中国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以人文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汉学家，这些汉学家通常受过中国语言的训练，或在语言能力基础上具有较好的中国文学及历史知识储备。而后者“中国研究”，则是由费正清创立，以外交、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等为核心的研究。一般而言，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一般不愿被称为汉学家，他们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家，只是碰巧在比较研究过程中选择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而已。这类学者具有良好的某个学科的知识背景，但往往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之不多。他们很少有人能阅读中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二手材料研究中国。此外，区域研究方法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关于演绎和归纳逻辑、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争论。不过，我们必须明确，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区域与国别问题，不可能代替传统的人文式研究，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了解需要将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文明主义范式与国家主义范式的区分只是为了比较二者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并不意味着两者相互否定。

三是全球主义范式。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终结，由战略目的驱动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欧洲和美国开始式微，但在新兴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中国却开始崛起。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区域国别研究的首要目的还是满足和服务国家战略。更重要的趋势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区域国别学越来越被置于全球主义的视角下重新评估，这推动了全球主义范式的崛起。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以多元文化世界为对象，以区域

一体化和区域合作作为新的载体，区域与国别研究将会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推动建立一个全球主义的区域国别学范式。

在全球主义范式的观照下，区域国别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层面都充斥着激烈争论。从本体论来说，全球主义范式关注的对象既包括作为政治体的国家，也包括作为经济体的区域，还包括作为文明体的区域，是区域政治、经济、文明的复合体，一切与之相关的国别和区域议题均可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被重新定义。从认识论来说，全球主义范式既强调理性主义的先验理论，也重视经验主义的经验理论，并试图将两者加以调和成为和谐共处的整体。从方法论来说，全球主义范式强调实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比翼齐飞。迄今为止，全球主义范式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无法像文明主义、国家主义那样存在清晰可辨的轮廓，学科与地区之间的张力，是全球主义范式下的区域国别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为从事区域国别学的学者，尽管可以栖身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但其对于某一地区的兴趣的确是某一学科无法容纳的，故其研究会受到学科范式与地区经验的挤压。因此，对于这些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而言，无论是服务于战略目的的区域研究，还是服务于学科目的的区域研究，都各有利弊。在此种学术张力和学术争论下，真正以区域为本位的研究范式正呈现出新的轮廓。说到底，区域首先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和社会科学概念，事关区域的认同建构问题。为什么特定区域被认定为一个区域？这是区域研究必须围绕的核心问题。区域地理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主义的前景等，都是区域研究令人倾心的话题。

展望未来，要推动建立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区域国别学，需超越现有争论，推动全球化与区域化有机互动、区域国别与学科建设深度融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深度对话，不断完善全球主义范式，开展“以理论为指导并且具有理论相关性的案例研究”（A Theoretically Informed and Theoretically Relevant Case Study），这一路线可能代表区域国别学的未来方向。

刘军：您刚才强调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当中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重要性，区域国别学涉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众多领域，还涉及西方资源与中国本土智慧之间的内在张力，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区域

国别学学科建设上,我们更多是遵循人文学科的路径,还是更多遵循社会科学的路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在区域国别学中的贡献?

赵可金:人文学科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一般来说,人文学科包括“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和艺术,广义的“人文学科”还包括诸如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考古学乃至含有人道主义内容并运用人道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可以为区域国别学提供支撑。然而,历史学对区域国别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做出的贡献最大。读史使人明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域外知识建构的最主要路径。文学、哲学、艺术等学科也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故可以涵盖在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历史学科之中,其所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也对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不同视角会构建不同的历史。尽管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但人类文明最初是分散的,表现为不同国别史和地区史。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别史、区域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史和全球史,从欧美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史学到真正的全球史学,为区域国别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2011 年以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多次围绕有关全球史、区域史或国别史问题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将有关论文集结为 2016 年出版的《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一书,明确提出了全球史/世界史、区域史和国别史的研究路径,既承认各国历史学家观察世界的差异,又努力寻找彼此相容的共识,而且还希望从理论、方法到形式上,探索一个可能的理想型的全球史/世界史。^①毫无疑问,在这一路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重要的学科支撑和学术支撑。

社会科学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之一。社会科学诞生于 18 世纪,狭义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军事学等学科,广义上还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所有这些社会科学学科都对区域国别学有重要意义。从已有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对区域国别学的参与来看,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参与程度最深,理论和方法的

^① 参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2 页。

贡献也最大，同时各学科在理论方法上大同小异，区别不过是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并无本质差异。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学一直受制于西方霸权体系及其知识谱系的影响，被纳入形形色色的发展学框架，缺乏学术自主性。事实上，对承担域外知识建构使命的区域国别学来说，反思性和自主性只是手段，实现区域国别学的本土化才是目的，即建立中国独立的区域国别学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首先，助力区域国别学本土化，必须尊重域外世界客观规律。对中国来说，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均属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中国历来重视经、史、子、集之类的人文素养，对政、经、法、社之类的社会科学缺乏根基。中国的本土文化底蕴意味着更重视语言、文化、历史和哲学，在区域国别学上也是如此，不太重视域外世界的客观规律和知识构建。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首先要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拨开笼罩在域外世界上空的氤氲云霭，还原其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客观规律，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首要之举。

其次，助力区域国别学本土化，必须处理好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围绕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历代学人争论不休，从“体用之争”、“全盘西化”再到“中西融汇”，贯穿始终的问题是如何摆布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在区域国别学上亦是如此。近年来，尽管中国学界一直强烈表达一种平等性、替代性甚至超越性的社会科学意愿，中国官方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豪迈理念，中国学者也在苦心孤诣地以“天下”体系、“关系”思想、“道义”资源来寻求替代区域国别学的新知识框架，但现实是短期内恐怕仍无法“另起炉灶”，既无法完全颠覆西方社会科学规范和基本范式，也无法完全建立起一种令人接受的新知识体系，中国在构建独立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方面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此期间，中学与西学的对话恐怕是一种比较长期的学术现象，结论未必能够在短期内下定。

再次，助力区域国别学本土化，必须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区域国别学是一国的域外知识体系建构，需要明确的“他者叙事”。从表面上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一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实则它更是对本国知识的一

种重新评估和反思，需要在研究他者的同时校正自我，尤其是在面临一些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常识性判断错误时，更要有敢于拿起手术刀进行自我手术的勇气和智慧。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核心还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思维、开放交流、开放对话，在学术交流和对话中获取知识，达成共识，这才是区域国别学的正确方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彼此激荡，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只要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充分汲取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智慧，全面推进区域国别学，就一定能够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宏伟梦想。

四、清华方案与建设实践

刘军：事实上，区域国别学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发展基础。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心、备案中心等数量达到 444 个，分布在 180 多所高校，基本上做到了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全国 20 所高校建有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 26 个。其中，清华大学建设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在推动全国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能否请您谈谈清华大学区域国别学学科的清华方案和建设实践？

赵可金：事实上，清华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与国内兄弟单位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比如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只有英语、日语和法语等少数几个语种。在世界历史一级学科下，区域史、国别史的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相比之下，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是清华大学发展比较快的领域，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尽管清华大学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具有了一定的国际问题研究基础，但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建设则起步于 1993 年 12 月成立的国际政治教研组。教研组由李润海教授任组长，设在人文社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之下。1997 年 1 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际所）成立，薛谋洪大使任所长。2000 年 7 月，阎学通教授调入国际所，先后担任常务副所长和所长，国际所发展加速。2003 年获

教育部批准国际关系二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并开始招收本科生。2007年12月组建国际关系学系（简称国关系），阎学通教授任系主任。2010年10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创立（2015年更名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任院长。2011年3月获教育部批准为政治学一级学科学位点，国际关系二级学科入选北京市重点学科。2012年9月获批建立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同年，国际关系研究院创立世界和平论坛（World Peace Forum），并启动了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和中国政治与对外政策英文硕士项目（CPFP），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了全球政治与经济双硕士项目，创办了苏世民书院全球领导力硕士项目，率先启动了全球治理本科大类方向，全球治理兼修硕士和能力提升证书项目，并于2022年在全国率先自主新增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推出了全球治理英文硕士项目，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基础日益厚实。在近年的QS世界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排名中，清华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稳定位居全球前列，排在大陆高校的第1名。在2017年12月28日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清华大学政治学学科被并评为A-级别，紧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并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交学院（自定）的政治学学科一道进入了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列当中。

清华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还有赖于一系列学科平台的创建。近年来，清华大学大力加强国际化战略，在2016年出台了首份《清华大学全球发展战略》，推动设立了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全球创新学院（西雅图）、中意创意设计基地（米兰）、拉美中心（圣地亚哥）、东南亚中心（巴厘）等海外机构。尤其是在2017年9月创建了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力争成为立足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开展涵盖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亚地区、欧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西亚北非地区六个区域的基础性地区研究。

总体来看，清华大学的区域国别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和国际关系研究院为主导的政治学一级学科内的国际问题研究，尤其是聚焦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以

世界和平论坛为载体，创办了具有国际影响的 SSCI 期刊《中国国际政治季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 CSSCI 期刊《国际政治科学》，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第二部分是以国别与地区研究院主导的交叉学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主要聚焦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角度，或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开展基础性且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受学科框架的限制，清华大学在推动上述两部分的整合方面还没有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框架内展开，推动上述两个板块的融合发展可能是今后的一个主要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清华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已形成鲜明特色，被学界称为“清华路径”，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色。一是世界眼光。清华路径重视对中国和世界现实问题的理论关切，立足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转型与创新等重大现实问题，重视构建普遍化的知识，比如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刘江永教授提出的可持续安全论、赵可金教授提出的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唐晓阳教授提出的进化实用主义理论等。二是中国视角。清华路径重视挖掘中国古典智慧，推动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对话，聚焦对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学理研究，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三是科学方法。重视以学科交叉推动学科创新，突出现代科学方法和大数据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充分利用现有成果和优势，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数据库和国际关系研究数据实验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清华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展望未来，清华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仍将坚持“清华路径”，积极开展同国内外同行的融通对话，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而努力。

五、发展潜力与建设前景

刘军：谢谢赵老师。听了刚才您谈的清华大学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上的探索，很有启发。内容涉及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众多维度，

尤其是清华大学坚持世界眼光、中国视角和科学方法的“清华路径”，令人印象深刻。清华大学在发展中国博士项目的先行先试也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青年才俊，这是对区域国别学的重要贡献。展望未来，您如何判断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潜力和建设前景？

赵可金：观察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观察。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兴起，既是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产物，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革的产物。无论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都在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步入新时代，要求探索建立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与此前对策性倾向的区域国别研究相比，新时代的区域国别学更强调学科基础、学术基础、知识基础和话语基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①。这一根本要求为繁荣发展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推进新时代区域国别学的过程中，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一）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内在灵魂。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解决本国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而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而且也解决不了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域外知识体系的构建受到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刻影响，对区域国别的认识往往通过西方人的视角进行，尤其是通过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认识世界，在世界观、地区观、国别观上免不了受到其

^①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1版。

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一直在西方人的知识体系中被“思想殖民”。要想在全球区域国别学中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就必须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区域国别学体现中国特色，绝不是为特色而特色，而是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而是在行动中干出来的。中国特色是时代特色、民族底色、文化本色的统一。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世界潮流息息相通，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跨越。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要服务民族复兴使命，绵延民族传统，助力民族复兴，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跨越。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对话，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跨越。

（二）突出中国风格

中国风格是区域国别学的外在气质。环顾世界，区域国别学已经是学术公器，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体现自己风格的区域国别学，有着与众不同的利益追求、价值旨趣、道德理想和审美倾向，形成独具风格的区域国别学理论路径。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突出中国风和中国味，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新的发展方向，努力成为世界区域国别学百花园中风格鲜明的学术流派。

迄今为止，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域国别学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还没有形成独具风格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流派。在经济全球化复杂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本土与外来、历史与时代、官方与民间等各种区域国别知识争奇斗艳，竞相成长。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想在世界区域国别学百花园中脱颖而出，就必须突出中国风格，具备中国气质，形成中国学派。

中国风格是一种博古通今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脉相承的文化风格，需要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区域国别学。具体而言，首先，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学要不忘本来，不忘初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除旧布新，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区域国别学领域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学要吸收外来，面向世界，广泛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区域国别学的有益成果，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他国区域国别学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第三，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学要面向未来，牢记使命，坚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不断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新发展、新突破和新境界。

（三）彰显中国气派

中国气派是区域国别学的综合标识。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历史文化灿烂，历来就具有大国担当和大国气派。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就满怀信心地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也越来越强调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彰显中国气派和大国责任，不仅要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更要为人类的进步而奋斗，努力为世界区域国别学贡献更多智慧，创造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中华文明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下降了，甚至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在艰难中奋起，在压力下奋进，经过历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开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丽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增强标杆意识和引领意识，坚持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发展，不断彰显中国气派。

中国气派是一种自内向外的理想追求和责任担当，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有机互动的学术气象和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融会贯通的学派气势，需要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区域国别学。中国气派的区域

^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第1版。

国别学要坚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在世界区域国别学中自成一派。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要坚持剖破藩篱，兼收并蓄，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各国区域国别学融为一体。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要坚持融会贯通，立己达人。中国区域国别学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引领世界区域国别学为人类知识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在推进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顶层设计，尊重学科规律，统筹各方面力量、整合国内外资源，一起协同推进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学术创新，不断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刘军：谢谢赵老师。区域国别学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准生证”，很多机构都已经在摩拳擦掌，大干快上。您特别提出区域国别学进入了新时代，正在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我们祝愿区域国别学大有可为。最后，感谢您接受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编辑部的访谈！

【Abstract】 Area studies is a first-tier discipline established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y, which is the sum of a country's academic knowledge system about the outside world. In fact, area studies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Nevertheless, under the existing disciplinary system, it is scattered in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sociology, anthropology, world history,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s China is getting closer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both knowledge and practice require that area studies should be a separate first-tier discipline to undertake function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political advice and social service for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utsid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connotation, area studies should integrate multi-disciplinary resources, committed to independently constructing an extraterritorial knowledge system. As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in civilization, China's area studies should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o build area studies as a first-tier discipline,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existing paradigms of civilizationalism,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integrate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sides, we should strive to build disciplinary, academic, discourse, and teaching material systems in area studies. Based on its own advantageous disciplines, each university should creatively put forward program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creating area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s and Chinese features.

【Key Words】 Area Studies, Academic Development, New Liberal Arts, Interdisciplinarity,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Аннот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это дисциплина первого уровня, созданная в рамках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котора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умму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знаний страны о внешнем ми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меют долгую историю в Китае, но в рамках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системы дисциплин они разбросаны по многим дисциплинам, таким как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экономика, социологи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и иностранный язык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Китай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центру мировой арены, развитие знаний и практики требует, чтоб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ись как отдель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первого уровня, которая взяла бы на себя функцию построения знани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онсультаци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миром.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коннот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бъединяющие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ресурсы и стремящиеся к независимому построению системы экс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зна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тая как страны с длитель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ей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рошлым имеют сво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дисциплины первого уровн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еобходимо учиться у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парадигм цивилиционизма,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глобализма, интегрировать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методы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кроме тог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созданию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дискурсивных и учеб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своих выгод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ах, каждая школа должна творчески выдвинуть программу постро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 свои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и созд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им стиле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здание дисциплин, новы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й, странов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一级学科背景下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构想 ——基于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经验

刘娟*

【内容提要】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区域国别研究人员。但是,由于缺少一级学科支撑,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缺乏系统性、规划性、连贯性和专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俄罗斯高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域外区域学”方向。该方向具有课程设置丰富、开设学校类型多样、区域特色明显等特点,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建设方法具有借鉴价值。本文基于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的经验,探讨一级学科背景下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方法和实施路径,提出“双轨制”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想——在建设区域国别专业“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时,根据不同高校的师资情况、学生专业基础及知识结构特点,构建其他专业与区域国别专业“融合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以解决现阶段我国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专业基础薄弱、师资队伍不健全、人才培养缺乏系统性等制约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及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问题。

【关键词】俄罗斯国别与区域研究 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 中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高校课程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D5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5-0031(21)

* 刘娟,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文艺》主编。

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特色和综合性特点一直影响着“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大家普遍认为“区域国别学”没有自身明确的理论架构和学科属性，不能被定义为一级学科。在此，我们有必要客观辩证地看待“区域国别学”与其涉及的相关学科的关系，认识到它们之间并非包容关系，而是平等关系、跨学科交叉关系、相互支撑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将其设置在我国《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对于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及相关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开展“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如何对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进行整体规划？如何建设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学派？这些问题是我国学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都指向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

通过对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方向课程建设的研究，我们发现，该课程建设具有自己的特色：开设课程的学校在落实俄罗斯国家课程标准的同时，结合了学校的学科基础、专业优势和区域特点，构建了符合学校定位且满足国家对区域国别人才需求的课程体系；区域国别专业建设表现出多样性、灵活性、针对性等特点；课程设置关注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及综合性特点，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的结合，兼顾区域与国别的实际情况。这种结合实际情况、发挥学校传统优势、开设多元区域国别课程、对学生进行系统性培养的做法，对现阶段我国区域国别专业（或方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设。“1964 年，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在部分高校成立了相应研究所和院系”^①。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建立了一批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

^① 屈廖健、刘宝存：“‘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中国高等教育》，2020 年第 4 期，第 78 页。

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主要包括下面两类人员：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背景人员和国际关系与政治、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学科背景人员。第一类人员往往精通外语，但是专业知识有所欠缺；第二类人员虽具有专业优势，但是外语能力较薄弱。两类人员中具有在研究对象国深入学习和深度调研经历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长期以来，由于缺少一级学科依托、人才培养体系支撑，我国高水平复合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短缺。因此，“需要建设一个一级学科来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①

为了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解决区域国别人才短缺问题，教育部于 2012 年启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建设，同年在中国高校设立了 42 个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2015 年，教育部发布《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推进研究基地的培育和建设。^②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通过加大留学工作行动计划实施力度，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③。2017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整合校内资源，发挥人才优势，加强对空白和国家战略急需的国别和区域研究。^④2019 年，教育部将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工作措施之一纳入教育部该年度的工作要点。^⑤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建设进入快车道。截至 2021 年，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心、备案中心等数量达到 444 个，这为“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① 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0 页。

② 参见《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5 年 1 月 21 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501/t20150126_189316.html

③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6 年 4 月 30 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605/t20160503_241658.html

④ 参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7 年 2 月 22 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703/t20170314_299521.html

⑤ 参见“教育部 2019 年工作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 年 2 月 22 日，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64/201902/t20190222_370722.html

教育部建立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同时也肩负着人才培养任务。由于培养方案不统一、跨学科师资队伍不健全、课程体系不完备,各基地和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表现不尽相同,培养成效差别明显。我国高校大部分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和中心设立在外国语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因此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成了现阶段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首次将国别与区域研究纳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五大研究方向之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2013)对国别和区域研究内涵给出如下界定:“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①不难发现,这一界定突出了对语言对象国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外语学科指向。上述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语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区域国别研究课程、培养区域国别人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地域性、全面性、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在地性和经验性,^②其自身属性决定了区域国别人才需兼具专业性和综合性。我们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应是政治可靠、能力突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集“专才”与“通才”于一身,具备宽广的知识结构、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专业背景、扎实的理论基础、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优良的团队合作能力、优秀的论文写作能力,对研究对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掌握与研究内容相匹配的研究方法,通晓对象国语言,能使用外语快速有效地获取资料信息,表达观点。

“外语+”模式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培养区域国别人才方面却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模式以外语学科为依托,以其他学科为辅助,关注的是对外语人才的培养。“以语言为本体的学科培养方式,

① 宁琦:“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以北京大学为例”,《外国语》,2020 年第 3 期,第 36 页。

② 参见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 年第 4 期,第 83 页。

作为本科生培养是没有问题的，而一旦要利用语言技能，以语言为工具，对有关对象国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会感到力不从心”^①。“未来若能把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性、理论性问题有机地、建设性地进行结合，将会使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展现出新的前景”^②。

可见，外语能力是区域国别人才多种能力中的一种，但不是决定性的能力，培养区域国别人才不是简单的“外语+”模式能够独立胜任的。

二、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及特色

俄罗斯高校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建设“域外区域学”方向。“域外区域学”也称“世界综合区域学”（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是“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科。它在兼顾区域的历史、人口、民族、宗教、文化-人类学、生态、政治法律、自然资源的特点以及区域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基础上，研究世界范围内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体系形成及运作过程的规律”^③。截至 2018 年，俄罗斯共有 60 所高校开设“域外区域学”方向课程，内容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区域学、外语、种族学、国家安全、区域合作与冲突、文化学、公务交际礼仪等。“域外区域学”方向主要在历史与政治学系、欧亚及东方系、外语与区域学系、社会学与区域学学院、国际关系与域外区域学系、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历史档案学院等院系开设。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俄罗斯高校已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域外区域学”人才，仅以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为例，2002 年至 2012 年，该校培养了 200 余名“域外区域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毕业后任职于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区域发展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消息报》《今日俄罗斯》等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大

① 王向远：“‘区域研究’的学科建构及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研究》，2021 年第 7 期，第 159 页。

② 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 期，第 77 页。

③ Под ре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А.Д.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М.: Магистр: НИЦ ИНФРА-М, 2014. С.70.

型媒体和高等院校。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A.B. 格鲁什科不止一次参加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域外区域学”方向硕士论文答辩，对学校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质量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俄罗斯外交部非常需要相关领域的人才。^①

（一）俄罗斯高校设立“域外区域学”方向的缘起

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方向的诞生主要基于三个原因：高校“国别”专业发展的困境、国别研究遭遇的危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

俄罗斯的国别研究有 100 多年的历史。早在 1918 年，在彼得格勒大学就建立了具有国别研究特点的教研室，它就是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和社会地理教研室的前身。1929 年在莫斯科大学创建了苏联经济地理教研室。20 世纪 40 至 70 年代，苏联高校的国别研究及课程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与高校国别研究并驾齐驱的还有苏联科学院系统的国别研究。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苏联科学院先后建立了非洲所（1959 年）、拉丁美洲所（1961 年）、远东所（1966 年）、美国所（1974 年改为美国和加拿大所）等。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国别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造就了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创办了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奠定了苏联国别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别研究优势地位被极大削弱，“国别”教研室丧失了独立地位，师资队伍老化，国家级的出版计划也因资金短缺而纷纷取消。^②

与国别研究地位下滑同时出现的，还有国别研究方法在全球化背景下遭遇的危机。1980 年到 1990 年，苏联学者已储备了大量国别知识和研究成果，并开始尝试在国别研究的框架内构建综合国别分析方法。然而，1990 年代，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国别研究都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相关。研究者们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家特点将失去以往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在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终结之际，因去殖民化和大量新的国家产生而开展的描述性国别研究任务可谓已经完成，

① См. Киреева А.А. 10 Лет магистер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политик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егионов мира»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2. №3. С.191-193.

② См. Кузнецов А.В. Кризис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на фоне растущего спроса на знания о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Кон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21. Т.14. №6. С.12-16.

但国别研究的解释性与预测性潜力表现不足。^①对具体国别的深入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仅以特定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如盲人摸象，难以对区域发展和全球变化进行全方位和客观的研究，更难对世界的整体发展做出预测。

20 世纪 90 年代，无论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都表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既体现在西方学者对非西方国家现实的忽视，也反映在他们的理论对于主导地位的占据。在国际学术界，俄罗斯现实、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和成果不能得到足够重视。虽然，国际关系与世界发展进程呈现多样化趋势，但“类似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实际信息也没有促成能够替代西方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非西方观念的产生。西方研究者依旧基于自身理论，把精力用于讨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进一步考虑非西方国家现实的条件能够解释什么”^②。

因此，俄罗斯学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探索构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尝试构建基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理论和国别研究方法的研究路径，并将其称为“世界综合区域学”，即“域外区域学”（作为专业方向的称谓）。“在不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的同时，这一路径主要聚焦于挖掘国际进程与国内和区域内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研究国内和区域内发展特点在全球层面的影响”^③。以沃斯克列先斯基（А.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为代表的学者率先行动，开始建设“域外区域学”方向，组建团队，制定培养方案，编写教材，出版著作，举办论坛等。

（二）《俄罗斯联邦“域外区域学”课程国家标准（2017 版）》^④概述

为了保障课程质量和人才培养成效，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出台并不断完善“域外区域学”课程的国家标准，规范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为院校制定相关培养方案提供依据。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在课程内容和培养目标方面存

① См. Колдунова Е.В.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подход и учеб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6. №5. С.65-66.

② Там же. С.64.

③ Там же.

④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тандарт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подготовки 41.03.01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уровень бакалавриа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fgos.ru/fgos/fgos-41-03-01-zarubezhnoe-regionovedenie-553>

在明显区别。本科阶段体现出宽口径特点，注重对学生的多学科知识传授；研究生阶段聚焦具体专业和方向，对学生进行细化深入培养。本文以《俄罗斯联邦“域外区域学”课程国家标准（2017版）》（下文简称《标准》）为参照，对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展开分析。

《标准》规定，“域外区域学”方向代码为 41.03.01，本科学制 4 年，学分共计 240 个（每学年不多于 70 个学分），毕业生就业范围为教育与科技、文化与艺术、信息与交际、行政管理及办公、大众传媒、出版与印刷等领域，毕业生应能胜任外交、组织管理、分析、科研、咨询、项目等工作。除此之外，《标准》对“域外区域学”课程结构、学生必备能力、师资队伍等做出规定，明确要求课程结构由课程、实习和学业认证三个部分构成。

表 1 “域外区域学”课程结构简表

课程结构			学分	
模块 1	课程	基础类课程	哲学、历史、外语、生命安全、体育、其他	不少于 159 分
		专业类课程		
模块 2	实习	教学实践	了解性实习、科研实践（初步具备科研能力）	不少于 18 分
		生产实践	专业实习、科研实践（与毕业设计相关）	
模块 3	学业认证	国家考试		不少于 12 分
		毕业论文		
总学分			240 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域外区域学”课程国家标准（2017版）》的具体内容自制。

《标准》规定“域外区域学”方向需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综合职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综合能力包括系统性及批判性思维能力、项目设计及实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及领导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自我管理及自

我发展能力（包括珍爱健康）、保障生命安全的能力。综合职业能力包括用母语及外语进行职业交际的能力、信息交际技术使用能力、信息分析能力、评价及判断能力、成果发表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职业行为成果展示能力。职业能力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专业要求，概括为必备能力和建议能力（一个或多个）。

《标准》对师资提出具体要求，规定师资队伍由学校在职教师和外聘人员构成；师资要符合职业标准要求及专业培养要求；与所教课程相关的科研、教学和（或）实践工作的师资力量应不少于 70%；从事与人才培养专业相关工作的其他机构的领导和（或）工作人员（在相关领域工龄不低于 3 年）应不少于 5%；具备相应学历和（或）职称的师资应不少于 60%。

（三）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设置特点

俄罗斯高校在落实《标准》《高等教育国家标准》和《国家职业标准》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培养目标及学校的学科特色、区域特点、研究传统、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模式等，自主编写“域外区域学”课程培养方案。在赋予高校制定“域外区域学”培养方案自主权的同时，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还通过发布和认定培养方案的标准样例来指导高校编写培养方案。标准样例给出的课程结构由三部分构成：人文、社会和经济类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数学及自然科学类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专业类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通过研究俄罗斯不同高校的“域外区域学”方向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我们发现，各个学校课程设置模式虽各具特色，但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类型 1，人文、社会和经济类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数学及自然科学类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专业类课程；

类型 2，基础类课程+拓展类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类型 3，必修课程+拓展类课程+选修课程；

类型 4，必修课程+拓展类课程。

其中，类型 1 与标准样例完全一样，类型 2—4 均与标准样例有所区别。我们选择了 4 所不同类型的高校，梳理了它们的“域外区域学”课程设置情况，制作了下列简表，以期直观展示不同类型高校在课程设置上的异同。

表 2 俄罗斯北方（北极）联邦罗蒙诺索夫大学（类型 1）^①

模块		课程
人文、社会 和经济类	必修	历史、外语、哲学、国际及司法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经济理论；俄语与言语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学、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法学、区域学导论、俄罗斯及他国外交史、国际经济关系
	选修	政治学学术史、俄罗斯国家法、俄罗斯经济、经济学学术史、通史、世界文明史、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社会学、文化学
数学及自然 科学类	必修	信息技术、数学统计导论、数学分析基础
	选修	生态学、当代自然科学相关概念
专业类	必修	生命安全、相关区域国家语言、政治地理、国家法、经济、历史、对外政策、国情学、北欧国家社会政治体系、他国文化宗教传统、跨文化交际、北欧国家历史、独联体国家、北欧国家文化宗教文学、公文及公务礼仪、毕业论文写作方法
	选修	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北欧、欧洲文化语境中的北欧、北欧国家一体化进程、政治交际、俄罗斯与相关区域国家关系史、北欧国家宪法、北欧国家及俄罗斯精神智力空间、20 世纪的政治领袖、区域及民族安全、当代世界中的区域冲突、北欧国家种族学及种族地理、视觉人类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北方（北极）联邦罗蒙诺索夫大学“域外区域学”方向培养方案自制。

表 3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类型 2）^②

模块		课程
基础类		哲学、历史、区域所在国外语、第二外语、生命安全、体育
拓展类	必修	经济学、法学基础、俄语及言语文化、政治学、国际文化项目、国际关系史、区域学理论导论、跨文化交际、研究分析基础、域外俄罗斯学、国际政治、国际市场、俄罗斯当代外交政策、外交理论和历史、学术写作、欧洲经济、欧洲法律、国际组织中的欧盟、欧盟区域政治、欧洲政治文化、欧洲政治地理、学期论文
	选修	体育课拓展类课程、职业定位、职业导论、社会学、心理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英文授课）、国际政治分析、欧洲多元文化政治、地缘政治、欧洲领土上的当代冲突、欧洲安全、涉及欧洲 7 国的课程：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立陶宛、荷兰、英国 7 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国家法律、政治体系、社会进程；俄罗斯与上述 7 个国家的关系史及当代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域外区域学”方向培养方案自制。

① ФГАОУ ВПО «Северный (Арктиче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М.В. Ломоносова». Основна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ая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дготовки: 41.03.01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28 января 2015 г. https://narfu.ru/upload/iblock/448/strany_severnoy_evropy.pdf?ysclid=170voeodvv414147540

② ФГБОУ ВО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Учебный план подготовки бакалавров. Направление 41.03.01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15 ноября 2017 г. <https://www.rsuh.ru/upload/iblock/b67/b67ca44140802a0af9f56b29a92725d4.pdf>

表 4 后贝加尔国立大学（类型 3）^①

模块	课程
必修	《标准》规定的基础类课程、第二外语、法律、经济理论、政治学、数学分析方法、信息科学及信息技术、相关区域国家的政治地理、世界综合区域学导论、亚洲和非洲历史、国际经济、相关区域国家经济、相关区域国家历史、当代国际关系、相关区域国家对外政策、相关区域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翻译基础
拓展类	相关区域国家语言、翻译实践、俄语和言语文化、相关区域国家区域政治、相关区域国家生态状况、社会学、相关区域国家社会政治思想、相关区域国家科技与创新发展、相关区域国家现实问题、信息分析工作、相关区域国家一体化
选修	相关区域国家文化宗教传统、相关区域国家种族、区域研究方法基础、区域项目研究方法、区域和民族安全、当代世界中的区域冲突、相关区域国家政治的社会文化层面、公务礼仪、社会政治翻译、经贸翻译实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后贝加尔国立大学“域外区域学”方向培养方案自制。

表 5 东西伯利亚国立技术与管理大学（类型 4）^②

模块	课程
必修	历史、哲学、外语、体育、经济理论、政治学、高等数学、数据库基础、办公技术、生命安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职业行为导论，相关区域国家语言、历史、经济，国际经济关系、当代国际关系
拓展类	法学、区域经济和政治、域外国家区域经济、外交政策发展史及外交，相关区域国家政治地理、外交政策，俄罗斯当代外交政策、区域和民族安全、国际政治、中国/日本政治地理、中国/日本历史、中国/日本经济、中国/日本外交政策、20-21 世纪中国国家政治/日本民族安全、中国/日本宗教、中国/日本种族、中国/日本文化与文学、中国/日本经济地理、中国/日本对外经济行为、公务外语、劳动法基础、职业交际外语、公文事务文件的语言和风格、谈判、社会学、独联体国家、管理社会学、劳动力市场及其区域输出、公务文化、信息经济、冲突学、国际组织、跨文化交际、亚太地区国家法、资本国际市场及外国投资、跨境区域经济、国际及区域冲突、形势分析、国际关系、文化学、俄罗斯市政管理与地方自治管理、国际一体化过程、演讲学

资料来源：根据东西伯利亚国立技术与管理大学“域外区域学”方向培养方案自制。

① Учебный план.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подготовки 41.03.01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15 июня 2017 г. https://zabgu.ru/ftp/B/41.03.01/41.03.01.1/3_УР/2021/Очная.pdf

②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подготовки 41.03.01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13 апреля 2015 г. <https://esstu.ru/aicstorages/public/Download/0d027005c0a86e8b1614f6c3c9b68c10>

通过分析俄罗斯高校本科阶段“域外区域学”课程设置,我们发现,俄罗斯开设“域外区域学”课程的学校类型全面,涵盖特殊地位大学(如莫斯科国立大学)、联邦大学(如喀山联邦大学)、研究型大学(如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联邦主体综合性大学(如车里雅宾斯克国立大学)及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如东西伯利亚国立技术与管理大学)。

从上述简表可以看出,在进行课程建设过程中,俄罗斯高校关注共同基础,注重学生个性发展,设计了基础类课程、拓展类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等多种模块组合的“域外区域学”课程结构;充分考虑到区域国别课程的性质,构建多学科课程体系,重视培养学生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综合能力;根据自身所在地区特点,进行课程设置,开设与比邻区域和国家的历史、政治、法律、经济等相关的课程。

三、构建“双轨制”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

“国别区域人才的培养应‘通专结合’。‘通’是指学生既要掌握国别和区域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还要习得全球治理的基本理论与知识;‘专’是指学生可以在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别和区域研究上深入下去,或是专攻某一个或某一些全球治理领域”^①。鉴于“区域国别学”自身的特点及区域国别人才的高标准定位,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理应是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规划。

(一) 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的启发意义

俄罗斯高校开设“域外区域学”方向、加强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目的和初衷,是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获得国际话语权,打破西方国家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培养能够应对世界格局最新变化的区域国别人才,提高国家外交实力。我们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开展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提高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质量,也是为了同样的目标。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方向从无到有,课程建设从初步探索到初具规模,建设初期同样面临“区域

^① 郑春荣:“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别区域人才培养探析”,《中国外语》,2020年第6期,第24页。

国别学”学科属性复杂、不同高校开设课程的基础参差不齐、师资力量分布不均等问题。因此，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经验，对于我们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方向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独特性，这对我们预见自身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建设的不足并提前加以完善也有借鉴意义。与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相比，俄罗斯“域外区域学”建设在理论基础、学术资源、知识储备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俄罗斯学者始终强调“域外区域学”的双重属性，认为它既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方法和路径，也是具体的专业方向，兼具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特点。因此，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与理论建设同时进行，能够得到理论支撑和指导。到2018年，沃斯克列先斯基等学者在俄罗斯国内外已出版了20部关于“世界综合区域学”（域外区域学）的学术专著、教材、教学辅导材料，如：《世界综合区域学》《世界综合区域学专业导论》《教学实践中的世界综合区域学》《域外区域学实践》等。^①这些成果不但能够推动“世界综合区域学”的理论体系建构，而且对指导“域外区域学”的实际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俄罗斯“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基于俄罗斯国别研究，具备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扎实的研究基础。苏联时期奠定的国别研究基础虽然已被削弱，但是国别研究的学术传统、学派传承依旧发挥作用。这不但为课程建设提供了保障，也使俄罗斯高校在“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中能够开设大量的国别类课程，能够使学生对具体国别和区域的有关知识进行深入学习。学者们认为，“在人才培养层面，‘世界综合区域学’（域外区域学）能够把国别知识与大家对世界政治经济进程的理解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对对象国发展特点有深入研究的、知晓这些特点与国际化趋势之间关系的人才”^②，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把区域国别理论的概括性及普遍性知识与区域和民族相关联、与具体问题相关联，不仅要传授理论知识，还要讲解全球性

^① См.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подход и научная школа. Интервью с Алексеем Дмитриевичем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м, профессором МГИМО МИД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20. Т.20. №2. С.361.

^② Колдунова Е.В.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подход и учеб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66.

规律如何通过区域层面对具体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以及具体国家和地区具有世界政治意义的规律性特点如何通过区域层面参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①俄罗斯高校对国别课程建设的重视值得我们借鉴。

“域外区域学”的课程内容和建设方法与俄罗斯学者对“域外区域学”自身特色的认识密切相关。学者们普遍认为,“域外区域学”“整体上具备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内涵”^②。因此,俄罗斯高校的“域外区域学”课程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特色,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门类,如区域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外国语言文学等。

作为新兴方向,“域外区域学”方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了解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方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尽可能规避类似问题的产生。在接受《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采访时,沃斯克列先斯基指出了俄罗斯部分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培养国别研究人才的传统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过多注重理论教学和学生对对象国的哲学和历史的深入学习,这导致学生缺少对时政研究的经验,学成后难以为决策部门提供具有时效性的建议;俄罗斯语言类高校和综合类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的“域外区域学”课程,往往立足于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较多关注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这类院校的毕业生同样难以胜任区域国别研究;有的高校虽然建设跨学科课程体系,将对象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法律整合在一起,貌似跨学科,实为学科相加,课程设置类似传统的“历史哲学”模式和“社会经济”模式。^③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域外区域学”课程是“多课程”模式,而非跨学科模式。^④

① См.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подход и научная школа. Интервью с Алексеем Дмитриевичем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м, профессором МГИМО МИД России. С. 361.

② Максимцев И.А., Межевич Н.М. Разумовский В.М. О специфике и задачах магистер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по зарубежному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ю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Извест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8.

③ См.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подход и научная школа. Интервью с Алексеем Дмитриевичем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м, профессором МГИМО МИД России. С.361-362.

④ См. Зиневич О.В., Рузанкина Е.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комплекс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и учеб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в ракурсе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ст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4. №3 С.159.

综观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的优点与不足，以及中俄两国在区域国别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共通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区域国别学”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需做到以下几点：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区域国别研究特色及人才培养规律的国家标准；加强“区域国别学”理论研究，并使其指导课程建设；高校根据现有研究基础和师资力量，量力而行，合理规划“区域国别学”专业的国别和区域方向；构建符合“区域国别学”学科特点的课程体系，加强学科融合和跨学科课程体系建设；兼顾专业知识、国别知识和区域知识；坚持理论教学和实践操练相结合；开设多模块课程，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二）“双轨制”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方式

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方向建设经验进一步证明，“区域研究既有跨学科、超学科的特性，又要靠‘区域+学科’这样的研究模式来体现”^①，而且，“区域国别研究要增强学科意识，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②。区域国别研究要充分考虑区域研究、国别研究与专业领域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中，需要关注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具体学段与整个培养过程的关系，既应关注共同基础，又要强调国别、区域、专业的细分和侧重。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建构应有利于受教育者的综合发展。

根据现阶段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路径，结合我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特点及区域国别人才需求现状，合理借鉴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经验，我们可以尝试构建“双轨制”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打造区域国别专业“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构建其他专业与区域国别专业“融合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第一种模式下，“本硕博”三个阶段的培养均围绕“区域国别学”的相关课程展开，采取“区域国别+专业+具体区域或国别”的方式进行：本科阶段，使学生掌握区域国别相关知识及研究方法，宏观获取哲学、国际关系

① 王向远：“‘区域研究’的学科建构及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第157页。

② 冯绍雷、李中海等：“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1页。

与政治、世界及区域历史、世界及区域经济、世界及区域安全、国际法等知识，为学生打下宽广的学科基础，并使其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硕士阶段，对学生进行区域和国别细化的针对性培养；博士阶段，指导学生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在第二种模式下，本科培养依托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等专业，使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硕士和博士阶段，基于“区域国别学”课程，使学生获取区域国别的相关知识，具备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并以各自专业为背景，就某个区域或国别的具体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采取“专业+区域国别+区域或国别的具体领域”的方式进行。

两种模式虽然采用的路径不同，但是强调的都是区域国别知识与其他专业知识的兼顾、知识传授的有效衔接和不断深入、学生知识结构的多元性及针对性。

（三）“双轨制”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下的课程体系建设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保障。“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①。区域国别研究自身的特点决定区域国别课程设置的跨学科性、多学科性、跨文化性。我们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该处理好区域与国别、理论与实践、语言能力与学科知识、深入掌握与普遍了解等关系，使课程设置符合区域国别学科特色及研究范式，体现综合性、渐进性和差异性特点。

我们尝试采取基础类课程、拓展类课程及实践类课程相互关联、本硕博三个阶段步步深入的方式构建课程体系（不包含学业认证部分）。除此之外，针对区域国别学科特点及研究需要，我们将外语课程设置为贯穿本硕博三个阶段的基础类课程，将境外研修确定为本硕博三个阶段实践类学习任务的必要内容。

^① 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80页。

表6 “本硕博一体化”课程体系

阶段 课程		本科阶段	硕士研究生阶段	博士研究生阶段
基础类		外语、哲学、跨文化交际	外语及第二外语、哲学、区域国别研究职业素养	外语及第二外语、哲学、科学伦理
拓展类	必修	有关区域国别知识的课程、国际关系与政治、世界及区域历史、世界及区域经济、世界及区域安全、国际法等方向的课程	相关具体区域和国别的课程	相关具体区域和国别的课程
	选修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具体区域的课程	区域国别研究方法	跨学科研究方法、区域国别项目研究方法
实践类	科研	学期论文、毕业论文、本科项目等	毕业论文、项目研究、田野考查等	毕业论文、项目研究、田野考查、论文发表等
	实践	学术交流、实习实践、境外研修	学术交流、实习实践、境外研修	学术交流、咨政服务、境外研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7 “融合对接”课程体系

阶段 课程		本科阶段	硕士研究生阶段	博士研究生阶段
基础类		外语（外语专业的学生学习第二外语）、哲学、跨文化交际	外语（外语专业的学生学习第二外语）、哲学、区域国别研究职业素养	外语（外语专业的学生学习第二外语）、哲学、科学伦理
拓展类	必修	外语、国际关系与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等专业课程	相关区域国别具体领域的课程	相关区域国别具体领域的课程
	选修	所在学科研究方法、有关区域国别学基础知识的课程	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国际关系与政治、世界及区域历史、世界及区域经济、世界及区域安全、国际法等方向的课程	跨学科研究方法、区域国别项目研究方法
实践类	科研	学期论文、毕业论文、本科项目等	毕业论文、项目研究、田野考查等	毕业论文、项目研究、田野考查、论文发表等
	实践	学术交流、实习实践、境外研修	学术交流、实习实践、境外研修	学术交流、咨政服务、境外研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人才培养单位的情况不同，课程体系建设的方法和路径必然不同，但是整体的课程设计理念、课程结构与模块设置大致相同，可根据学科基础、师资情况、发展定位、所在区域特点等，基于未来的国家标准，构建“区域国别学”“本硕博一体化”课程体系或“融合对接”课程体系。

（四）“双轨制”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师资队伍建设

现阶段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单位主要为外国语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外语学院。“虽然外国语大学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悠久历史，并且几十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就，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和学者往往在综合性大学或专门研究机构。造成这个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高校外语教师接受的是文学、语言学和翻译方面的学术训练，而不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学术训练，因此他们在从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时候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①，与外国语大学相似，综合性大学的外语学院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方面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加强区域国别师资队伍建设已成当务之急。

“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区域国别课程的通识性与差异性，对区域国别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鉴于现阶段我国区域国别人才队伍现状及区域国别人才培养需求，我们可基于“双轨制”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两个模式对师资队伍的不同需求，建立跨学科、跨院校、跨部门多元共享的师资队伍：打破校内学科壁垒，整合校内教师资源；充分学习“旋转门”机制，打通高校与部委、研究机构之间人员流动的屏障，鼓励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专家到高校兼职；组建校际“区域国别”教师共同体，鼓励不同院校和专业的老师开展联合培养；建立高水平区域国别人才库，加强师资储备。

四、结语

“要推进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就要从培

^① 谢韬、陈岳、戴长征、赵可金、翟崑、李巍：“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第 8-9 页。

养研究者开始，培养出一批既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做”^①。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任重道远，依托一级学科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理论建设是推动我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

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是系统工程，其系统性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连贯性与可持续性、课程设置的渐进性与衔接性、培养目标与课程内容的多样性、有关对象国及对象区域课程在不同人才培养单位的合理分布。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伊始，需要国家尽快做出顶层设计，出台“区域国别学”课程国家标准和指南，明确不同阶段区域国别课程的课时和学分、课程性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理念、课程结构、内容要求、评价方式、师资结构等，避免区域国别课程建设的同质化和盲目性。

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和自身价值决定了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战略属性，人才培养单位应具备全局观，根据国家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国别人才的需求，结合自身优势和区域特点，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其他单位在对象国、对象区域、研究领域方面互补的课程体系。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初期，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困难，还有机遇，国家可以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指导高校和相关科研院所开展学科建设，完成对区域国别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类型的整体空间布局，为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China has started to build institutes i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accumulating rich experience and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rs. However, due to lack of support from the first-tier discipline, the talent training i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s deficient in terms of systematization, planning, coher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directly affect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studies in this field. It was in the 1990s that Russ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began to develop area studies. This

① 钱乘旦：“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光明日报》，2020年1月6日第14版。

direction is featured with rich curriculum, diverse types of schools, and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esides,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methods could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in Russ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implementation ways of China's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as a first-tier disciplin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double track system" talent training mode. While build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integration of bachelor's, master's and doctoral degrees" in majors in area studies,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students'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majors will be built so that problems, which restrict our talent training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such as weak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unsound teaching staff, and lack of systematic training at this stage, will be solv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China,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Китае с 60-х годов 20 века идёт процесс со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занимающихся вопросам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За это время в данной области уже накоплен большой опыт,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Однако без создани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отдельной дисциплины подготовке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ю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ю не хватает системности, структурност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а, что оказывает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анн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посвящена способам построения модели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ю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ю с учётом опыта построения дисциплины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ах. В статье разработана модель «двухурвневой системы»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ю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ю.

【 关键词 】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е, модель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китайских вузах, созд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учеб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в китайских вузах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中国与中亚 30 年

从维护睦邻安邻关系到构建安全共同体 ——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 30 年

许 涛*

【内容提要】中亚地区是中国西北周边重要近邻,不仅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而且由于地缘文化的关联性,中国与中亚各国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决定了各国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必要条件中“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的重要性,也决定了实现这些必要条件时政治互信与务实合作的必要性。1991年末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的五个独立民族国家急需构建各自的国家安全模式。其中,与中国关系的定位成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同时,正在进入全面改革开放阶段的中国,出于稳定周边环境的需要,也必须与中亚国家建立互利、协作的睦邻关系。随着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水平在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因素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安全合作成为发展新型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中亚各国建交30年来,首先取得的重大合作成就就是在安全领域。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演进,中国与中亚各国在维护自身稳定时,也把促进区域安全视为共同职责,同时逐渐形成了有效的协作模式。当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与中亚各国均遇到各种新挑战。在安全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形成彼此可以倚重的安全共同体,这种理念正在成为得到高度认同的地区共识。

【关键词】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 中国周边安全 地区安全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5-0052(22)

* 许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副所长兼中亚室主任。

1991 年末，经历当年“8·19”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苏联，又自我拆毁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三块基石：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于 12 月 8 日在白俄罗斯的国家狩猎基地别洛韦日秘密集会，宣布这三个斯拉夫国家退出苏联，并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尽管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等中亚国家领导人上下活动，四处奔走，调动各种政治资源，试图阻止这个当时居于世界第二位的超级大国解体，但《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却使这种努力变得毫无意义。12 月 2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以苏联名义的一切活动就此终止。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不仅是 20 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开始。在这样一场强烈的地缘政治大地震的冲击下，如何应对和解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历史性选择。

1991 年 12 月 27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停止工作的第二天，时任中国外交部长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与此同时，还致电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原苏联各国外长，通知他们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 11 个国家的独立，并准备与其进行建交谈判（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除外）。1992 年元旦刚过，以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增佩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于 1 月 2 日至 6 日间依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密集而顺利地进行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谈判，并分别发表了建交公报。^①在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后，中国与中亚各国将在什么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邻国关系？如何看待和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怎样重构一种有利于各方的地区安全环境？这些问题无论对仓促建国的中亚国家而言，还是对正努力营造稳定的良性周边环境的中国来说，都是十分迫切和现实的诉求。从 1993 年 3 月到 1998 年 8 月，中国政府先后与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政府签

^① 参见李景贤：“中国与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纪实”，《湘潮》，2010 年 6 月，第 43 页。

署了发展和加强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在 1992 年共同发表的建交公报基础上制定了全面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①从此，中国与中亚各国在恪守“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开启了解决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国家关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进程，并为在这一领域中开展务实合作奠定了早期政治基础。

一、化解冷战遗产负面影响

中国与中亚各国均为 20 世纪中苏关系的继承者，而发生在冷战时期的中苏对抗给当代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造成过多方面不可回避的深刻影响。如何看待和处理冷战时代给中国与中亚各国留下的历史遗产，是构建新时期国家关系的重要前提。而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严峻而又微妙安全关系的认知和解读，又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与苏联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因为在意识形态体系和国家关系定位上出现分歧，逐渐演变成两国间的论战。受到全球冷战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论战很快升级为政治上的对立和军事上的对抗。而从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民国政府与沙俄政府及苏维埃俄国至苏联关系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边界问题（尤其是其中存在多年的争议地区问题），首先成为中国与苏联之间引发军事冲突的导火索。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对中国中止了 50 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合作与援助，到 60 年代末发展到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和军事上的公开对抗，甚至达到准战争状态。1969 年 3 月，在中苏边境东段的乌苏里江地区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同年 8 月，又在中苏边境的西段在巴尔鲁克山地区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

^① 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联合声明》，中国网，2011 年 10 月 15 日，http://guoqing.china.com.cn/zwx/2011-10/15/content_23632577.htm；《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3 年第 26 期，第 1210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相互关系基本原则和发展与加深互利合作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4 年第 25 期，第 1034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6 年第 20 期，第 786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8 年第 24 期，第 955 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苏之间这两次成规模的武装冲突都发生在两国边境的争议地区。在“珍宝岛事件”后的几个月内，苏联当局在临近中国边境地区原已部署的 12 个机械化步兵师的基础上（加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布置的 2000 多人，总兵力尚不足 20 万人），在中苏边境东西两段共增加了 43 个摩托化步兵师、坦克师和空降师，加上在蒙古境内增加至 12 个师的苏军，中国北部边境面临着苏联地面部队 55 个师的威胁。如果包括可以将作战范围覆盖中苏边境地区的空军、防空军、战略火箭军和海军，用“陈兵百万”来形容当时中国北方的军事安全压力是毫不夸张的。面对这种态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了严重性和危险性。经双方高层通过政治和外交各种方式与途径的沟通和斡旋，最终共同否定了通过战争解决分歧的选项。^①虽然爆发局部战争的危险暂时化解了，但这种相互敌视和军事对峙的局面却并没有根本改变。

1982 年 3 月，再度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视察工作时发表了著名的“塔什干讲话”。其中，关于苏中关系重点谈到三条内容：首先，他认为在中国“还是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并未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承认“一个中国”是苏联一贯的对华政策基点，而且强调苏联从未在这一立场上有过动摇，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并一直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再次，称苏方已经做好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苏中之间存在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并计划对加强苏中边境地区相互间军事信任的措施问题进行讨论。^②很显然，苏联领导人清楚地看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现在看来，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国正在出现的变化将对苏联意味着什么可能并

^①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袭击”。1969 年 9 月，在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赴河内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返回莫斯科途中在北京作“技术性经停”的要求，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基本化解了当时中苏之间的准战争状态。参见周晓沛：《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第 38 页。

^② 吴跃农：“从‘塔什干讲话’到‘海参崴讲话’：中苏关系正常化历程（上）”，《党史纵览》，2011 年第 8 期，第 22-23 页。

不清楚，但抓住这一变革的时代机遇改善苏中关系应该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无论如何，勃列日涅夫的这一讲话对中苏两国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走向释放出了积极信号。对于这个苏联当局主动发出的信号，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也立即作出了积极回应。一方面，通过国家通讯社对苏联方面的积极举动作出正面评论；另一方面，通过当时中国尚保留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辗转传达中方的立场和要求。于 1981 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会见充当苏联领导人特使的罗马尼亚时任总统齐奥塞斯库时，郑重而严肃地代表中方提出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核心问题：一是苏军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二是苏联支持越南对同是中国邻国柬埔寨的军事占领；三是在邻近中国边境的地区部署数十万大军。邓小平特别向罗马尼亚领导人强调，中苏边境地区两国军事力量对比严重不对等，已经造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前提，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性问题。^①

然而，1982 年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一年 8 月，勃列日涅夫病逝。紧接着的是苏联历史上持续 3 年的“老人政治”时期，直至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在经历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和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毫无建树之后，戈尔巴乔夫急于改变苏联的内政外交窘境。在考虑与西方改善关系的同时，也将对华关系的调整作为可以先期推动的方向。1986 年 7 月，戈尔巴乔夫到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巡视，在那里他发表公开讲话，对此前中国领导人通过齐奥塞斯库总统转达的立场和态度作出迟到的回应。在这篇被中苏关系史学界称作“海参崴讲话”的重要表态中，戈尔巴乔夫主要向中方传达了这样几项内容：第一，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已决定将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出军队；第二，宣布苏方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讨论撤出大部分苏联驻军的问题，而且“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第三，正式表示苏联政府已责成有关部门同中国政府进一步讨论裁减边境地区常驻军队的问题。

^① 1982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请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带回口信，中方已经注意到了苏方的积极信号。但是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说到这里，邓小平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 100 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参见吴跃农：“从‘塔什干讲话’到‘海参崴讲话’：中苏关系正常化历程（下）”，《党史纵览》，2011 年第 9 期，第 49-50 页。

题；第四，表示同意率先在黑龙江段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苏中边界走向。^①中方同样对戈尔巴乔夫释放的积极信号予以正面回应，并在双方的努力下促成了 1987 年 2 月和 8 月的两轮副外长级谈判。这两轮谈判取得明显进展，将解决中苏边境争议地区的指导性原则基本确定了下来。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作为中苏论战发生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北京受到友好的接待。这次破冰之旅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正式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91 年 5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苏联时，中苏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中苏《联合公报》秉承双方认可的“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新时期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指导两国外交部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②。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调已经确定，顺势推进解决困扰中苏双方多年的边境地区不确定因素和共同安全隐患的进程似乎可以高歌猛进了。然而，就在 1991 年 12 月末，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停止以苏联名义进行的一切政治和行政活动，存在了近 70 年的红色大厦轰然倒塌。

面对苏联的解体，当时中亚各国政治精英们的心态和反应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联盟强大的权力中心瓦解了，为中亚各国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独立建国历史机遇，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可以梦想成真了。另一方面，原有的政治、安全、经济上的制度性依靠骤然消失，要在苏联解体的碎片上建立起新的民族国家，无论在政治和制度上还是在干部和财政上，都严重缺乏准备，甚至充满了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时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在 30 年后曾这样回忆这一段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日子：当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这组苏联的斯拉夫民族“三驾马车”偷偷摸摸地组织召开别洛韦日会议时，纳扎尔巴耶夫还在莫斯科等地为保留苏联上下奔走，直到俄、白、乌领导人签署解散苏联和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别洛韦日协议》的消息传出后，他终于知道了，为阻止苏联解体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活动都是徒劳的，于是悻悻返回了中亚，并与其他中亚国家领导人在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共商对策。后来担任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的尼亚佐夫建议中亚国家联合成立“突厥斯坦共和国”，但立刻遭到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

^① 参见周晓沛：《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第 45 页。

^② 徐天新、梁志明、谭圣安：《当代世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8 页。

莫夫（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此举会引起与“斯拉夫国家”的对立和冲突。^①从这一段回忆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中亚国家领导人首先担心的是失去原超级大国的依托——政治上的势单力薄和安全上的孤立无援是新生民族国家生存的最大危机。

1991 年 12 月 27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宣布联盟解体后的第二天，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立即通电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外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向他们明确表示以下基本立场：第一，中国政府承认各国的独立；第二，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履行与原苏联政府签署的各项条约、协定和有关文件所规定的义务；第三，中国政府希望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原苏联各国，在独立后仍能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与互动。^②1992 年 1 月 2 日至 6 日，经过前往中亚的中国代表团与各国政府的密集谈判，中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立法机构基于苏联解体前的谈判成果《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于这一年的 2 月批准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其他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原苏联国家依照同样方式和标准，也加紧与中国政府继续进行解决边境问题的谈判。同年 9 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代表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会议，共同商议如何继续与中国政府进行解决边境问题的谈判事宜。在这次会议上，四国在优先与中国方面进行关于实现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削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谈判与协商的意向上达成了一致。1993 年 2 月，中国政府与俄、哈、吉、塔四国政府组成的“五国两方”的奇特谈判组合，开始了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也恰恰因为是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边境问题会谈，各国似乎对已经发生变化了的关系定位尚不适应，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尤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大量分歧。但是，在将谈判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实现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上，以及在尊重和继承中苏时期已达成的边

①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рассказал о том, как ему предлагали создать с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и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ск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3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uzreport.news/world/nursultan-nazarbaev-rasskazal-o-tom-kak-emu-predlagali-sozdat-s-uzbekistanom-i-turkmeni-sta>

② “中国同独立后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new.fmprc.gov.cn/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11/t20001107_7950061.shtml

境谈判成果这几点上却是一致的。^①

经过两年多的谈判和磋商，上述“五国两方”代表在 1995 年 11 月草签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②。1996 年 4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曼诺夫（即塔吉克斯坦现任总统拉赫蒙）在中国上海隆重举行五国元首会议。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以下简称《上海协定》）。在签字仪式结束后会见各国记者时，江泽民主席对四国元首表示：“这次所签署的协定是我们五国多年谈判的成果，它的签署必将促进双方（仍以‘五国两方’的‘双边’形式——作者注）边境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有利于加强中国同其他四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利于中国同四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这一协定的签订，为亚太地区国家在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方面开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③在一年后的 1997 年 4 月，五国元首聚会莫斯科，共同签署了《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以下简称《莫斯科协定》），在法律层面巩固了 1996 年为实现边境地区安全的协商谈判结果，并从技术层面为中国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原苏联邻国制定了严密的冲突预防和军事安全的制度化方案。这不仅将曾经发生过的军事对抗和边境冲突在未来重演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而且为苏联解体后的这数千公里边境线的稳定与安宁奠定了法律基础。

分别于 1996 年、1997 年签署的《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不仅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及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的一项重要多边外交成果，更是在 20 世纪人类社会遭受两次大规模战争灾难后对国际安全模式构建的一次认真反思和批判。

^①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年，第 124 页。

^② 该协定在 1990 年 4 月中苏两国政府草签的《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相关内容的调整、补充而成。

^③ “江泽民会见哈吉塔三国总统，高度评价近年来中国同三国关系的发展”，《人民日报》，1996 年 4 月 27 日第 1 版。

首先，两个协定是各国在对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地缘政治动荡期内追求共同安全的结果。这一营造边境地区安全环境的多边行动，摒弃了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别国安全的优势和威胁基础上的片面安全模式，由此结束了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边界冲突重大隐患，为各国致力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和文化重建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不仅如此，两个协定的签署还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安全合作模式和安全合作理念的出现，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参与各方共同的安全需求。在此基础上的合作各方超越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经济体量、军事实力、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体现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理念所代表的东方价值观，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合作实践思路。

另外，通过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各国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安危与共、治乱相依的信任感。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化解了长期存在的边境地区安全威胁，这一历史性的成功大大激励了各国将安全合作中取得的互信升华到政治层面，并为未来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协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二、实现安全合作重心转型

1997 年 4 月，在《莫斯科协定》成功签署后，从表面上看，似乎这种国家元首级别的两次会议已经基本解决了各国间和本地区军事安全的主要问题。一些参与国对这一平台的兴趣开始下降，甚至认为这个高层论坛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然而，在莫斯科会议结束时，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一个倡议，邀请各国领导人于 1998 年到当时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聚会，希望将这个最高级别的多边协商平台继续下去。这个看似偶然的动议其实有着颇具代表性的现实诉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刚刚获得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均有着急于在国际社会受到承认和尊重的愿望。作为平等的一员，在有中、俄大国参与的国际平台上有效讨论和解决共同的安全问题，使得中亚国家领导人从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严感和自信心。另外，处在建国初期的中亚各国百废待兴，苏联解体造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导致国家经济下滑，由此引发的国内动荡首先表现为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有关的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新生的国家政权面临着继续分裂

的危险。在内忧外患的建国初期，亲历了这样一个有效解决各国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的元首磋商机制之后，希望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并探索讨论和解决其他现实问题的可能性——这种意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这一平台的继续存在却不太在意。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元首以积极的态度参加 1998 年 7 月的阿拉木图峰会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却以“身体原因”和“国内事务紧急”为由没有赴阿拉木图参会，而是派时任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代为赴会。^①

也恰恰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冷战的欧亚地区，各种原本被苏联政治压强掩盖的本土地缘要素，在苏联解体的刺激下迅速活跃起来。中亚各国独立前已经出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这时开始由秘密转为公开、由文化方面转而涉足政治、由民间转而觊觎政权。而中亚各国的政治精英在独立后的国家意识形态与苏联时代的政治叙事进行切割时，也急于从各自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基因中寻找可以替代列宁主义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支柱。将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传统作为一种选项，是当时中亚各国的普遍做法。对于建国初期的中亚国家而言，这一社会政策虽然是合乎发展逻辑的，但国家治理能力和经验的缺失，使被调动起来的社会宗教情绪成为具有相当破坏力的“双刃剑”。尤其是与阿富汗邻近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具有跨界特征的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影响成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甚至发起暴力行动，试图掌控国家执法部门。在俄罗斯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协助下，这起行动虽遭挫败，但是以“伊斯兰复兴党”（IRPT，成立于 1990 年，后被塔吉克斯坦政府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为代表的这股势力受挫后藏匿于阿富汗，在休养生息后又潜入塔吉克斯坦，引发了 5 年的内战。^②虽然在 1997 年 6 月通过俄罗斯、中亚各国、伊朗以及联合国的斡旋，塔吉克斯坦实现了民族和解，但“伊斯兰复兴党”作为政府反对派被吸纳进了国家体制内部，在后来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仍时常挑起大大小小的骚乱，成为塔吉克斯坦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的重

① “上海合作组织大事年表”，央视国际，2006 年 5 月 29 日，<https://www.cctv.com/news/special/C15810/20060529/103022.shtml>

② 参见赵静、张宏莉：“塔吉克斯坦的宗教现状与宗教政策”，《中亚研究》，2021 年第 7 期，第 11-21 页，<http://icas.lzu.edu.cn/f/202107/1261.html>

大隐患。1991 年成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不仅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以及针对中国新疆进行暴力分裂活动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针对俄罗斯进行武装分离活动的高加索地区车臣反政府武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其领导人尤尔达舍夫、纳曼干尼还控制着毒品由阿富汗经中亚地区流向俄罗斯及欧洲的渠道。这些中亚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不仅从境外恐怖主义组织得到资金支持，还在阿富汗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地中接受训练，甚至送到战场上接受实战熏陶。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如此强劲而膨胀的发展势头，已经严重挑战了新生的中亚各国政权，他们甚至在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影响和支持下提出建立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的政治纲领，尤其是着力经营各自的军事能力建设，分别组织起了 6000 多人和 5000 多人的武装力量，任命了政治领袖和战地指挥官，成为可与中亚国家强力部门进行公开对抗的规模化政治武装集团。^①

这种形势引起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中亚各国领导人的特别关注，他们也开始考虑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相关应对措施。1998 年 7 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代表）在阿拉木图举行会晤，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阿拉木图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中、俄、哈、吉、塔五国业已形成的合作机制将担负起“携手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等地区恶势力的共同职责”，并清晰地指出了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新特点，宣称“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都是不能接受的，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活动”。^②

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证实了各国领导人的担忧。1998 年，有着“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背景的恐怖袭击和杀害警察的重大刑事案件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发生；1999 年 2 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有组织地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政府大楼、国家银行、内务部等处制造

^① 参见苏畅：“论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基本特征”，《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第 71 页。

^②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年，第 144 页。

了 6 起连环爆炸事件，一些武装分子竟然还与这些机构的警卫人员和警察发生了枪战，其矛头直指时任总统卡里莫夫；^①8 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又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的山区，劫持了日本地质勘探队员和当地的执法人员，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巴特肯事件”。^②如此严峻的跨国安全形势促使中国和中亚各国领导人更加看重多边安全合作。1999 年，五国元首的高层会晤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得到了延续（这次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没有再缺席），这一逐渐机制化的会晤，因时因事将讨论的重心转移到了新出现的地区性宗教极端主义和跨国恐怖活动上来。在此次承上启下的五国元首峰会上，对地区安全合作的针对性和务实性要求成为突出特点。在五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比什凯克声明》中，对中亚及欧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化作出了清晰的判断，并提出了鲜明的共同立场，要求继续安全合作，“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分裂势力和极端主义势力，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偷运武器、贩卖毒品等跨国犯罪活动”^③。这次峰会上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经各国领导人批准，决定召开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安全执法部门领导人会议。1999 年 12 月，这一专业性会议在比什凯克召开，签署了《比什凯克合作与相互协作备忘录》，并由此形成了长期化的合作机制，定名为“比什凯克‘上海五国’执法部门领导人安全合作与协作会议”，简称“比什凯克小组”。这一机制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创造了一种制度性安排的条件，而它的早期构架也成了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的前身。

鉴于乌兹别克斯坦也是遭受地区安全新形式威胁的重点地区，卡里莫夫总统在 2000 年 7 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领导人举行杜尚别峰会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这一地区性多边高层磋商机制。中国领导人对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的积极态度高度赞赏，并对这

^① См. 23 года назад в Ташкенте произошла серия терактов. Погибли 13 человек и еще свыше 100 пострадали. 16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podrobno.uz/cat/proisshestviya/23-goda-na-zad-v-tashkente-proizoshla-seriya-teraktov-pogibli-13-chelovek-i-eshche-svyshe-100-postrad/>

^② 参见张来仪：“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69-76 页。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年，第 146 页。

一地处中亚地缘中心的国家加入这一元首俱乐部表示欢迎。乌兹别克斯坦参与“上海五国”地区领导人协商平台的积极态度，不仅使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中合作的覆盖面大大拓展，而且弥补了地缘空间上的重要空缺。虽然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并没有领土接壤，但由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作为中亚人口大国和资源大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加入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安全合作完成了重要的阶段性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第一，完成了由传统的边境地区军事安全合作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转变。当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三个直接邻国在平等、协商、互信的原则基础上解决了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裁减军事力量的重大安全问题后，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一系列新型的安全威胁因素促使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很快探索出一条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安全合作模式。第二，建立起了专业化的地区安全多边合作机制。与前期经历的在互信前提下依照法律文件规定各方分别采取行动和执行协定不一样，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发展、活动和威胁有着突出的地区性和跨国性特点，仅靠各国的单独行动不可能有效解决这些地区安全的新威胁。专业化、机制化的安全合作形式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中国与中亚各国政治互信水平的提高，也为深入探讨务实的安全合作模式开启了大门。第三，把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到了国际安全合作的议程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提出了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势力”是国际安全的新威胁，这一重要思路对国际社会认识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具有重大启示和指导意义——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不仅早于国际社会 3 年提出了这一重要的认识和判断，而且也率先开始探索通过建立信任、密切合作应对新型安全威胁的思路、方式和路径，为国际安全合作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打造地区性安全共同体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亚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 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宣布北约部队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年底即在中亚建立了若干军事基地。2005 年 3 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

贯穿南北的一场全国性骚乱对其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同年 8 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有宗教极端主义组织背景的武装分子利用当地民众的和平示威袭击了安集延强力部门，并与警察交火，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这些事件标志着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在持续发展和不断变化，同时也暴露了中亚各国国家安全建设中存在的缺陷。此外，中亚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也给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安全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继续深化军事安全领域互信

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妨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入和拓展。而且，这些不可预测的地区性变量从更多元的维度测试和启发着这种多边安全协作的方式与措施，促使其向着不断完善和务实高效的方向发展。尤其在 2001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这一地区性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得到了突破性发展。2002 年 10 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中吉边界成功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次联合军演的规模虽然不大（双方共派出官兵 236 名，动用的装备主要是轻型陆军装备），但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与外国军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也是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第一次联合军演。这两个“第一”的突破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实现，足以说明双方对加强和深化安全合作的迫切需求。2003 年 8 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在中国新疆伊宁和哈萨克斯坦乌恰拉尔市举行联合反恐演习，各方参加演习的兵力达到 1300 人，并首次动用了歼击机、运输机、步战车、坦克等重型装备。^①这是上合组织国家首次举行的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同样是在中国与中亚国家领土上举行，而且是以中国和中亚国家军队作为主要参加方。2006 年 9 月，中国军队和塔吉克斯坦军队在塔境内的穆米拉克训练场举行了“协作-2006”中塔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此后的 2009 年在中国、2010 年在哈萨克斯坦、2012 年在塔吉克斯坦、2016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地，以“和平使命”为名的上合组织成员国联合军事演习逐渐成为常态化军事外交活动和安全交流活动。

^① 参见钱利华：“中国参加上合组织历次军演的幕后往事”，《纵横》，2014 年第 10 期，第 30-33 页。

无论是邀请中亚国家军队进入中国境内的训练基地举行不同规模的军事演习，还是受邀进入中亚国家领土参加联合军演，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和中亚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彼此信任的水平达到了相应高度。通过不同规模和不同情境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与中亚国家军队不仅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而且经过有针对性的、专业化的交流与切磋，在相邻地区复杂地形地貌的联合反恐作战能力也得到了有效提升。

（二）联手遏制极端主义渗透威胁

2004 年 6 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正式成立。多数中亚国家均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这个设于中亚大国首都的常设机构的协调和指导下，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反恐安全领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针对各国举办的重大国事活动，各国安全执法部门在上合地区反恐机构框架下的协作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如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与中亚各国积极协作，密切配合，以一次完美的安全合作范例为后来各成员国大型活动的安保合作积累了经验。又如 2017 年世界博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成功举办，也是各国职能部门通过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协调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在 2018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召开前，“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主任瑟索耶夫介绍，2013 年至 2017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机构共制止了 600 多起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活动，摧毁了 500 多个武装分子培训基地，抓获 2000 多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缴获了 1000 多件自制爆炸装置、50 多吨爆炸物、1 万多支枪支及 100 多万发子弹。2016 年至 2017 年，成员国共屏蔽了 10 万多家网站，这些网站共登载 400 多万条宣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信息”^①。在这些工作层面的成果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伊斯兰国”在中东崛起。2013 年，作为基地组织分支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宣布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联合组成“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虽然与中亚相隔遥远，但中亚国家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能力，导致中亚各国多地出现对中东“伊斯兰国”的政

^① 丁晓星：“上海合作组织五年成绩斐然”，2018 年 6 月 7 日，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180607/1000200033136201528335181212965000_1.html

治呼应，甚至出现中亚国家公民辗转前往伊拉克、叙利亚参加“圣战”的狂热行为。^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密切协作，不仅遏止了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向中亚地区的传播，而且防止了重大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另外，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与变化不断对中亚地区安全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对于防范来自阿富汗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毒品走私同样保持高度警惕，并在高层建立了协调磋商机制，指导安全执法部门开展务实有效的合作。对于中亚国家在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方面一向给予高度肯定和有力支持。2021 年 4 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于当年 5 月开始正式启动从阿富汗撤军。2021 年 5 月，“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二次会晤在中国西安举行。鉴于即将因美国驻军撤离而引起的阿富汗安全形势变化，在这次会晤期间专门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发表联合声明，“作为阿富汗的友好近邻和重要伙伴，中国和中亚国家高度关注阿富汗局势走向，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与周边国家和睦友好的阿富汗，并愿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②。对于即将面临的阿富汗安全力量失衡，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共同表示，“各方注意到外国军队已启动自阿富汗撤离，呼吁相关撤军进程以负责任的方式有序进行，确保阿富汗长期稳定，避免恐怖势力回潮”^③。2021 年 8 月中旬，阿富汗塔利班在攻陷了全国 34 个省座城市中的 30 个之后占领了首都喀布尔。“9·11”事件爆发后的 20 年间，以美国及北约“安全援助部队”为主要支点构成的安全格局骤然坍塌，作为阿富汗邻国的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安全与稳定面临重大变数。2022 年 6 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第三次“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期间，中国与中亚五国外交部领导人就阿富汗局势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影响提出“尽快调解阿富汗局势是维护和巩固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的一致立场，并对“塔吉克斯坦总统关于设立‘环阿富汗安全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关于制定和实施‘安全丝绸之路’

① См. Дмитрий Попов: ИГИЛ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ИСИ. 8 февраля 2016 г. <https://riss.ru/article/14304/?ysclid=18oheux2o9284790944>

② “‘中国+中亚五国’外长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1 年 5 月 13 日第 3 版。

③ 同上。

理念的倡议”表示重视和支持。^①中国与中亚国家对彼此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的尊重,促使相互间安全合作的互信基础更加坚实,适用领域更加广泛。

(三) 以新安全观支撑命运共同体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广泛影响到了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个角落,资本运动的最高形式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信息、人员的跨国家、跨地区流动,也促进了不同质文化的互动甚至对撞。原本存在于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缓冲地带被挤压、切割、销蚀得不复存在,而承载着不同质文化的族群在还未找到和学会彼此适应的方式时就已经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推至狭小的空间。被边缘化的文化族群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抱有高度戒备和警惕心态,甚至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但是,在以最新科技成果和最新管理水平为催化剂的全球化浪潮面前,任何抵制行动都显得微不足道。于是,与人类社会每次转折时期都出现过的历史脚本相类似,极端主义(首先表现为某种宗教情绪或某种民族主义的极端主义)被当作号召抗拒全球化冲击的旗帜被祭起。从“9·11”事件的爆发到“伊斯兰国”的兴起,从法国《查理周刊》遇袭到斯里兰卡复活节连环爆炸事件,带有文明冲突色彩的族群对抗无不显示出极端主义的政治特征,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国际安全环境受到严重毒化。

2014 年 5 月,在中国首次承办的亚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作主旨演讲时首次提出包括“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内容在内的亚洲新安全观,^②并倡议“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③。在当年 9 月举行的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集体之力、团结之力、合作之力,携手应对威胁挑战”^④,构建区域共同安全的创新理念是几代中国领导人在维护周边安全环境和坚持多边安全合作的长期实践和努力中不断完善的结果。虽然“新安全观”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 1997 年 3 月中

① “‘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 6 月 9 日, 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wjbzhd/202206/t20220609_10700891.shtml

②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353-359 页。

③ 同上,第 354 页。

④ 习近平:“凝心聚力,精诚协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13 日第 3 版。

国领导人在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上的发言，^①但促使其系统化和条理化的实践过程更大程度上是在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实践中完成的。2018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②作为对新时期“上海精神”的时代诠释的“新五观”之一正式提出，为这一刚刚完成第一次扩员、但仍把合作重心放在中亚地区的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提出了指导性思路。“共同”强调的是构建国际安全参与者的关联性；“综合”强调的是当今世界构成安全威胁要素的复杂性；“合作”强调的是实现国际安全条件的多边性；“可持续”强调的是安全与经济、稳定发展的互动性。这些构建地区安全格局的结构性特征在中亚地区均有最充分的表现和最典型的演绎。

早在 2013 年 3 月访问俄罗斯期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③同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比什凯克上合组织峰会时，向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各成员国发出倡议：“我们需要树立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意识，加强合作，联合自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④在 2018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旨发言中，再次向中亚各国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出“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⑤的号召。

当世界刚刚进入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一场全球性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各地传播。在 2020 年 2 月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以武汉为中心暴发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第一时间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而在一个月后，中亚各国也先后出现了由欧洲输入

① 参见楚树龙：“冷战后中国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9 期，第 12 页。

②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11 日第 3 版。

③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71-278 页。

④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14 日第 1 版。

⑤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11 日第 3 版。

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中亚各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方式和能力上的差异，疫情起因复杂，发展形势严峻，甚至出现多次反复。在打造安全共同体和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向中亚各国提供了大批防疫物资，而且民间各界捐钱捐物，通过中亚各国驻华使馆转赠中亚疫区。中国各地曾参与武汉会战的医护人员组成医疗工作组，分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疫区，把最新医学信息和宝贵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亚同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非传统安全危机面前体现了安危共担的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2022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与中亚五国元首共同举行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时指出，“30 年来，我们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联手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坚决反对外部干涉和策动‘颜色革命’，有力维护了共同安全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①。6 月 8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参加第三次“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时表示，“中国和中亚唇齿相依，安危与共，已成为并肩前行的命运共同体”^②。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 30 年来，在坦诚的政治互信基础上安全合作不断深入，为共同的稳定和发展需求营造出一片可信赖的空间。从安邻睦邻的合作伙伴到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安全合作历程与成果向世界宣示着一种新型国家关系特征：这种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共同安全前提下的政治基础，是平等的国家关系，这种平等又是建立在对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经济体量的悬殊，秉持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深邃价值观；这种平等合作关系追求的是互利共赢的共同目标，因而也是对 20 世纪以来曾

①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一起向未来——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1 月 26 日第 2 版。

② “王毅出席‘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中国新闻网，2022 年 6 月 8 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22/06-08/9775115.shtml>

经出现过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结盟对抗等片面安全观的反思与批判，在当代世界构建国际安全的多边主义行动中以理念与模式创新而独树一帜。基于上述认知正在成为广泛的共识，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需求不仅不会在经过了 30 年的历程之后下降，反而会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入一个更新、更高、更深入的阶段。

【Abstract】 Central Asia is an important neighbor o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It not only shares a long border, but also has inextricable links with China due to their geo-cultural ties. T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both the importance of “common secu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countries to achieve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and the necessity for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pragmatic cooperation in realizing these necessary conditions. In the wak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late 1991, the five independent nation-states that emerged in Central Asia urgently needed to build their own national security modes. Among them, the positioning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ditions. Meanwhile, China, which was entering the stage of all-arou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also had to establish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cooperative good-neighborly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iming at stabilizing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With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the whole regio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when coping with challenges of common security threats.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in developing the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first major achievement of cooperation has been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With changes in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and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regard promoting regional security as a common responsibility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own stability and gradually forming an

effective cooperation model. As the world witnesses major changes unprecedented in a century,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facing various new challenges. The concept of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and form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which each can rely on the other, is becoming a regional consensus which is highly recognized.

【Key Words】 China'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 Security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 Аннотация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соседом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периферии Китая, Китай 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меют не только общую протяжённую границу, но и обладают неразрывным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и 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связями. Эти особ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определяют важность «обще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основ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реди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условий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странами своих цел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 также определяю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этих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условий.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конце 1991 года пять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озникших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стро нуждались в создании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модел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условий стало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Китаем.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итай, вступающий в стадию всесторонних реформ и открытости, также должен был установить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ые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з-з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периферии. По мере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итуации уровен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стоянно повышал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ызовов общих угроз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ало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развития нового типа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момент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30 лет назад первое крупное достиж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ыло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и эволюци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итай 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и поддержании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такж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и укрепл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ак общ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эффективную модел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мир переживает невиданные за столетие глубо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Китай 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 различными новыми вызовами. Укрепление прагмат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котором можно положиться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м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консенсус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ериферий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итая, сообществ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 30 年 ——政策演进、重点领域进展及未来发展路径

李建民*

【内容提要】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 30 年来，经济合作在巩固双边关系和促进共同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对中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的外交资源，是地区稳定的基石之一。本文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互逻辑关系为分析基础，对 30 年来中国对中亚外交的构建沿革过程及其对双方经济合作的影响、经济合作机制和框架的不断充实完善及重点领域合作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梳理。认为 30 年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互利合作正是将“共谋发展”这一理念携手转化为实际成果的努力过程。指出现阶段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围绕中方在纪念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峰会上提出的“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了新时期需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把握机遇，推进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大思路及主要路径。

【关键词】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 中国周边外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D82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5-0074(21)

作为中国的西部近邻，中亚是中国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 30 年来，已实现由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的跨越升级，成为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和新时代构筑新型国际关系的样板和典范。经济合作是中国对中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的外交资源，在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方

*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引擎。三十而立，站在历史新起点上，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六国将继续往开来，携手共建中国-中亚发展共同体，共同开启和创造中国-中亚经济高质量合作的新时代。

一、中国对中亚政策的演进及其对经济合作的影响

根据地缘政治经济理论的解析，地理和区域是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地理因素是基本要素，对国家的发展、国家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包括领土、国家的区位价值、国家幅员形态、国家自然条件等方面。地缘政治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保证与邻国关系的稳定与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善是建立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的基础。地缘政治环境好，国际区域合作就容易开展；地缘政治环境差，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就难以开展。同样，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建立以经济纽带为联系的地缘政治关系，有助于在政治谈判中找到新的筹码和利益权衡的支点，紧密的地缘经济纽带通常发挥稳定政治关系的作用。对一个国家而言，如何营造有利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化解不利的地缘政治影响，并将地缘政治关系转化为地缘经济合作，是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中亚是中国周边大国战略博弈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地缘枢纽地位特殊，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又使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地缘战略和经济价值。加强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对维护地区安全、保证能源进口多元化、西向运输通道安全、促进共同繁荣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与中亚之间有着天然的毗邻优势和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联系，但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互隔绝。1991 年底苏联解体，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新时期。中亚五国独立后，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和

^① 参见尹朝晖：“地缘政治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导刊》，2011 年第 7 期，第 105-107 页。

主权的国家之一，并迅速与中亚五国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建交 30 年来，中国始终把中亚地区作为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践新型外交理念和模式的重要舞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基本原则为中国对中亚外交提供了宏观指导。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时，在涉及双方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中国和中亚国家相互坚定支持，尊重彼此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相互支持国家的独立和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这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则。和平、和谐、合作、非对抗、不谋求建立势力范围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外交的基本特性。目前，中亚已成为“中国周边首个战略伙伴集群”^①，各领域合作亦取得跨越式发展。中亚国家独立后，基于对自身实力和地缘环境的综合评估，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和出发点制定各国的外交政策，普遍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着眼于多边平衡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为了保证国家独立之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中亚各国均十分重视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哈、吉、塔三国与中国拥有 3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更是将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各国巩固独立建国成果的重要国家安全战略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解体后，正是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中国与中亚开启了相互塑造全新国家关系和构建对外政策的新时期。中亚各国与中国均认识到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把对方作为本国外交的优先方向。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为推动双方经济合作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30 年来，中国对中亚外交经历了起步、拓展、深化和进取四个阶段。其中，1991—1996 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的主要政策议题和任务是解决中苏历史遗留的边界划分问题和加强边界安全。1997—2000 年为第二阶段，以 1997 年参与哈萨克斯坦境内石油开发和修建中哈石油管道为标志，中国对中亚外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实现了从发展政治关系、解决边界安全为主向政治、安全、经济合作齐头并进的转变。2001—2013 年为第三阶段，以上合组织成立和运行为标志，中国对中亚外交进入全方位合作新时期。中国在与中亚关系当中开始了从后发性参与到从战略层面规划的转变，从多边层面通盘设计对中亚政策，并付诸实践。2013 年，中国把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全面提升至战

^① 贾平凡：“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望海楼）”，《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1 月 27 日第 1 版。

略伙伴关系层次，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的转变。2013 年至今为第四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突显了中亚地区在新时期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为破解中亚区域合作和发展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对中亚外交进入了积极进取的时期。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主动作为，对中亚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思想。“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政策设计和实施空间。建设六大经济走廊、实现“五通”等设想，丰富了地区合作的内涵，也创新了合作模式，成为深化经济合作的切入点和增长点。2020 年 7 月，“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正式启动，成为双方加强信任、推进合作、发展新型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渠道和有效平台。2022 年 1 月 25 日，在习近平主席的主持下，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峰会顺利举行。本次峰会是“首次以中国同中亚五国形式举行的元首级会晤”^①，也开启了中国和中亚国家相互关系进入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在地缘政治环境改善、中国对中亚外交层次和水平逐步提升的背景下，经济合作成为中国发展与中亚关系最为稳定的外交资源和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和中亚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关键利益交叉点多，发展战略契合度高。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就、扶贫经验和高科技产业，为中亚国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机遇。中国越来越有意愿向中亚地区提供经济性的区域公共产品，并在地区性议题上逐步扮演关键性角色，承担更多责任。30 年来，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发生了如下变化：合作方式从以双边为主到双边与多边结合，合作主体日益多元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从以一般贸易为主到贸易、投资相结合，进而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齐头并进；合作模式从功能性合作到机制化、制度化合作转变，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内涵丰富、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中国对中亚政策的演进轨迹及其对经济合作的影响，不仅生动突显了中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倡导的“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原则，也诠释了中国与中亚“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成功合作经验。经济合作的深化，不仅支持和带动了中国和

^① “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将擘画未来双方合作蓝图”，《人民日报》，2022 年 1 月 25 日第 3 版。

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实现地区和平和长期稳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合作机制和制度框架不断充实

经过 30 年的实践，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已初步形成一整套开展经济合作的双边、多边机制和各种对话交流平台，以促进双方合作的深入发展。

（一）双边机制

双边机制主要包括中国与各国元首会晤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高层定期会晤机制等。2004 年、2008 年、2011 年，中国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副总理级的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根据各国的特点，委员会分别下设经贸、能源、交通、农业、科技、安全等若干分委会，负责协调国家间各领域的合作、落实峰会及总理会议在相关领域的决议等重要任务。除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外，中哈之间还建立了总理会晤机制，以协商双方合作中遇到的难点，加快落实两国在各领域达成的共识。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建立了中吉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工作组和中塔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分委会机制，以促进双边地区合作。

（二）多边机制

中国与中亚国家将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开展经贸合作、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多边框架平台。早在“上海五国”时期，当建立边界安全和信任措施这一重要任务基本完成后，经贸合作便提上议程，成为领导人重点讨论的话题。2001 年上合组织成立后，经济即成为主要的合作领域之一。同年 9 月，随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的签署和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机制的建立，中国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正式启动。目前，在上合组织框架下，除元首级会晤、总理会议等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外，2003 年开始，形成了经贸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交通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科技部长会议等经贸高官委员会机制。其中，在经贸部长会议下还设立了海关、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力、现代信息和电信技术、贸易便利化 6

个专业工作组对接机制（后又增加质检专业工作组，共 7 个工作组），^①担负着落实峰会及总理会议在经贸领域的决议等重要任务。在政府合作机制下，2006 年、2018 年先后增设了实业家委员会、经济智库联盟等非政府合作机制。实业家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成员国在经贸、投资、能源、交通、电信、银行信贷、教育、科学、创新、卫生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②经济智库联盟是上合组织合作机制的创新，力图通过智库合作促进各国政府区域合作协议尽快转化为合作成果，提高合作效率，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智力支持。^③

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签署和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3 年 9 月）、《〈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实施措施计划》（2004 年 9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2009 年 10 月）、《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2012 年 6 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2018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20—2035）》（2019 年 11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2020 年 11 月）等重要文件，构建起多种深化经济合作的“路线图”，明确了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方向和优先领域，并为其提供了法律制度框架。

2022 年 9 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就深化合作、破解成员国发展难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上合成员国总共签署了 40 多份涵盖多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文件。主要成果包括通过《撒马尔罕宣言》，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维护国际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等 4 项声明，^④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服务贸易合作框架》《2023—2025 年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贸易发展联合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成

① 参见“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接受中央主要媒体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6 年 6 月 24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rcxw/201606/20160601346369.shtml>

② 参见“上海合作组织机构”，上海合作组织，<http://chn.sectsc.org/structure/>

③ 参见“智库专家：搭建智库联盟平台，助推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8 年 5 月 25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5/25/content_5293714.htm

④ 参见“共建亚欧大陆美好家园——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8 日第 1 版。

员国发展互联互通和建立高效交通走廊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园区库和创新集群构想》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在多边平台上促进各成员国实现区域合作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规划。

（三）投融资保障机制

投融资保障机制主要在上合组织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下运作，包括上合组织银联体、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多渠道的融资平台与资金支持体系。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项目主要通过以上机构提供资金。

上合组织银联体是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目前共有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 8 家成员行和 2 家伙伴行。上合组织银联体自成立以来，采取多样化的融资模式，通过中长期贷款为一些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解决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银联体中贷款规模最大的成员银行，在上合银联体框架下，国家开发银行与成员行、伙伴行合作开展了多期农业和中小企业领域的转贷款授信项目。截至 2022 年 8 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已与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成员行和伙伴行实现合作项目 63 个，累计发放贷款合计 146 亿美元（含 251 亿元人民币），涉及产能合作、基础设施、绿色低碳、社会民生、中小企业等重点领域”^①。

丝路基金自 2014 年底成立以来已多次在上合组织区域内进行大笔投资。2015 年底，丝路基金单独投资 20 亿美元成立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哈产能合作及相关领域项目投资。2017 年中，丝路基金与上合组织银联体签署关于伙伴关系基础的备忘录，拟与银联体各成员行“共同推进在上合地区开展多元化投资，构建各方长期高效的互利合作模式”^②。2018 年中，丝路基金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备忘录，“通过下设的中哈产能合作基金认购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部分股权”^③。

① “国家开发银行在上合银联体框架下发放 146 亿美元贷款”，《金融时报》，2022 年 9 月 15 日第 1 版。

② “丝路基金与上合组织银联体签署备忘录，推进多元化投资”，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5841.htm>

③ “丝路基金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备忘录”，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 年 6 月 8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57477.htm>

（四）中国-中亚合作论坛

中国-中亚合作论坛是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机制化交流的国家级合作平台，由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与中国地方政府合办。论坛自 2012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九届，为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推动务实合作、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 年 7 月 12—13 日，第九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以视频方式在北京、沈阳、大连同步举行。论坛以“团结合作，互利共赢，携手应对挑战，共赴美好未来”为主题，并围绕妇女发展、农业合作、教育合作和数字经济合作等问题举办了分论坛，就加强未来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

（五）展会平台

为促进新疆及西部省份与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各国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中国搭建了中国-亚欧博览会、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等区域国际交流平台。其中，中国-亚欧博览会会址设在新疆乌鲁木齐，自 2011 年以来已举办了九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会址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自 2003 年起，中国商务部已连续 18 年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现已成为中国与中亚贸易投资合作的重要且有影响力的贸易投资合作平台。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中亚各国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及各类合作机制对接，推动经济合作步入快车道。

三、重点合作领域的推进

（一）贸易和投资规模快速增长

贸易和投资是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双方经贸合作的基本特点是起点低、发展快、互补性强、贸易紧密度高。建交 30 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开放市场，共享发展机遇，经贸合作从无到有，稳步发展。自上海合作组织 2001 年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额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从 1992 年建交之初的 4.6 亿美元增至 2021 年的 500 多亿美元，30 年间增长幅度累计超过百倍，中国是中亚各国最大或主要的经贸伙伴。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中国在中亚的主要经贸合作伙伴。2022 年 1—7 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相互贸易额达到 176.7 亿美元，占哈萨克斯坦外贸总额的 22.6%。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乌贸易额占乌兹别克斯坦外贸总额的 18.8%。2021 年以来，中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经贸合作集中于天然气领域，中国已经连续 10 年居于土库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改善。中国-中亚的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种类广泛，包括高新技术产品、普通消费品及机械设备等；中亚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则相对集中，结构单一，以能源、资源产品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能源需求具有刚性，而轻工消费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导致我国进口需求缺乏弹性。为改变现状，近年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通过单边开放市场，扩大来自中亚成员国的粮食和农产品进口，培育了新的贸易增长点。2020 年，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启动了首个“出口加速”计划，将中国定位为市场，将食品行业作为优先领域，制定企业对华出口个性化路线图和操作指南。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农业合作的重点国家，自建交以来，在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业科技合作和农业劳务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2021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有 16 种农产品获得了对华出口许可。……对华农产品出口占其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 6.5%，中国首次进入前三大乌农产品消费国行列”^①。

除贸易外，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交通、电力、矿产、农业等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大量合作项目的实施，使中国对中亚投资规模和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亚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140 亿美元”^②。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中亚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占中国对中亚投资总额的 70% 以上。中国是乌兹别

① “中国首次跻身乌兹别克斯坦农产品消费国前三位”，中国新闻网，2021 年 11 月 10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1/11-10/9606427.shtml>

② “商务部成功举办中国-中亚经贸合作论坛：稳中求进，奋楫笃行，推动中国中亚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201/20220103237653.shtml>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塔吉克斯坦第二大投资来源国。近年来，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推动下，中国对中亚投资开始从传统的能源领域向非资源领域拓展，涉及电力、电信、化工、电子、轻工、纺织、皮革加工、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等，投资领域日趋多元化。

中国企业在该地区承揽的公路、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带动了大量能源、铁路、化工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中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具规模的地区之一。^①

（二）能源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中亚能源合作首先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诉求，建立在双方能源资源禀赋、能源市场互补的基础之上。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气消费国和进口国，双方能源资源合作互补性强，具有开展持久、稳定合作的条件。同时，中国与中亚“高水平的政治互信为开展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能源合作是战略性合作，没有良好的政治互信根本无法顺利开展。长期以来，中国对中亚国家坚定奉行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政策，同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其中四国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这种相互信赖的密切政治关系已经成为双方能源合作的独特优势”^②。

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起步阶段以油气资源贸易合作为主要内容。以 1997 年中石油获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项目的资产经营管理权为标志，中国与中亚油气合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多年发展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已形成集勘探开发、管道运输、原油提炼、工程技术服务及油品销售等上中下游业务为一体的能源合作链，并与管道沿线国家之间建立起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合作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实施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A 线、B 线、C 线（D 线在建设施工中）以及中哈原油管道等一系列战略项目，中国帮助中亚国家建立起完整的油气工业体系，提升了相关国家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能力和水平，带动了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据统计，中石油通过驻中亚各企业，为资源国政府缴纳税费累计超过 300 亿美元，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

^① 参见凌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及建议”，《国际观察》，2010 年第 5 期，第 19 页。

^② 姜安印、刘博、黄洁：“‘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研究述要”，《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65 页。

岗位 3.4 万余个，并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超过 2 亿美元”^①。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截至 2021 年初，“中国石油在哈参股 7 个油气合作项目，为哈当地提供 3 万余个直接就业岗位”^②。中亚天然气管道自 2009 年 12 月投入使用以来，已安全平稳运行 12 年，截至 2022 年 6 月，通过该管道累计对华输气已经超过 4000 亿立方米，惠及中国 5 亿多人口，^③而“中哈原油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 1.56 亿吨”^④。

中亚是中国管道天然气主要的进口来源地，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1 年，来自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管道天然气占中国管道天然气进口的 75%，其中，土库曼斯坦占比 56%、哈萨克斯坦占比 11%、乌兹别克斯坦占比 8%，对土库曼斯坦是高度依赖。^⑤反过来，中国也是土库曼斯坦最大的天然气贸易伙伴，近年来在天然气出口、气田开发、工程技术服务等领域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成为中土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尽管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依存度各不相同，中亚五国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合作中的占比都不到 1%，但在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开展周边外交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在与中亚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绿色发展。除传统能源领域外，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地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进程加快，合作种类逐步多元化，从早期的电网改造、输变电工程，拓展到小型水电站、小型风电光伏实验装置，再发展到目前涵盖风电场、光伏电站、水电站及技改、太阳能热能等众多可再生能源种类和领域。

总体看，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具有高度的战略互补性，符合双方的战

① “中亚油气管道点亮丝路经济带”，人民网，2014 年 11 月 17 日，<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4/1117/c71661-26038026.html>

② “中资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分析”，中国能源网，2022 年 1 月 7 日，http://www.cnenenergynews.cn/youqi/2022/01/07/detail_20220107115285.html

③ 参见“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向我国输气超 4000 亿方”，新华网，2022 年 6 月 16 日，http://m.news.cn/2022-06/16/c_1128747180.htm

④ “中哈共同发展繁荣之路越走越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9 月 24 日第 6 版。

⑤ 2021 年我国油气进口来源国分布系作者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而得。

⑥ 参见“中土（库曼斯坦）能源合作分委会第七次会议顺利召开”，国家能源局，2021 年 11 月 21 日，http://www.nea.gov.cn/2021-11/21/c_1310323422.htm

略与经济利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对能源转型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议题有重要意义。中国从中亚获得了大量而稳定的能源供应,中亚国家则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先进的技术和庞大而稳定的油气出口市场,既有助于中国实现油气进口的多元化,也有力地推进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环境保护,有助于促进双方的共同繁荣。

(三) 互联互通为经济合作提供内生动力

中亚五国都没有出海口,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双重内陆国。这些国家地处内陆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发展长期落后,物流效率低下,这种状况不仅加大了中亚国家对外经贸活动的难度,而且还限制了该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进而也成为中亚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亚国家将其视为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的难得机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开始主动与之进行战略对接,中亚重点和优先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根据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的结果,“一带一路”陆路运输的全面实施,将使中亚国家的贸易额增加 1.9%,中亚区域内部贸易额增加 35%,国外直接投资流增加 7.3%,GDP 增加 0.13%。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使中亚的贫困率下降 1.1%。^①还有预测认为,根据现有的交通项目、计划和战略测算,“到 2030 年,中亚部分运输通道的运量将增长两倍,经济实力将提升 50%”^②。在中亚地区,已有联合国、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多个框架机制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计划。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基础设施的建设联通呈现加速发展态势。近年来,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一批互联互通合作项目在中亚地区相继建成,初步形成了涵盖公路、铁路、油气和通信的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跨国、跨区交通走廊的建设使中亚成为联结中国、欧洲和亚太的重要通道,中亚国家实现了与世界主要港口的联通,为其积极参与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① См.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в кризисный период. 2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postsoviet/problems-razvitiya-infrastruktury-v-tsentralnoaziatskom-regione-v-krizisnyy-period/>

^② 拉希德·阿利莫夫:“中亚:内陆国家融入全球贸易海洋之路”,人民网,2020年12月11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1211/c1002-31963615.html>

重要支撑。

为深化交通合作，围绕运输便利化合作，在多边层面，上合组织国家在 2014 年 9 月 12 日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基于该协定，将在从太平洋（中国连云港）到波罗的海（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际道路运输通道上使用全新的多边许可证机制，为新建和改造地区国际道路开辟广阔机遇。该协定对中亚国家意义重大，中亚各国境内的 8 条国际公路绿色通道（哈萨克斯坦 4 条，吉尔吉斯斯坦 2 条，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 1 条）分别对接过境中国的 5 条通道和过境俄罗斯的 3 条通道，《协定》落实生效将大大缩短中亚内陆国到海洋的距离，有助于经贸合作提质增速。在双边层面，中国与哈、乌、吉、塔等国之间建立了双边政府交通分委会，有效推动了政府间合作。

随着国际通道规划建设的平稳推进，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合作获得了新助力。首先，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高效运行带来多重效应。中欧班列自 2011 年 3 月成功开行 11 年来，已形成“三通道”“五口岸”“多线路”“多模式”的基本格局。中欧班列的开行，不仅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航运运输的出口方式，提高了出口的便利化水平和经营效率，还给过境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欧班列涉及近 70 个国内开行城市，以及欧洲和亚洲各国诸多城市，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均是重要的中欧班列过境城市。中欧班列开通以后，哈萨克斯坦已从传统的内陆国转型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年均过境运输收入达到 50 亿美元。2019 年，超过 90% 的中欧班列过境哈萨克斯坦，占哈过境运输总量的六成以上。^①俄乌冲突爆发后，哈萨克斯坦作为西线通道重要陆路走廊的重要性凸显。哈萨克斯坦希望充分利用目前开放的机遇，成为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运输和中转枢纽。中欧班列的运行还引发了国际货物运输模式的变革，推进了国际贸易便利化进程。2017 年 4 月 20 日，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等七国铁路部门正式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为服务国

① 参见“重磅！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哈中将建第三条边境铁路”，京报网，2022 年 7 月 5 日，<https://news.bjd.com.cn/2022/07/05/10113251.shtml>；樊江洪：“60 多个城市开通 73 条中欧班列线路，要解决在哈口岸拥堵问题”，上观新闻，2022 年 5 月 21 日，<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485291&sid=67>

际国内双循环、稳定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发挥了重要的通道作用。其次，助力中亚各国国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在中国政府优惠贷款的助力下，由中国企业参与实施的吉尔吉斯斯坦北南公路、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塔吉克斯坦瓦赫达特-亚湾铁路、中吉乌公路等项目相继竣工；中国西部-欧洲西部公路项目哈萨克斯坦境内段已经完工，极大改善了中亚国家之间的跨境物流条件，缩短了货物陆路运输时间，增强了各国的发展能力。2022 年 9 月，在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就中吉乌铁路项目签署合作文件，中吉乌铁路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成后，将完善新亚欧大陆桥南部通道，拓宽其运输范围，提升新亚欧大陆桥在国际运输中的地位，造福沿线国家。

（四）产能合作助力中亚国家工业化

关于国际产能合作，目前官方和学术界并无统一的界定。产能合作一般可理解为在两个或多个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产能资源跨国或跨地区配置的活动。产能合作的渠道主要有两种，即以产品输出与产业转移方式进行产能位移。从产业层面看，国际产能合作是针对某个特定的领域、不同国家根据分工协作及技术的复杂程度不同而进行的合作过程。该过程主要包括产品内、产业内及产业间的分工合作。实践中的通常做法是通过引入或输出生产设备、先进技术和方式，使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落后一方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现代化水平。因此，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被认为是提升工业化水平的路径之一。现阶段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中国处于工业化后期，中亚国家分布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①双方都面临工业化挑战。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梯度，互补性强。基于此，加快推进和持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将有助于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同时也将推动中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是国际产能合作的先行者，被视为国际产能合作的典范。自 2015 年启动双边产能合作以来，在战略层面、合作机制、具体项目

^① 参见《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上均取得了积极进展。在两国政府有关部门推动下，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和发展部共同设立中哈产能与投资合作协调委员会负责框架协议的执行，指定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为项目对接机制的牵头单位，负责项目对接、跟踪和更新。此外，还成立了 20 亿美元的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哈产能合作及相关领域的项目投资。截至 2021 年，双方已举行了 19 轮产能和投资合作对话，确定了 56 个投资总额约 276 亿美元的产能合作重点项目，涵盖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水泥、平板玻璃、医药、农产品、汽车、能源等领域，主要以在当地投资建厂或中方设计、施工方式进行。截至 2020 年，在 56 个重点项目中，15 个正式投产，16 个在建，8 个处于前期准备阶段，投产和正在实施的项目总投资金额达到 77 亿美元。中哈产能合作不仅有效带动了我国装备及技术出口，还填补了哈萨克斯坦国内工业领域的空白，有助于哈推进工业体系建设，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促进自身社会 and 经济发展。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数据，2020 年，哈经济结构改善，加工制造业在工业中占比从 2019 年的 39.4% 提高至 48.8%，增长 9.4 个百分点。轻工业、汽车制造业和金属制成品生产呈两位数增长，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①

除哈萨克斯坦外，中国还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共同推动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与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中塔合作规划纲要》，涉及科技、农业、能源、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多个领域。2019 年 9 月，由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联合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聚氯乙烯生产综合体项目正式投产，相关产品不仅能满足乌兹别克斯坦国内需求，还可出口至周边国家及市场，带动国内相关化工产业的发展。

四、未来发展路径

（一）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 30 年来，不断拓展多方位合作，携手同行，共谋

^① См. За 11 месяцев 2020 года внешнеторговый оборот Казахстана составил \$77,7 млрд. 12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news.myseldon.com/ru/news/index/243691601>

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双方的民生福祉明显改善。与 30 年前建交初期相比，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国际秩序和国家关系深刻调整、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汇的形势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面临的困难增多，已知和未知的挑战上升，但也不乏新的机遇。

从中亚地区看，多国博弈、俄乌冲突、政局动荡、新冠肺炎大流行是影响经济合作的四大关键性因素。

1. 多国博弈。中亚地区历来是大国博弈角逐的舞台，除俄、美、中三个大国外，欧盟、土耳其、印度、伊朗、日韩等国一直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在国际关系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下，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 俄乌冲突。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已成为影响全球粮食、能源、供应链、物流运输各方面的重大变量，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外部对劳务移民需求不减、对俄再出口以及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人口和业务的大量流入带动房地产和餐饮业短期繁荣，中亚国家经济在复杂局势下保持了逆势上扬。但在全球经济可能进入衰退的预期下，仍不排除经济掉头下行的可能。

3. 政局动荡。中亚国家在独立 30 年后进入政治发展的新时期，2022 年以来，多个国家出现动乱，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生边境冲突。这些事件不仅关乎一国政治走向，也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间合作造成冲击。

4. 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国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原有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面对新形势的下一步经济合作，需要立足新发展格局，着眼长远，审慎布局。

（二）新时期深化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的思路与主要路径

2022 年初，在纪念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中方提出“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①的倡议。面向未来，中国将与中亚国家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合作带，利用“中国+中亚五国”新合作机制，

^①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一起向未来——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1 月 26 日第 2 版。

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原则推进中国与中亚区域整体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先行区，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在这一大思路下，六国将紧密围绕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把握机遇，推进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以建交 30 年为新起点，做好新时期深化经济合作的顶层设计。新形势下，双方对深化经济务实合作既有良好的政治意愿，也有良好的基础。中亚在国际运输、经济转型和工业化等方面对华依赖度提高，增加了双方开展经贸投资和大项目合作的机会。双方应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完善全方位的经贸合作机制。以中国与中亚国家商务、经贸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中国中亚经贸合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倡议》为基础，制定落实倡议的具体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加快与中亚各国商签和落实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针对中亚国家扩大对中国出口、平衡双边贸易的关切，继续采取切实措施加大自中亚地区进口的力度和规模，扩大贸易产品名录，畅通合作渠道，推动中亚国家更多优质商品和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全力落实到 2030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 700 亿美元的目标。

2. 筑牢法律基础，提升双方合作的制度化水平。政府主导色彩较浓、大项目推动，是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的重要特点。30 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虽然取得长足进展，但由于尚缺乏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有关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和机制性保障，双方合作的效率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为此，双方应积极探索建立战略与规划对接、经贸合作、投资保护、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合作与共同治理机制，对已有的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进行补充完善，根据新的变化签订新的投资保护协定，探索达成次区域和区域投资协定的可行性。继续落实海关通关、检验检疫、物流运输、标准认证、支付结算等全方位便利化措施，消除壁垒和限制，增强相互依存度，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具有法律依据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

3. 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将非资源和民生领域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新形势下，中亚各国均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施政重点，提出了改善单一经济结构、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发展战略。针对这一情况，未来一段时期内，除继续拓展落实经贸合作、产

业投资、能源资源合作、设施联通等“高大上”项目外，应利用中亚各国在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潜力，推动在新兴领域的全面合作，进一步挖掘中小企业和高科技合作等新的增长点。在中国“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应更兼顾在减贫、公共卫生、医疗救助、教育文化等领域推动建设能满足中亚国家民众需求的“小而美”项目，帮助中亚地区民众提高发展能力，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使共建“一带一路”成果能够惠及更多人，进一步深化互信，沟通民心民意。

4. 以产能合作促进中亚国家包容与可持续的工业化。国际产能合作与其他较单一的分工模式相比更强调合作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互动性，利于形成全方位、可持续和不断深化的合作格局。中亚国家均提出了实施加快新工业化战略的任务。中国拥有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和前期产能合作经验，有能力在中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可将深度助推工业化作为与中亚开展合作的优先方向，主动推进和实现与各国工业发展战略对接，因国施策，进一步加强宏观产业政策协调，推动落实现有产能合作项目，共同培育以“互补合作”为导向的地区分工体系模式，实现区域可持续的工业化。

5. 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合作。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和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以“产业链本土化、供应链多元化、产业分工区域化”为内容的重新洗牌。面对这一新态势，在助推中亚国家工业化、工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可谋划构建面向未来的欧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充分发挥各国在市场、资源、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深化各国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领域的合作，包括能源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合作，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消费的全产业链合作以及医学、医药、医疗全方位合作等。

6. 持续推进互联互通，巩固和维护中亚作为联通亚欧的国际交通走廊和重要枢纽地位。从保证欧亚大陆供应链和运输链畅通看，俄乌冲突后，中亚在中国西向陆路运输中地位上升，保证交通和供应链安全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任务，中国提出完善六国合作的“四梁八柱”^①的战略任务，构

^① 指中国连接世界的全球物流体系。“四梁”即全球物流信息系统、全球物流标准体系、全球物流政策体系和全球物流运营体系。“八柱”即国际铁路运输网络、国际公路运输网络、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国际海运网络、国际管道网络、国际邮政和快递网络、国际仓储网络及国际配送网络。

建中国-中亚交通走廊，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网络。下一步需切实落实关于深化“中国+中亚五国”互联互通合作倡议提出的各项措施，挖掘双方在跨境铁路运输、国际公路运输便利化、加强口岸通关能力建设等“硬联通”和技术、国际标准认证、通关便利化等“软联通”多个领域的合作潜力，聚焦高质量发展，构建全方位、复合型、绿色环保、可持续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提升跨境物流服务，挖掘多式联运潜力，保证中欧班列安全高效运行，按既定工作计划有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

7. 以重点创新领域为抓手，打造创新能力。绿色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电子商务、信息通讯、现代农业是下一步中国与中亚进行务实合作的新领域和重要方向。为稳步推进上述领域的合作，可以上合组织为依托，协调上述领域的政策，加快商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合作备忘录，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同时，可建立中国-中亚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深化智能制造领域和新基建领域（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打造区域数字伙伴关系，共商数字经济发展标准与规则，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培养适应新形势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还应统筹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和维护能源安全的关系，积极打造可再生能源示范性项目，推动能源合作提质升级。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30 years ago,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exert its influences and an effective diplomatic resource in Central Asia, laying foundation for regional st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ogic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a's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ts impacts on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frameworks, and the progress in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s a process of efforts to turn the concept of “seeking common development” into practical results.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grea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erms of the time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current China-Central 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Revolving on China’s proposal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closer China-Central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t the summit mark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ideas and main means for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seizing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 Key Words 】 China-Central 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момент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30 лет назад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укреплени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действии общему процветанию, оно стало для Китая важ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оказания влияния и эффективным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 ресурсом в регио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краеугольных камне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а основе анализа взаимной логической связи между геополитикой и геоэкономикой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тщательно 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процесс постро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ита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30 лет и её влияние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оронами, постоянное обогащение и улучш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и рамо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 также х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ключевых областях. Полагается, что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30 лет – это процесс совместной работы по воплощению концепции «об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В статье также отмечается, ч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он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ред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етерпели серьёз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опираясь на инициативу Китая по «совместному построению более тес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общим будущим», выдвинутую на саммите, посвящённом 30-летию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пятью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координирова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и развитие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новой эпохой,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продвигать значимые идеи и основные пути для кач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ей, кита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оседним странам, совместное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единой судьбой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 один путь»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大国关系研究

追求承认的斗争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

宋 伟*

【内容提要】追求承认的斗争不仅关系到个人和本体性安全、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也是一种人性的基本诉求,即希望获得自由与平等。因此,追求承认的斗争构成了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根本动力。追求承认的斗争会导向更加分散化的社会体系和国际秩序,以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的兴起。在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带来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变革,以及围绕大国地位的斗争,最终导致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在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造成了强调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但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等正在挑战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政治认同的地位,导致国家和国际政治中出现日益严重的“极化”现象。

【关键词】追求承认的斗争 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 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

【中图分类号】D5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5-0095(23)

与技术革命、资本力量等因素一样,追求承认的斗争是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根本动力之一,它根植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心理之中。世界政治需要关注人、群体和国家的各种诉求,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欲望的存在。正如中国著名政治学者杨光斌教授所指出的:“世界政治说到底还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大诉求,精神层面的诉求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因此以精神为本体论或研究单元的社会科学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①在人类的各种诉求中,精神层面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为自身认同的合法性与地位而斗争。认同的英文是“identity”,有些时候也翻译为“身份”。作为名词的“认同”和“身份”带有微妙的差异。认同可以是一个名词,指的是个体或者群

*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① 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26页。

体所持有的某种观念,例如女性主义者强烈坚持“男女平等”的观念、美国自认为是“民主世界的灯塔”。而“身份”一般指的是整个社会或者群体对其中的某个个体具有的共同认知,这种认知可能与该个体的自我认同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美国自认为是一个“仁慈的霸权”,可大多数国家并不认为美国具备这样一种身份。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为了捍卫自身的认同,就必须获得其他行为体的承认。获得对等承认(reciprocal recognition)^①是认同政治中最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

简单地说,认同是某个个体或者群体对于自身存在的独特性、意义的认知,它虽然根植于自己的领域内,却形成和固化于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中。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等美国政治学者认为,认同“指涉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性(自我认同)的形象。”^②如果某一行为主体得不到来自他者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了他者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承认,那将会对主体的自我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③在现实的世界政治实践中,人们持有各种独特的认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关键在于,这些认同如何能够得到他者的承认,因此人们会为了获得足够的承认而斗争。可见,认同视角的核心,其实是追求承认的斗争,而不是着眼于多样化的认同本身。

一、认同的视角:追求承认的斗争

在讨论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时,我们所运用的认同视角,并不着眼于认

① “获得对等承认”大体上等同于“对称的承认”(symmetric recognition)、“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要求平等”(demand for equality)或者“完全承认”(full recognition),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否定不平等的承认结构或者说主奴关系(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See Saul Tobias, “Hegel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The Owl of Minerva*, 2006-2007, Vol.38, No.1-2, pp.101-123; Philip Tonner, “Hegel on the ‘Other’: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recognition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Electronic Journal for Philosophy*, February 2009, <https://e-logos.vse.cz/pdfs/elg/2009/01/02.pdf>, p.13.

②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4.

③ [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337页。

同本身以及据此来解释行为体的具体行为，而是探讨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基于对自身认同的追求所展开的斗争。这种斗争会导致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追求承认的斗争之所以如此重要，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认识。

一方面，只有行为体的认同得到其他人的承认，建立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身份，那么它才能获得相应的安全感和其他利益。如果其他人不承认这一行为体所具有的认同，那么它就会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之中。正如温特所指出的：“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的和外在的结构建构而成的。”^①如果一个行为体自己宣称的某种身份无法得到外界社会的承认，那么这个身份就是无效的。^②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生存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生存（physical survival，即确保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与完整）以及社会生存（social survival，即建立和维持稳定的身份）。^③社会性生存也关系到国家的本体安全，例如一个新生的政权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其他国家的承认；只有当被其他国家承认为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时，它的主权安全和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同时，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想要获取某种利益，往往必须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才能实现。如果其社会性身份得不到承认，那么即便不面临实体性的安全问题，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很难得到满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大国情结促使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大国荣耀，即便与西方的对抗超出俄罗斯的实力，俄罗斯仍然会去谋求作为世界大国的身份。^④承认不会自动到来，所以每个行为体都必须为自己的身份争取他者的承认。^⑤因此，追求承认的斗争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行为体试图获得他者（尤其是“显著性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② Yana Zuo, “Self-Identification, Recognition, and Conflicts: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Identity, 1949-2008”,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p.154.

③ 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8.

④ See Mark Urnov, “Great 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No.3-4, p.305.

⑤ 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2002, Vol.37, No.2, p.120.

他者”）的承认，以确保其在体系秩序中的特定身份。^①无论是在国际关系还是在国内政治中，对承认的追求都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

另一方面，对承认的追求根植于人性之中，个人、群体和国家都希望获得自由和平等，而不是陷入某种“主奴关系”之中，但同时人性中又有希望获得不平等承认的部分。法国哲学家卢梭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②黑格尔认为，“一个是独立的意识，以自为存在为本质，另一个是不独立的意识，以生命或为他存在为本质”。换言之，主人是被承认的自我意识，主人的自我意识是通过奴隶的承认而建立起来的。^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性中的“欲望”部分，而渴望承认则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动力。他引用柏拉图的“thymos”一词，认为灵魂有一部分渴望得到尊重。“对性别工资差距的批评可能是源于对平等的要求，但是人类的承认渴望还表现为对优越感的追求。亿万富翁继续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拥有最大的公司，或者最大的基金会。他们进入政界，是因为那里将赢得更大的奖项，需要指挥更多的观众。”^④既然不同个体与国家存在着天赋与实力上的差异，即一部分人、一部分国家会追求和享受现有的不平等承认，而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国家则希望获得自由、摆脱这种不平等的状态，那么追求承认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但是，推动对等承认的个体和国家是居于多数的，而且随着技术的扩散，它们越来越有能力反抗现有的不平等承认结构，这使得从长远来看，世界政治的承认结构是逐步朝着分散化和平等的方向发展的。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研究强调了追求承认的斗争对于世界政治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根本性的意义。相比无政府状态和暴力技术，他认为承认诉求的作用是更具有本源性的，“在不对等承认结构中，那些没有受到完全承认的行为体会继续奋斗。所以，基于不对等承认的

① Michelle Murray, “Identity, Insecurity,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The Tragedy of German Naval Ambition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Security Studies*, 2010, Vol.19, No.4, p.660.

②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页。

③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

④ David Fowkes,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9, Vol.17, No.2, p.714.

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必然是不稳定的秩序。”^①温特认为争取承认的斗争是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一是个人之间的竞争，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是局部的稳定形式，但国家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全球体系之中，要解决这一不稳定状态，必然导向世界国家的产生。促进这一具有目的性过程的机制，是微观层次上的“争取承认的斗争”和宏观层次上“无政府文化”的互动。在温特的研究中，暴力技术的发展，将逐步使强国和弱国进行协调，改变原有的不平等承认的体系，最终迈向集体安全和世界国家。“如果大国坚持保留不对等承认，个人或小国就会继续争取承认的斗争。由于毁灭性越来越强大的武器的扩散，个人和小国使用暴力的能力也会增长，因此也就会越来越威胁到大国的安全。中小国家也有着联合的动机，合力‘制衡’大国。”^②暴力技术——例如核武器——的进步和扩散，导致大国和中小国家的暴力能力逐步趋于平等，大国不得不接受“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关系中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追求承认的斗争最终所导向的是日益平等、分散化的国际体系，但是短期内大国基于其力量优势仍然会保有和坚持不对等的承认。

二、追求承认的斗争如何改变世界力量格局

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指的是不同国家或者社会群体之间的实力对比，这种实力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世界政治的思想格局指的是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起伏，这种兴衰起伏和力量格局的变化是一体两面的，却又能够直接塑造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秩序。追求承认的斗争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根本动力之一，通过不同的层面和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在国内政治层面还是在国际关系层面，追求承认的斗争都会通过阶级斗争、民族独立与解放、获得与本国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构建有利于本国尊严与利益的国际秩序等途径，来尽可能实现本群体或者国家、国家集团的承认诉求。这些努力目标最终能否得到实现，在于能否实质性地改变一定时期内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59页。

② 同上，第61页。

（一）追求承认的斗争与世界力量格局

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承认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一部分国家为平等的承认而斗争，一部分国家为不平等的承认而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蔑视，哪里就有追求承认的斗争。在短期内，追求承认的斗争会带来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及大国之间围绕霸权地位的竞争；从长期来看，这两种斗争最终会导向相对平等的、分散化的国际体系。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对追求承认的斗争如何塑造世界力量格局，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和国际行为体自身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是追求承认斗争的一个结果，而这种体系性的变化自然也意味着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在中世纪时期，神圣罗马皇帝掌握着名义上的最高世俗权力，而天主教教皇则掌握着最高宗教权力。教皇一度甚至希望建立自己的军队，王权受到明显的压抑或者“蔑视”。在这一背景下，西欧国家的君主们通过对外战争的机会削弱贵族和领主，逐步巩固自己的王权，并希望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的霸权下解放出来。当然，这一时期追求承认的斗争局限于上层，并没有体现出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动员形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进入到政治动员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情。^①近代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和约“通过承认德意志众多诸侯国和瑞士、荷兰的主权，将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开始讨论的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观念，以主权国家体制的形式确立下来。从此，人们以国家为最高权威，不再承认有任何超越国家之上的约束者或者所谓的世界统治权。”^②世界力量格局完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来进行界定，极大地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承认。

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味着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国际体系的建立，但事实上不平等的主奴关系仍然广泛存在。西方国家由于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在国际体系中建立了压倒性的力量优势，并据此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在此国际体系中，存在宗主国、殖民地和中国的

① 李滨：《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② 刘德斌等：《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在这个秩序中享受着不平等的承认，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大多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二战结束以后，大批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从而在法律层面基本实现了平等的承认。这种斗争也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力量分配。“联合国大会在新的成员国没有蜂拥而至之前，美国几乎总是能够争取到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经过几年的时间，新的成员国抓住联合国大会中的程序性机会控制了议程设置。结果，联合国大会在有些安全问题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例如在罗得西亚的问题上（之前英国把该问题送交安理会）、在纳米比亚的未来问题以及中东局势的问题上。”^①因此，尽管美国等西方强国仍然在一些国际机制中拥有不平等的承认，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中，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不仅使得成员国们拥有基本平等的承认，也使得美国等国家的实力优势被削弱了。

其次，追求承认的斗争导致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出现了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而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得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能够建立起更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而深刻塑造了现代以来的世界力量格局。西欧专制王权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开始能够主导自己的税收，从而相对封建邦国有着天然的优势。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开始成为强有力的一种政治思潮。对外，民族主义要求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地位；对内，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属于整个民族，而不再是某个君主。民族主义的信仰使得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相信，民族认同是最重要的认同，为了本民族的独立和相应的国际地位可以牺牲自己，个人的承认很大程度上与民族的承认融合在一起。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正是依靠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全国力量，使得法国能以一己之力与全欧性的反法同盟展开长达二十多年（1793-1815）的对抗。“西欧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欧美人创造和捍卫了一整套财产权和人类自由的概念。……结果，个人被诱劝去从事经济活动。……例如，17世纪第一部专利法的创立（知识产权的概念），给予个人一种刺激去从事发明活动，

^① Leon Gordenker, “The UN System in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UN System”, in Toby Trister Gati ed., *The US, the UN and the Management of Global Chang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6.

从而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①知识产权的概念不仅仅具有财产性的意义，也是对个人贡献、价值的一种承认。而工业革命则决定性地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的力量优势，英国因为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成为 19 世纪的霸权国。

最后，围绕承认的斗争会导致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博弈和霸权兴衰，最终导致世界力量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于现有的霸权国来说，它不仅要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规则，也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对于其他大国来说，它们都希望获得更高的承认，当然前提条件是自身开始具备足够的实力。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享受着最高地位的承认，只要这种承认能够稳固存在，那么它在国际秩序中的各种利益就能够得到保障。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教授如此论述：“只要霸权国能够保持霸权地位，它的国家安全、经济财富、意识形态观念、社会价值观念等等也就得到了保障。所以，霸权护持代表了霸权国的整体社会利益，这就是国家利益概念的整体性。同时，在整个霸权时期内，护持霸权地位会自始至终地被霸权国当作根本利益。”^②当然，秦亚青教授在这里讲的霸权地位是霸权实力地位，而不是直接的承认，但霸权国的霸权地位是否稳固，一方面取决于霸权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承认霸权国的这一地位。反过来，受到“蔑视”和不平等承认的国家则会努力追求承认，它们可以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联合其他有类似诉求的国家进行反抗，从而导致国际体系的平等化和分散化。托马斯·安布罗西奥（Thomas Ambrosio）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寻求大国承认，是因为它对世界地位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③俄罗斯政治精英把过去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视为自身大国地位的历史基础，因而西方国家在这些地方的政治干涉就等于使俄罗斯丢失了大国地位。^④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32 页。

②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31-132 页。

③ Thomas Ambrosio, *Challenging America's Global Preeminence: Russia's Quest for Multipolarity*,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5, p.VIII.

④ See Anna L. Clunan, "Historical Aspi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No.3-4, p.289.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主导国和追随国之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领导”与“追随”的关系。但是，随着卡塔尔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卡塔尔逐渐产生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独立的国家追求，不甘于作沙特背后默默无闻的“小跟班”或追随者，而是致力于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独特的角色。^①

（二）追求承认的斗争与国内力量格局

认同政治和承认诉求是推动国内力量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来说，都希望获得社会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不仅仅是一种体面的物质生活条件。精神上的满足和物质上的富足至少是一样重要的。当然，与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强国一样，国内政治中的一部分群体也会因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和能力，希望追求不平等的承认，而这种不平等的承认诉求必然要通过追求承认的斗争和不平等的国内政治秩序来实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平等承认和维持一定程度不平等承认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要想得到他者的完全承认，必须对等地承认他者。这是自由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只有被承认是自由的时候才是自由的，这种承认只有在被自由地给予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某些因素会加强不对等承认的关系结构，只要不对等结构存在，争取对等承认的斗争就会继续，这决定了不对等体系的不稳定特征”。^②概括起来，追求承认的斗争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改变国内政治的力量格局。

首先，具有相同承认诉求的个体会联合起来，追求相应的权力和利益。奴隶主阶层自然会联合起来维持奴隶制的存在，因为他们从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还享受着为所欲为的精神满足；类似地，地主阶层和资本家也有相应的承认诉求，并为了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本阶层利益的国内政治秩序而斗争。反过来，那些认为本群体的利益被忽视、尊严被践踏的群体，也会联合起来，建立相应的组织、政党和武装力量。认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现实主义神学政治家尼布尔曾经说道：“社会……

^① See Phil Baxter, Jenna Jordan, “How Small States Acquire Status: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2018, Vol.21, No.3, pp.191-213.

^②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第57-62页。

仅仅是个人利己主义的积累，并将其转变为集体的自私自利。因此，群体的利己主义拥有了比个人成倍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哪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因此，更成熟的目的和倾向是争夺权力。”^①追求承认的斗争最终使得国内政治中的力量格局转变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承认诉求越强烈的群体，就越有可能获得巨大的组织力量。

19 世纪，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欧洲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工人运动被组织起来后，重塑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内部政治格局。例如，在德国，尽管仍然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管理国家，但德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制度，目的就是应对工人运动。在今天的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少数族群在大选中发挥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力，例如拉美裔的美国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大量拉美裔选民聚居在大选地图中的“摇摆州”，显著影响着选举的结果。在美国两党制和选举制度下，除古巴裔之外，拉美裔与大多数少数族裔一道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②在国内政治的微观层面同样可能表现出类似的情况。人们对于不同群体的偏好取决于他们的直觉，即他们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群体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当有多个群体可以加入的时候，人们将会选择能加强他们自我意识和重要价值的社会群体。人们可能搬到和加入与自己有着相近政治观点的街区和教堂，这就会导致不同选区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③

其次，与国际关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一样，国内政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总体上导向一种更加平等、分散化的民主制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平等程度，远远超过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平等程度；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平等程度，又远远超过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平等程度。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发展史上，同样可以看到弱势群体对于平等承认的不断追求，例如，女性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男性公民一开始也有一部分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

① 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07.

② 参见张代雄、万晓宏：“拉美裔在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取向及影响因素——基于 2000-2020 年大选的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42-46 页。

③ Piercarlo Valdesolo, Jesse Graham, *Social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Routledge, 2016, p.10.

制社会，女人被迫接受她们自身卑贱低下的形象，她们已经把这样一幅自身低贱的图像内化了，因而甚至在阻碍前进的一些客观障碍已经消失之后，她们也可能无法利用新的发展机遇”。^①因此，女性的解放并不仅仅止步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平等，还需要获得精神上的平等承认和建立女性群体的自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下，资产阶级表面上成了统治者，实则与无产阶级共同被资本所异化。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知道自己和证实自己，却对异化没有一种意识”，而无产阶级“则是自身自觉的、从而是扬弃自己的自我异化”。^②

在美国，黑人争取自身权利和平等承认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1868年，《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赋予黑人同等的法律保护。1870年，第15条修正案赋予黑人投票权。但美国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时才得以实现。《1964年民权法案》与《1965年选举权法》不仅废除了全国范围内公共场所、教育与就业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也有力地保证了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投票权。^③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中，尽管警察虐待黑人的现象仍然存在，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使得美国各地的警察部门更加意识到他们应该如何对待少数族裔。“Me too”运动扩大了公众对性侵犯的理解，并就现行刑法在处理性侵犯方面的不足展开了重要讨论——其最重要的后果是改变了男女在工作场所的互动方式；这是对不公正现象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反应。^④尽管“法治”的概念在许多国家仍然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但是至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理念已经体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之中。族群平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基本政治权利也已经写入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之中。

最后，在意识到追求承认的斗争对于各群体分化组合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导致国内政治秩序的平等趋势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承认诉求的极端

① [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第297页。

②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24页。

③ 参见陈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种族政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0年，第30-34页。

④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6.

化和碎片化同样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的力量格局变化。国内认同和承认诉求的碎片化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技术的因素，尤其是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小规模个体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自己的独特认同，而不一定要通过现有的政治渠道；另一方面，认同政治和追求承认的斗争本身存在着一种无限向前推进的趋势，当一种认同或者承认诉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就可能转向其他的认同和承认诉求，从而导致承认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和碎片化。

族群认同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动力，能够造成极为剧烈的国内力量格局的变化。当民族主义没有兴起的时候，很多族群并不伸张政治权利方面的诉求，皇帝可以很好地统治多族群的帝国。而一旦不同的族群开始具备民族意识、追求本民族的独立和自治时，帝国就分崩瓦解了。一位学者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还要更早），在普遍进步与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层面，政治文化开始了全面转向……转向与性别、地方或种族相关的文化身份认同政治”。^①

一些群体利用其人数优势以及组织力量，甚至采取诸如恐怖主义、暴力行动等极端措施，本意是追求一种平等的承认，最后却可能转变成获取不平等的承认甚至特权，从而导致对其他社会群体的蔑视和歧视。“当代身份政治的驱动力是寻求被社会边缘化之群体的平等承认。但这种对平等承认的渴望很可能会滑向对承认该集团优越性的要求。这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故事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当今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宗教政治的一部分”。^②当前美国社会中“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恰好反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白人认为自己正在成为被蔑视和被歧视的一个群体，需要捍卫自己的认同和其他合法权利。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在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中，80% 的人对民主党的少数族群政策感到不满，认为“政府在扶助少数族裔上做得太多了”，85% 的人表示“美国已经失去了它的国家认同”。^③

① 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234.

②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27.

③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2016, Vol.95, No.4, p.58.

三、追求承认的斗争如何改变世界思想格局

追求承认的斗争与技术革命和资本力量一道，塑造了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格局。由于不同的个人、群体和国家都追求承认，因此他们自然会倾向于支持那些更突出平等、自由理念的政治思潮，反对那些相对保守的、支持等级秩序的政治思潮。如果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政治的思想和观念是逐步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但这种发展必然会破坏原有的不对等承认，从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追求承认的人性诉求，在世界政治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的不断强大，甚至走向极端。自由的边界在哪里？一个平等的世界政治体系是否会因为追求承认的斗争，而最终走向一个支离破碎的状态？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在当前的世界政治思想格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在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虽然都是根源于自由主义，但是两者的意识形态差异正在日益扩大。如果让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不同的“道德圈”子集进行选择，保守主义者将倾向于更小的道德圈而非更大的道德圈（家庭优先朋友，国家优先世界，人类优先非人类），而自由主义者则会相反。^①

从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古希腊时期的政治思想中，“政治与城邦完全是同一个概念。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期，政治尚未从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中明确地区分开来，政治活动也就非常自然地被人们理解为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公与私、国家与社会这些后世西方政治学的重要范畴就几乎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②这一时期，城邦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承认，并体现在公民大会这一政治形式上。但是，这种平等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都存在贵族和权力等级，而奴隶却是没有任何的人权。所以，在古希腊时期，大多数人没有得到基本的承认。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地域的广大和民族成分的复杂，不可能再以公民大会的形式来进行国家的治理。在此情况下，人们心灵世界里的空白，

^① See Piercarlo Valdesolo, Jesse Graham, *Social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Routledge, 2016, pp.2-3.

^②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为基督教在整个帝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非常适宜的精神土壤。^①不管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还是基督教思想的流行，都迎合了人们对于获得更广泛、更普遍的承认的诉求，因此很快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认为，“罗马时期不同民族的人成为罗马的公民，权利便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罗马时期萌发的这种普遍平等的权利观念在近代被发展为普遍人权的理论，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自明了”。^②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各种政治思潮的出现就是为当时的统治者进行辩护，尽管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技术革命、资本力量以及思想构建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传承性，都意味着同一时期可以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潮，而且这种思想格局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思想格局的变化不仅仅是国际国内力量格局和政治秩序变化的结果，同样也会促成力量格局和政治秩序的变迁。例如，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对于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的一种理论上的说明或者辩护。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却表明，洛克的《政府论》上篇和下篇在光荣革命前都已经完成，只不过一直没有发表。因此，简单地说洛克的理论就是对英国革命的辩护显然有失偏颇。^③但总体来说，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变化过程，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由于主张实现人们在政治地位、政治权利和个人尊严方面的平等，因此迎合了大多数人的承认诉求，逐步成为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思潮的主流。“近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最根本出发点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这一点即使是像霍布斯那样的被视为专制主义者的思想家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这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观点首先在洛克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述。洛克奠定的对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迄今为止西方政治思想中主流的观念。”^④

按照唐士其教授的总结，自由主义总体上构成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主流。其他的政治思想都是对自由主义的某种形式的反应，从而也必须

①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 页。

② 同上，第 9 页。

③ 同上，第 36 页。

④ 同上，第 3 页。

通过它而得到理解，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它的批判在内。^①工业革命发生后，自由主义逐步成为世界政治思潮的主流。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智识传统，作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的出现不早于 17 世纪。^②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自由主义包括如下的观念要素：它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它是普遍主义的，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的，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从而使之超越了其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③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也是一整套政治学的理论，包括了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民族自决等一系列诸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规范。

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兴起，以及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秩序的规范来源，是基于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奴隶制已经不合时宜，而财富的巨大增长又给大众参与政治生活、追求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使得它迎合了追求承认这一根本的认同诉求。“承认指一种主体间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施动者得以成为有自尊、受尊重的社会或国际社会成员，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是构成施动者身份的共同决定因素”。^④追求承认的斗争是一种与政治生活本身相关联的现象，是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权利运动的基础。^⑤“在不对等承认结构中，那些没有受到完全承认的行为体会继续奋斗。所以，基于不对等承认

①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第 15 页。

② [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 页。

③ 同上，第 2 页。

④ Philip Nel, “Redis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 What Emerging Regional Powers Wa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Vol.36, No.4, p.953.

⑤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64 页。

的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必然是不稳定的秩序。”^①从这一视角出发，相对于封建专制，自由主义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尊严上较较大程度的平等，从而满足了人性中对承认的这种诉求，历史上受到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再次，19 世纪的霸权国英国和 20 世纪的霸权国美国积极推动了自由主义世界政治思潮的发展。它们不仅建构了一套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也希望推动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这样的一套秩序能够确保自由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例如，新现实主义大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现代以来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英国和美国的霸权之上，因为这两个领导性的国家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有着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和前现代时期的农业帝国相比，它们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可以获得最多的收益份额。^②最后，自由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思潮，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是分不开的。伴随着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全球流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得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载体深入世界的每个角落。

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世界政治思潮时，也面临着来自其他政治思潮的日益增多的挑战。这些不同的政治思潮，有的一开始和自由主义并不是相对立的，例如民族主义。法国大革命意味着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潮，推动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且从根本上塑造了今天的民族国家体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本质上和自由主义、民主思想是一致的，即对外要求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对内要求推翻专制王权的统治、实现普遍的公民权利。但是，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诉求实现以后，它就和自由主义的长远目标相冲突了。自由主义希望减少国家之间的壁垒、逐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以及在全世界实现自由民主制度，而民族主义则可能把民族工业摆在第一位，倾向于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对于人道主义干涉和民主推广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民族主义往往和国家主义、现实主义联合起来，形成对于自由主义的抵抗力量。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说法，“简言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第 59 页。

②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38-145 页。

之，我的论断是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①

除了民族主义以外，保守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承认诉求。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保守主义是一种带有保守政治倾向的思潮。在 19 世纪的时候，保守主义意味着维护原来的君主专制、传统秩序等；而到了今天，保守主义意味着反对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强调家庭、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保守主义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却都是因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对原有社会承认结构造成冲击的结果。虽然自由市场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它也意味着贫富分化和人的异化。虽然自由主义政治体系规定人们在政治权利上是基本平等的，但雇佣劳动者的贫困仍然使得他们无法获得许多事实上的承认。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并不多，但是社会主义思潮一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秩序，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形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的出现。^②同时，帝国主义在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内部获得了狂热的支持，其支持者希望通过对外的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来宣泄自己在国内可能被压抑的权力欲望，或者希望通过对外干涉来推广本国的政治理念，这些都会导向帝国主义。用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话来说：“地球上这一个或那一个民族打消对权力的欲望，同时其他民族的欲望有增无减，这不单毫无作用，反而会自取灭亡。如果对权力的欲望不能在世界各个国家取消，那么打消了这个欲望的国家只会成为他国权力的牺牲品。”^③因此，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可能导向帝国主义思想和政策。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页。

② 第三条道路出现的背景，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意识到，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如大规模国有化、国家控制和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等已经过时，不适合经济政治形势，需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第三条道路和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不同，它强调政府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第三条道路和自由放任主义也不同，它指出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不加控制的市场是危险的。因此第三条道路把二者结合起来。参见张敏：“第三条道路——九十年代西方社会的一个新政治现象”，《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5期，第46-48页。

③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冷战结束以后，对于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乐观情绪达到了顶峰。在国内政治领域，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原因在于，“历史进程依赖于合理的欲望和理性的承认这两大支柱，而现代自由民主是最能以某种平衡来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体制”。不过，福山也指出，自由民主政治仍然存在衰退的可能性，“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向民主演进，但是现代思想已然陷入僵局，无法在何谓人及其特有的尊严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也无法明确人的权利为何。这就一方面为过度强烈地寻求平等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为优越意识的重新解放，敞开了方便之门”。^①在国际政治领域，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战后秩序是围绕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制度建立起来的，“1945 年之后秩序建设早期达成的交易和创立的制度不仅存续了 50 年，它们实际上深深扎根于各参与国更为宽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换言之，更多的民众及其活动与美国战后秩序的制度及其运行相关……这一体系越来越难以被取代”。^②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本身的特殊性，使之在广泛流行的同时，也埋下了可能毁灭自身的种子，即承认诉求的碎片化和极端化直接导致了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认同政治和极左、极右相对立的政治极化危机。这些种子产生的基本土壤是贫富分化和认同冲突，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例如大规模的跨国人口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的推动），它们就可能蓬勃生长起来，最终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衰朽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崩溃。

对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潮面临的这些潜在挑战，国内外学者们其实早已有过深入的探讨，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些严峻的挑战才逐步成为现实。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不管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美国著名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强调了民族主义在国际国内层面对于自由主义的冲击，“民族主义的影响往往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例如，民族主义非常强调自决，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都会抵制自由主义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45 页。

② [美] 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33 页。

大国干涉其国内政治的企图——而这当然是自由主义霸权的全部。这两个主义在个人权利上也存在冲突。自由主义者相信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无论他们把哪个国家当作祖国。民族主义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特殊主义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它不认为权利是不可剥夺的”。^①与米尔斯海默对于自由主义霸权的批判路径不同，福山和亨廷顿对于美国国家认同所面临的危机和国内层面文化冲突的论述，可能是更为深刻和有利的。福山指出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蕴藏着毁灭自己的种子，他提出的理由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实验室里和市场上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在社会规范领域里已充斥了此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它实际上已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系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②

在国内政治中，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崇尚极端个人自由的倾向，形形色色的认同取代了对家庭、国家以及自由主义所强调的那些基本权利的认同，政治生活开始出现尖锐对峙的极化状态。曾被认为可以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政治往往无法健康运转，取代自由主义政治认同的是多元文化和多元认同，“全球化、多文化主义、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民特性的情绪，都冲击了美国人的意识。人种、民族属性和性别方面的特征登上了前列”。^③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爱国……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④

自由主义一旦走向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多元主义，那么世界政治又会面临高度的不稳定，因为不存在领导性的国家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不存在主体性的群体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的碎片化。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

②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④ See 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

四、结语

对承认的追求，是世界政治发展的一种根本动力。相较于物质利益，获得承认、自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承认的诉求不仅根植于利益的需要，也根植于人性之中。一些人享受着不对等的承认，但大多数人都希望为了平等的承认而斗争，因为只有获得平等的承认，人才能是一个“自为的存在”，才能是自由的和完整的，才能获得本体上的安全性以及各种平等的权利。如果没有获得对等的承认，那么每个人仍然会感到自己是不安全、不自由的。不对等的承认结构导致了各种不平等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而对于平等承认的追求，导致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日益平等与分散化。当然，对承认的追求并不一定是单独发挥作用，更多时候是与技术革命、资本力量等因素结合在一起。随着交通、通讯和武器技术的发展，个人、弱势群体具备了越来越多的发声和追求平等承认的条件。资本的跨国流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追求承认的斗争，为了能够打开当地的市场，跨国公司不得不迎合当地人民的承认诉求，使用当地人民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进行本地化。

追求承认的斗争是塑造世界政治力量格局的根本动力之一。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能够深刻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首先，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和国际行为体自身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是追求承认斗争的一个结果，而这种体系性的变化自然也意味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其次，追求承认的斗争导致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断变化，尤其是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而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得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能够建立起更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而深刻塑造了现代以来的国际力量格局。最后，围绕承认的斗争会导致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博弈和霸权兴衰，最终造成国际力量格局的重大变化。

在国内政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同样深刻影响国内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首先，具有相同承认诉求的个体会联合起来，追求相应的权力和利益。其次，与国际关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一样，国内政治中追求承认的斗争总体上是导向一种更加平等、分散化的民主制度。最后，在意识到追求承认的斗

争对于各群体分化组合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导致国内政治秩序的平等趋势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承认诉求的极端化和碎片化同样深刻影响国内政治的力量格局变化，即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消失、力量格局的分散化。

追求承认的斗争也是塑造世界政治思潮兴衰格局的根本动力之一。近代以来，由于迎合了大众的承认诉求，在国际国内追求承认的斗争中，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并深刻塑造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世界秩序。同时，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崛起态势，其他政治思潮也不断兴起并保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自由主义理念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负面效果，尤其是出现了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和认同冲突。同时，自由主义由于强调个人主义、贬低家庭和国家的地位，容易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而出现了日益激烈的认同政治和追求承认的斗争，国家认同面临着来自族群、宗教、性别等其他认同的激烈竞争。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国际秩序的理念与规范受到日益严重的质疑和挑战，这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本国优先、认同政治，使得世界政治日益碎片化和冲突化，对于各国的外交政策、战略关系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在当前美国的“认同政治”、“美国优先”等思想潮流中都得到了非常典型的佐证。认同政治只会激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根本无助于实现真正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建立在一些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具有不同认同的成员能够自我克制，即在拥有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尊重其他人和其他群体的认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部的承认问题，反而由于过分强调个人自由而加剧了追求承认的斗争。同时，在国际关系中，以“文明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为代表的追求承认的斗争仍然广泛存在。

【Abstract】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ontological security of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 the conditions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a basic demand from human nature, hoping to obtain freedom and equality. Therefore,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changes in world 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will lead to a more decentralized soci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well as the rise of liberalism,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As for power structure in world politics, the recognition struggle leads to chang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wer distribution. As for ideational structure in world politics, the recognition struggle has led to the rise of liberalism that emphasizes individual freedom and rights. However,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are challenging the status of liberalism as a universal political identity,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henomenon of “polarization” in world politics.

【Key Words】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ower Structure in World Politics, Ideational, Structure in World Politics

【 Аннотация 】 Борьба за признание связана не только с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условиями выжива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дельных людей и стран, но и с базовым человеческим требованием, то есть стремлением к обретению свободы и равенств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орьба за призн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й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изменений миров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Борьба за признание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более фрагментар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орядку, а также к подъёму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политик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 уровне силовой модел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борьба за признание влечёт за собой изменения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стемах, вместе с борьбой за статус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эт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риводит к изменению модел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уровне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борьба за признание вызывает подъём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делающего упор на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е свободы и права, однак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политик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т. д. бросают вызов статусу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как общ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что приводит к растущему явлению «поляризаци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орьба за признание, силовые модел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与俄罗斯关系 变化态势、动因及影响*

焦一强 丁传彪**

【内容提要】自2021年初上台执政以来，基于重塑美国国际地位的总体战略目标诉求，拜登政府在继承特朗普大国对抗政策的基础上重拾“联盟管理”和西方民主价值与规范，在安全观认知差异、固化的反俄倾向、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趋于好转以及乌克兰危机消极后果持续发酵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美欧联手向俄罗斯发起新一轮制裁和打压，使得双方在地缘政治、能源博弈以及外交制裁等领域的冲突与对抗更加激烈和尖锐，美欧与俄罗斯关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态势和变化。进入2022年以来，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美欧与俄罗斯的对峙进入白热化，大国关系回归地缘政治竞争的历史传统和动机更加鲜明，从而严重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与平衡，使百年变局背景下脆弱的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给“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拜登政府对俄政策 俄欧关系 俄乌冲突 欧洲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5-0118(30)

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引发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极大震惊与恐慌，他们认为这是对战后欧洲安全秩序的严重破坏和彻底颠覆，美欧与俄罗斯的关系由此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甚至陷入了持续恶化和长期对抗的状态。美国与俄罗斯作为对当今国际事务和全球秩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个关键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要国家和区域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1VGG01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大国中亚政策调整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编号：2022jbkyjd001）的支持。

** 焦一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教授；丁传彪，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性国家，其关系变化向来牵动着世界敏感的神经。早在 2020 年拜登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与谋求连任的特朗普展开激烈角逐时，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便被视为观察美俄关系未来走势的风向标。与此同时，拜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并超越特朗普的对俄政策？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修好同欧洲盟友的关系？美欧会否联手加大对俄制裁及与之对抗的力度？这些事关国际时局的重大议题，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政府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广泛关注的焦点。如今拜登执政已近两年时间，我们需要在当前国际形势较为复杂的背景下全面考察、分析并深入思考总结拜登政府对俄政策及其执政以来美欧与俄罗斯关系变化的态势。

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时期的对俄政策及实践既有继承，也有超越。就对俄战略而言，尽管美俄在军控领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有限合作，但美国对俄实施制裁、打压与遏制的基本策略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有国内学者形象地指出，“如果说此前特朗普时期的俄美关系风寒入骨，已进入黑障期前夜的话，那么拜登执政后的俄美关系或将不可避免地跨入‘黑障时刻’”^①。事实上，伴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并演变至战争，美俄关系已全面恶化，甚至面临“断交”的风险。与此同时，相对于特朗普时期，俄乌冲突使拜登政府成功地整合了裂痕重重的跨大西洋联盟，欧美联手对俄罗斯的“围攻”与“群殴”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致使美欧与俄关系持续恶化并走向全面对抗。

通过对拜登上台执政以来相关美欧与俄罗斯关系既有研究的分析和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学界主要聚焦于对拜登上台前后对俄政策的预测和研判，以及拜登上台后相对较短时间内的美俄关系研究。^②与此同时，国内学界较少从美欧同盟的视角关注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从宏观上把握拜登上台至

① 吴大辉：“拜登执政后俄美关系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12 期，第 11 页。

② 有关拜登执政以来俄美关系研究的主要文献可参见冯绍雷：“从特朗普到拜登：美俄关系新变化”，《当代世界》，2021 年第 2 期；柳丰华：“俄美关系的走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李冠群、任紫君：“拜登政府的俄美关系走势及其全球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 年第 3 期；刘莹：“美俄关系‘重启’的困境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3 期；张建：“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俄美关系及其前景”，《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 3 期。

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与俄关系变化态势的研究规模有限。就英俄文文献检索结果来看，美欧与后苏联国家学界也经常把美俄关系与欧俄关系分开研究，将美欧作为整体来分析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的成果同样较少。^①国内外关于美欧与俄罗斯关系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较多，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较好的参考。我们的研究尝试从美欧联盟的内在机理与整体视角出发，在对拜登执政以来美欧与俄关系最新变化态势进行宏观把握与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究造成美欧“西方集体”与俄罗斯关系持续与全面恶化的深层原因和特殊逻辑动因，并总结美欧与俄关系恶化对全球秩序、欧洲地缘政治、安全格局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等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美欧与俄关系变化新态势

从拜登上台以来的对俄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实施状况来看，美欧联手与俄罗斯的对抗远远大于合作。拜登政府对俄政策较特朗普时期更加强硬，前者极其注重意识形态，认为俄罗斯企图破坏美国的国际地位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削弱、军事上威慑是美欧打压和遏制俄罗斯的主导

① 关于美欧与俄罗斯关系的英文研究成果参见 Nivedita Kapoor, “Russia-EU Relations: The End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RF Issue Brief*, No.451, 2021; Ari Heistein, “More Coherence, Greater Tension: Prospects for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under Biden”, *INSS Insight*, No.1439, 2021; Mark Leonard, “The Russia strategy Europe needs”, *Project Syndicate*, No.19, 2021; Clara and Dawid Walentek, “Consensus against all odds: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EU sanctions on Russia”,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43, No.6, 2021; Gregory T. Papanikos, “Europe, Ukraine, Russia and USA: A Conspiracy Theory Approach”, *Working Paper*, No.5, 2022; Zachary Paikin, “Russia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the future of Eurasian ord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58, 2021; Andrius Kubilius, “On Western strategy towards Russia: From ‘Putin first’ to ‘democracy first’”, *European View*, Vol.20, No.1, 2021. 关于美欧与俄罗斯关系的俄文研究成果参见 Смирнов П.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дходах США к региону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уай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естник Пер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22. №1; Лекаренко О. Измен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США после прихода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Дж. Байдена// Вестник 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22. №1; Блохин К. «Крестовый поход» Дж. Байден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Причины перспектив эскалации Америка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22. №3; Чернега 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беспорядок” в мире и Россия// Кон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2021. №3; Разживин Ю. «Полидипломатия» как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ль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Запада с Россией//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Архонт» Выпуск. 2021. №3.

策略。尤其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欧与俄罗斯的对抗更加尖锐，关系变化态势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动向与特点。

（一）美欧与俄地缘政治对抗加剧

尽管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总体变化态势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但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对抗已成为两国关系新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朝着负面方向发展。拜登就任以来，特朗普时期业已形成的美俄关系持续恶化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反而伴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愈演愈烈。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同俄罗斯在乌俄边境、黑海、波罗的海、白俄罗斯边境等东欧地区，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对抗日益加剧。拜登上任不久，便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及优先事项，并重点提及俄乌之间遗留的乌东问题，声称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将削弱欧洲和北约实力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寄希望于破坏和瓦解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但是新的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也回来了。^①经过拜登政府的协调努力，美欧伙伴关系得以恢复和转暖，双方协调联动之势正逐渐重回正轨。为了遏制俄罗斯，美欧日益加强联合，在俄罗斯周边地区频频发起挑衅，不断挤压其地缘政治生存空间，企图将俄罗斯从东欧地缘政治格局中剔除出去。

首先，围绕乌克兰问题美欧与俄地缘政治对抗白热化，逐渐接近战争边缘。乌克兰事关俄罗斯安全命脉，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及地缘政治对抗的重心所在。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划出两道“红线”：一是西方不得接纳乌为北约成员国；二是西方不得在乌克兰部署重型进攻性武器。然而，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为突显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重拾“联盟管理”，不断加大北约东扩态势，频频碰撞俄“红线”。在维护欧洲安全秩序的幌子下，为将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扩展到欧亚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停散布和渲染俄罗斯要对乌“发动战争”和“实施侵略”等危险言论，制造“恐俄”心理，极力怂恿鼓动乌克兰与俄对抗，试图拉拢乌克兰加入北约。为寻求西方保护，2021 年 8 月底乌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乌美签署

^① См. «Гибрид» Байдена: чего Запад хочет от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2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riss.ru/article/16350/>

了国防伙伴关系战略基础协议，拜登总统批准向基辅提供 6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①俄乌冲突爆发后，为将乌克兰打造成与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对抗的前沿阵地，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持续不断地“拱火”、加油，对乌军事援助随之急剧扩大。2022 年 3 月 16 日，拜登总统发表讲话公开表示，再向乌克兰提供 8 亿美元额外军事援助，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在一周之内提升至 10 亿美元，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对乌援助的总额达到了 20 亿美元。^②一周后的 3 月 23 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欧盟已从欧洲和平基金向乌克兰拨款 10 亿欧元用于购买武器。^③伴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蔓延与升级，美欧对乌军援力度逐渐加大。在俄乌冲突爆发接近半年后的 8 月 19 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 7.75 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自 2021 年 8 月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第 19 批军援，援助总额累计已超过 100 亿美元。^④在乌东四地入俄公投后的 2022 年 10 月 2 日，美国当局宣布，拟每月向乌拨款 15 亿美元，直至冲突结束，并呼吁欧洲盟友采取同样的行动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⑤

跟随着美国，欧盟也不断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2022 年 7 月 18 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布鲁塞尔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明确了欧盟打算向乌克兰再提供 5 亿欧元武器援助的决定与计划，这是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第 5 批军事援助，欧盟在欧洲和平基金框架下向乌提供用于购买武器的军援总额达到 25 亿欧元。^⑥随后，在乌克兰第 31 个独立日来临之际的 8 月 24 日，拜登总统宣布，通过“乌

① См. Украина и США подпис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сновах оборонн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1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966834>

②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8 亿美元额外军事援助”，人民网，2022 年 3 月 17 日，<http://usa.people.com.cn/n1/2022/0317/c241376-32377093.htm>

③ См. ЕС выделил Украине 1 млрд евро на закупку вооружений, -Мишель. 23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www.ostro.org/general/society/news/630845>

④ См. США объявили о новом пакете военной помощи Украине на 775 м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 19 августа 2022 г. <https://meduza.io/news/2022/08/19/ssha-ob-yavili-o-novom-pakete-voennoy-pomoschi-ukraine-na-775-millionov-dollarov>

⑤ См. США готовы выделять Украине по \$1,5 млрд в месяц до конца СВО. 2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s://newizv.ru/news/world/02-10-2022/ssha-gotovy-vydelyat-ukraine-po-1-5-mlrd-v-mesyats-do-kontsa-svo>

⑥ См. Евросоюз выделит Украине на покупку вооружения 2,5 млрд евро. 18 июля 2022 г. <https://rossaprimavera.ru/news/c8926bd5>

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并计划再向乌提供 29.8 亿美元的军援。就在此前一天，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德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 5 亿欧元的武器援助。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8 月 23 日出席“克里米亚平台”视频峰会时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行动将长期进行下去。在乌东四地入俄公投的背景下，欧盟受美国影响，持续加大对乌资金援助。据乌克兰媒体 9 月 15 日报道，欧洲议会当天批准了欧盟委员会向乌克兰拨款 50 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计划。^①除资金援助外，美欧还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诸如毒刺导弹、标枪导弹以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各式先进武器装备。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就连一向恪守不向冲突地区输送武器的德国，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许诺向乌克兰提供 1000 枚反坦克导弹和 500 枚毒刺导弹。此外，美欧还向乌克兰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来训练和支持乌军队，甚至邀请乌克兰士兵赴欧美相关国家接受军事培训。伴随着俄乌冲突升级，西方还向乌克兰派遣国际雇佣军，在波兰、罗马尼亚等北约东翼集结重兵以声援和支持乌克兰。为了进一步遏制与防卫俄罗斯，2022 年 3 月 24 日，北约在其总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宣称将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部署 4 个新的战斗集群，届时北约在东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部署的战斗群将达到 8 个，总兵力接近 4 万人。作为对拜登上任后美欧对俄军事挑衅加剧的回击与反制，俄罗斯同样调兵遣将，在俄乌边境大规模集结军队，并同其盟友白俄罗斯不断举行军事演习，致使 2021 年底到 2022 年初，俄乌冲突骤然升级，结果是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美欧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冲突与对抗轮番升级，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安全与地缘政治灾难。

其次，北约与俄在黑海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因 2014 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黑海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俄罗斯的重大变化。为遏制并对俄实施战略合围，美欧不断加大与俄在黑海地区的地缘政治较量。双方除了加大在黑海地区的军事投放，还在该地区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拜登继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与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对抗非但没有减弱，

^① “欧洲议会批准向乌克兰拨款 50 亿欧元援助计划”，光明网，2022 年 9 月 16 日，https://m.gmw.cn/2022-09/16/content_1303142535.htm

反而不断加剧。2021 年 6 月 28 日，北约 32 个成员国及伙伴国在黑海海域展开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风-2021”军事演习，其中以美国和乌克兰为主导，参与者包括大约 5000 名军官和士兵、32 艘舰艇、40 架飞机以及 18 支特种作战和潜水部队。^①面对北约咄咄逼人的“海风-2021”，2021 年 6 月 1 日，俄罗斯黑海舰队宣布开始进行夏季训练，并决定在未来 6 个月之内进行 20 余次大规模演习。^②在此次军演活动中，为了打击北约气势，俄罗斯曾先后开火警告并驱离侵犯俄领海的参加北约黑海演习的英国“护卫者”号驱逐舰及荷兰“埃弗森”号护卫舰，并动用苏-30 战机在黑海上空拦截了美国海军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进入 2022 年，随着俄乌局势日趋紧张，2 月 12 日，俄罗斯黑海舰队 30 多艘舰艇开始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进行演习活动，目的是对克里米亚海岸、黑海舰队基地以及海上经济活动区域进行防御。^③为进一步威慑俄罗斯，美国曾计划于 2 月 24 日前在黑海举行有乌克兰参与的“海风-2022”军事演习，后因俄乌冲突爆发推迟至 7 月在保加利亚海域附近进行。来自阿尔巴尼亚等 10 个北约成员国的 1390 名士兵以及 24 艘舰艇、5 架飞机和 2 架直升机参加了这场演习活动。^④俄乌冲突以来，北约虽然尽量避免与俄在黑海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但却支持乌克兰在该区域对抗俄罗斯。在美西方提供的情报及远程火炮支持下，俄黑海舰队遭到重创，继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遇袭沉没后，俄黑海舰队 1600 吨补给船“瓦西里·贝克”号也遭袭击沉没。在俄乌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北约与俄罗斯黑海对抗加剧，不仅严重破坏地区地缘政治力量平衡，而且不利于地区和平与安宁。

最后，美欧还在波罗的海、白俄罗斯边境、高加索乃至北极等俄罗斯周边地区加紧与俄进行地缘政治对抗。为扩大对俄战略围堵范围，2021 年 4 月至 6 月间，美国领导 27 个北约成员及伙伴国约 3.7 万名士兵在从波罗的

① “乌克兰与美国联合主办的‘海上微风’军事演习结束”，央视新闻，2021 年 7 月 10 日，<http://m.news.cctv.com/2021/07/10/ARTIUIBwj7AAqkQGtjyNqecT210710.shtml>

② See “Russia’s Black Sea Fleet to take part in over 20 major drills this year”, TASS, June 2021, <https://tass.com/defense/1296585>

③ См. Более 30 кораблей Чер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вышли на учения по обороне Крыма. 12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12/02/2022/62075d709a7947b492164c4e>

④ См. ВМС США отменяют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учения в Черном море из-з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25 июля 2022 г. <https://inosmi.ru/20220725/sea-breeze-255172330.html>

海到巴尔干地区 12 个欧洲国家进行代号为“欧洲捍卫者-2021”的海陆两栖军事演习，此次军演涉及地域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可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北约军演之最。^①作为回应，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 2021 年 9 月举行有近 20 万军事人员、80 架军机、760 件武器装备参加演练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西部-2021”联合军事演习。^②乌克兰战事恶化后，3 月 14 日，北约 3 万士兵在挪威拉开了代号为“寒冷反应-2022”的年度军演序幕，以便对俄形成威慑。值得注意的是，北约还借助俄乌冲突迅速实施北扩，吸纳瑞典和芬兰入约，极大地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总之，拜登上任一年多来，美欧在俄罗斯周边地区与俄罗斯的新一轮地缘政治角力，使潜在的地区风险进一步加剧，这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安全上的压迫感，同样也将欧洲卷入冲突之中，进而严重恶化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正如俄罗斯政治学家所言，西方与俄之间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冷战 2.0”。^③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称北约与俄在乌克兰的对峙态势堪比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④事实上，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已开启西方与俄罗斯新一轮对抗的历程，俄乌冲突的爆发则更加突显和加剧了这一对抗态势。尽管俄乌冲突有着复杂深刻的历史经纬，但美国主导的北约持续东扩显然是核心根源。在全球转型和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迁的百年变局下，美欧与俄罗斯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对当代世界的认知分歧与差异等因素，无疑是加深西方与俄对抗的复杂动因，乌克兰只不过是美欧与俄地缘政治对抗与博弈的筹码而已。

（二）美欧与俄外交冲突持续升级

乌克兰危机造成西方与俄罗斯关系陷入全面恶化的境地，不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美欧同俄在外交领域的斗争与冲突也同样十分激烈。拜登

① См. НАТО готовится к реальным воен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на Балтике. 9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www.inosmi.info/nato-gotovitsya-k-realnym-voennym-deystviyam-protiv-rossii-na-baltike.html>

②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合军演‘西部-2021’开幕”，国际在线，2021 年 9 月 9 日，<https://news.cri.cn/20210909/fbc26de0-a97a-e755-49bc-764d6615bf2d.html>

③ См. Минченко назвал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нов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ой. 15 июля 2021 г. <https://riafan.ru/1485451-minchenko-nazval-otnosheniya-mezhdu-rossiei-i-zapadom-novoi-holodnoi-voinoi>

④ См. Рябков сравнил нынешне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с кубинским ракетным кризисом 1962 года. 13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ehorussia.com/new/node/24882>

上台后，美欧与俄外交风波并未因美国总统换届而平息，反而持续恶化，互逐外交人员事件更加频繁，致使美欧与俄外交冲突与危机不断升级。

在对外政策上，拜登超越特朗普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此，借助并支持俄反对派颠覆普京政权、对俄实施民主改造，便成为美欧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战略目标。拜登上任伊始，轰动一时的纳瓦利内事件便引发了美欧与俄新一轮严重的外交风波。2021 年 1 月 17 日，俄罗斯著名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在从德国治病返回莫斯科时遭俄警方拘捕，随后被判处三年半监禁。西方媒体借机对俄发起舆论攻击，大肆渲染和炒作莫斯科炮制了“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乘机煽动俄多个城市进行抗议示威活动长达两周之久，要求俄当局释放纳瓦利内。与此同时，美欧国家还以俄罗斯“公然无视国际准则”为由对俄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大量驱逐俄外交人员，致使俄与西方外交冲突轮番升级。鉴于美欧国家对纳瓦利内事件进行政治化操作并粗暴地干涉俄罗斯内政，在发生反对派抗议活动后，俄当局决定宣布德国、波兰和瑞典的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对外宣称他们参加了支持纳瓦利内等人的抗议活动，这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应。2021 年 2 月 8 日，瑞典要求一名俄外交官必须限期离境，认为这是对俄驱逐一名瑞典外交官的“明确反应”。就在同一天，波兰宣布俄驻波兹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令其在限期内离开波兰。德国也宣布俄驻柏林使馆一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以回应俄驱逐德外交人员的决定。针对这些反俄举动频频的欧洲国家，普京总统列出了一份不友好国家名单，禁止其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从事任何活动。^①2021 年 4 月中下旬以来，美欧与俄之间互相驱逐外交人员事件不断发酵，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阿尔巴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等相继加入驱逐俄外交人员的行列，互为声援，但都遭到了俄不同程度的对等反制。^②2021 年 4 月 15 日，美国宣布驱逐俄罗斯的 10

① См. Весенне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дипломатов высылают домой. 27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www.dw.com/ru/vesennee-protivostojanie-rossii-i-zapada-diplomatov-vysylajut-domoj/a-57352844>

② См. Немецкий эксперт Рар объяснил, зачем Западу нужно накаля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5 мая 2021 г. <https://politexpert.net/244814-nemeckii-ekspert-rar-obyasnil-zachem-zapadu-nuzhno-nagnetat-otnosheniya-s-rossiei>

名外交人员，限其 30 天内离境。基于对等原则，俄第二天便对外宣布驱逐美国的 10 名外交官，并禁止若干名美国前任和现任政府官员进入俄境，同时要求美国召回其驻俄大使沙利文。^①北约则在此后的 18 日表示，北约支持成员国捷克调查俄在其境内的“行为”。波兰也称，全力支持捷克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同样声称：“英国全力支持我们的捷克盟友。”^②自拜登就任后，仅 2021 年前 4 个月，在西方国家与俄这场重大外交冲突升级战中，就有大约 150 名美欧与俄外交人员被双方驱逐出所派驻的国家。^③在西方与俄对外交往史上，如此频繁和大规模地驱逐外交官的现象并不多见。显然，美欧与俄已把相互驱逐外交人员作为一种对抗的手段。

自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与俄关系急转直下，双方外交冲突亦随之不断升级并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美欧国家“雪崩式”驱逐俄外交人员的极端事件，由此引发了美欧与俄新一轮外交危机。继美俄开始互逐外交官后，2022 年 3 月 23 日，波兰外交部宣布驱逐 45 名不同职衔的俄外交官，并限期他们在 5 天内离境。特别是 4 月初的“布恰事件”，再度把美西方驱逐俄外交人员的事件推向新的高潮，并引发了俄与西方之间一场“外交大战”。“布恰事件”发生后，美欧纷纷将谴责的矛头一致对准俄罗斯，为了声讨并对俄施压，西方尤其是欧洲，近十国连续密集大规模驱逐俄外交人员，驱逐人数超过 170 人。截至 2022 年 4 月 5 日，短短两天之内，欧盟两大核心成员国德国和法国分别驱逐了 40 名和 35 名俄外交官，丹麦驱逐 15 人，意大利驱逐 30 人，西班牙驱逐 25 人，瑞典驱逐 3 人，拉脱维亚驱逐 13 人，爱沙尼亚驱逐 14 人。^④此外，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还宣布降低与俄外交关系的等级。在乌东四地入俄公投后的 2022 年 10 月 3 日，立陶宛外交部宣布驱逐俄驻立临时代办里亚博科，并要求其 5 日之内离境。对此，俄外交

① См. Случай высылк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ов из разных стран в 2018-2021 годах. 17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ria.ru/20210417/vysylka-1728754360.html>

② “30 余名俄外交官员遭驱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怎么了？”澎湃新闻，2021 年 4 月 19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276969

③ См. Весенне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дипломатов высылают домой. 27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www.dw.com/ru/vesennnee-protivostojanie-rossii-i-zapada-diplomatov-vysylajut-domoj/a-57352844>

④ “欧洲多国借‘布查事件’大规模驱逐俄外交官，人数已超过 170 人”，观察者网，2022 年 4 月 5 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4_05_633430.shtml

部表示,将作出同样回应。就表层原因来看,拜登执政以来,美欧与俄之间如此激烈和规模空前的外交冲突与危机是由俄反对派领袖人物中毒事件以及乌克兰问题引起的,但深层动因仍在于双方关系的恶化,反映了美西方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的战略意图。

(三) 美欧联手对俄制裁力度不断加大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欧就乌克兰问题,以及网络攻击、恶意传播虚假信息、支持委内瑞拉、叙利亚等问题,对俄发起过数轮以经贸为主辅以政治、军事和科技等领域的制裁。^①然而,因特朗普狭隘的“美国优先”政策严重损害了欧洲盟友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欧俄关系历史渊源深厚,故美欧联合对俄制裁的力度和效果有限。拜登上台执政以来,继续保持对俄制裁与高压态势,随着德国政府换届及美欧关系日趋好转,特别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欧合力“群殴”及制裁俄罗斯的力度日趋升级,可谓加大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作为对俄实施制裁的“首秀”,2021年3月初,拜登政府对外宣称,将根据1991年《化学和生物武器法》相关条款,针对2020年8月的纳瓦利内事件,对俄发起最新制裁。^②具体措施是,冻结俄4名涉事官员的海外资产和赴美签证,将俄列入禁止出口国防技术的国家名单,禁止美国政府金融机构,包括美进出口银行,向俄提供贷款并停止对俄援助等。^③在美国鼓动下,欧盟方面也决定针对“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对俄施加新的制裁,主要涉及与事件有关的俄高级官员以及俄金融、能源、国防等部门。除了制裁俄最大的五家银行,制裁范围还扩大至禁止军民两用物品的供应和武器的进出口,以及用于油田开发和页岩油生产、深海钻探以及北极石油生产的技术和商品。^④为了修复与欧洲盟友,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系,拜登政府对德国频频

① See Gábor Csizmazi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U.S.-Russian Relations”, *Aarms*, 2019, Vol.18, No.1, pp.21-38.

② См. Байден ввел свои первые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Они кажутся всего лишь копией санкций Трампа, но это не так – теперь под угрозой курс рубля. 4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meduza.io/feature/2021/03/04/bayden-vvel-svoi-pervye-sanktsii-protiv-rossii-oni-kazhu-tsya-vsego-lish-kopiey-sanktsiy-trampa-no-eto-ne-tak-teper-pod-ugrozoj-kurs-rublya>

③ См. США и Евросоюз ввел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санкции из-за Навального: что будет дальше. 3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ngs24.ru/text/world/2021/03/03/69791798/>

④ См. Юлия Тимофеева.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и эскалация санкций ЕС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ю. 25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sanctions/prava-cheloveka-i-eskalatsiya-sanktsiy-es-protiv-rossii/>

示好以换取德国和其他北约伙伴大力支持美国对俄新一轮制裁。所以，在对俄实施制裁时美国并没有选择打压“北溪-2”天然气管道，因此该项目在搁置近一年后实现全线贯通。2021年4月，伴随着俄乌边境局势再度紧张，4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对俄罗斯32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莫斯科网络攻击干涉美国大选与外交事务等所谓的“敌对行动”。^①白宫发言人声称已向俄发出警告，如果俄继续加强其破坏国际稳定的行动，美国将在战略和经济上对其施加更大压力。2021年底到2022年初，由于俄乌局势日趋紧张，双方战事一触即发，在不断渲染俄罗斯将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同时，美欧加紧提升对俄制裁力度并达成一致意见，声称如果俄乌爆发战争，将对俄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且美国国会开始讨论对俄发动经济战的“地狱制裁”法案。为了遏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图谋，美欧将制裁的重点确定为俄工业和金融领域，包括对俄实施“广泛的出口限制”以及扰乱其金融体系，目的在于摧毁俄工业潜力并使其经济陷入瘫痪。据路透社消息，华盛顿曾与韩国政府代表进行磋商，考虑限制对俄罗斯的计算机芯片供应。此外，美欧还研究了如何限制莫斯科货币兑换能力的可能性，其中最激进的措施之一就是切断俄访问全球支付系统（SWIFT），因为俄在该系统每天可处理4200万笔支付。^②正如白宫高级官员所言，制裁应导致“俄罗斯大型金融机构因不堪重负而财务瘫痪”，并引发“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及银行倒闭。^③然而，西方的打压和制裁并未阻止俄乌冲突的持续升级和爆发。

自2022年2月下旬以来，在美国的号召及带动下，美欧联动对俄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全面制裁”，制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能源、贸易、文化乃至个人等方方面面，制裁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均堪称历史之最。为了打击并摧毁俄罗斯实施“战争”的经济能力，俄乌冲突发生后不久，美欧立即对俄实施金融和贸易制裁，以切断其资金来源。先是把俄罗斯踢出由西方主导的SWIFT支付系统，紧接着对俄实施商

^① См. Байден ввел новые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15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15/04/2021/60782cb59a7947de083beb9b>

^② См. Андрей Резчиков. Санкции Байден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становятся угрозой для США. 30 января 2022 г. <https://news-front.info/2022/01/30/sanktsii-baydena-protiv-rossii-stanovya-tsyu-ugrozoy-dlya-ssha/>

^③ Там же.

品出口管制和贸易禁运，随后层层加码，对俄实施全面制裁。据相关统计数据，截至 2022 年 7 月 9 日，美国及欧盟等 48 个国家和地区施加给俄罗斯的各种制裁措施累计超过 1.1 万项。其中 2700 多项制裁是 2014 年至 2022 年 2 月 22 日实施的，其余发生在 2 月 22 日之后。^①总之，拜登执政以来，随着美欧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围绕乌克兰问题，美欧联手在涉俄议程上愈发强硬，致使双方关系日趋恶化，渐行渐远。

（四）美欧与俄能源博弈日趋激烈

欧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依赖能源，俄罗斯则是欧洲最大的能源供应国。2021 年拜登上台执政后，恰逢欧洲遭遇多年不遇的能源危机。受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与供应短缺的影响，进入 2021 年秋，欧盟的天然气需求量达 25 年来最大值，燃气价格成倍暴涨。据相关数据显示，自 2021 年 8 月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了 2.5 倍，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欧洲市场天然气报价为 1200 美元/千立方米，^②12 月份再创新高超过 2000 美元/千立方米。^③气价上涨严重影响了欧洲居民的生活，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府危机加大。于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便成为美欧与俄斗气斗智和进行能源博弈的关键。

由于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及美欧与俄关系不断恶化，美欧与俄能源博弈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叠加影响下不断升级，显得尤为复杂和激烈，并呈双向发展态势：以乌克兰问题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了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博弈，反过来双方能源博弈又进一步恶化了地缘政治关系。尽管美欧与俄罗斯都把“北溪-2”天然气管道视为打压对方的地缘政治工具，但因各方战略目标与国家利益诉求不同，其围绕“北溪-2”管道项目博弈的心态极其矛盾和复杂。美国自特朗普政府起就一直认定“北溪-2”天然气管道为“地缘政治项目”并采取打压态度。如前所述，拜登就任以来，为了修复与欧洲盟友特别是德国的关系，曾一度放任，使得该管线最终贯通。尽管拜登执政

① 参见徐坡岭：“美欧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经济的韧性、根源及未来方向”，《俄罗斯学刊》，2022 年第 4 期，第 23 页。

② См. Цена газа в Европе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сяцев бьет рекорды. Почему? К чему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Очень коротко. 8 октября 2021 г. <https://meduza.io/feature/2021/10/08/tsena-gaz-a-v-evrope-neskolko-mesyatsev-biet-rekordy-pochemu-k-chemu-eto-privedet-ochen-korotko>

③ См. ЕС обсудит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ю поставок газа н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 саммите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4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195757>

以来美欧关系得到改善和好转，但因饱受天然气短缺的困扰，欧洲国家与美国在“北溪-2”管道项目上存在较大分歧，欧洲仍然希望该线早日通气以缓解其缺气的压力。由于欧洲近40%的天然气是由俄罗斯供应的，在欧洲看来，其能源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莫斯科造成的，故指责俄罗斯故意限制对欧洲国家供气以换取“北溪-2”天然气管道通气。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谈及欧洲能源危机时，便直接批评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没有主动增加对该地区的供应。她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履行合同时只是做了最低限度的工作，在需求上升和价格创纪录的情况下，欧洲其他天然气供应商都追加了供应量，而俄罗斯的公司却没有这样做，只要俄天然气公司履行其承诺，欧洲就不会受到天然气短缺的威胁。^①俄罗斯作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者，始终积极推动“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并希望能早日通气运营。随着俄乌对抗日趋激烈，美欧与俄围绕“北溪-2”管道项目的竞争与博弈达到高潮。虽然“北溪-2”天然气管道已于2021年9月全线贯通，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获得认证和投入运营。美欧一致决定，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终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投入使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便停止了“北溪-2”管道项目的认证工作。然而，在乌东四地入俄公投结果行将出炉之际，“北溪-2”与“北溪-1”天然气管道蹊跷地发生爆炸并严重受损，美俄就此事相互指责，展开激烈交锋。此外，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还宣布对俄实施石油禁运，积极与卡塔尔等国就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进行谈判，以便为欧洲寻求俄罗斯天然气的替代产品，因为在美欧眼里，俄罗斯把能源作为一种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武器，会给欧洲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

显而易见，在美欧与俄罗斯激烈的能源博弈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地缘政治诉求。就美国而言，拜登上任伊始便宣称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遏制俄地缘战略，重点干预俄与欧洲的地缘联系，而德俄两国共建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自然被美国视为俄欧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联系的主要渠道而遭遇打击。美国打压“北溪-2”天然气管道，除限制俄凭借能源途径在欧洲拓展地缘战略

^① См. Олег Кривошапов. У «Газпрома» остается все меньше шансов на спасение Европы. 7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1prime.ru/exclusive/20220207/836010400.html>

之外，还有其深层的经济目的。近年来美国页岩气技术取得极大进步，制裁和阻挠“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有利于美国页岩气进入欧洲市场。就美国在欧洲政治经济双重利益诉求与俄地缘战略业已形成的竞逐关系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对俄欧能源项目的阻挠和打压势必将呈现一种长期化的态势。^①美国为重塑欧洲天然气市场，联手欧盟对俄实施制裁，而俄强劲的能源攻势使欧洲能源价格急剧飙升，引发欧洲乃至全球严重的能源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灾难。与此同时，美欧的能源巨头则赚得盆满钵满。据统计，埃克森、雪佛龙、壳牌以及道达尔等西方石油和天然气跨国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 510 亿美元。^②就欧盟而言，虽然在遏制俄罗斯方面欧美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因历史文化背景及国情差异，欧盟各国的战略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近年欧盟陷入深度危机并面临分裂危险的背景下，其内部利益诉求更加难以调和，尤其是对欧俄能源合作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③以德国为代表的“老欧盟成员”，主张利用欧俄地缘便利，加强与俄能源合作；而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欧盟成员”，则担心过于紧密的能源合作会助长俄地缘政治野心并影响欧洲能源安全，故在能源合作上选择跟随美国，加大联合对俄制裁力度。在俄乌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欧盟力求减少对俄化石燃料的依赖，积极寻求俄能源替代产品，同时多措并举，加快向清洁能源转型。从 2022 年 8 月 11 日开始，欧盟对俄煤炭禁运正式生效。从长远来看，俄欧传统能源合作受制于欧盟内部的分歧以及美国的破坏和阻挠，双方过去那种密切的能源联系将很难重现，这使得欧俄通过能源合作带动双方关系回暖及正常化的期望变得更加渺茫。

（五）美欧与俄军控竞争叠加

尽管拜登执政一年多以来美欧与俄关系总体呈持续恶化态势，矛盾、冲突与对抗是主流，但不排除双方在军控等个别领域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

^① 参见陈小沁、王璐：“从‘北溪-2’项目看德俄关系及俄美欧三方博弈”，《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2期，第105页。

^② См. Как США развязали газовую войну с Россией и обрушили мир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8 августа 2022 г. https://riafan.ru/23579915kak_ssha_razvyazali_gazovuyu_voinu_s_rossiei_i_obrushili_mir_v_energeticheskii_krizis

^③ See Simoniya N, Torkunov A, “The European Union’s Energy Security and Russia”,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No.2, pp.78-89.

有限合作。由于特朗普总统出于美国一己私利频频“离群退约”，先后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军控条约，严重冲击国际安全秩序，使得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特朗普的“退约”惯性及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会瓦解作为核安全及不扩散国际核军备控制制度重要基石和美俄之间最后一项军控条约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早在 2018 年 10 月，当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后，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Л. Слущкий）便指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将导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崩溃，因为美国国会已经决定，如果《中导条约》得不到履行，就不分配资金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拒绝 2021 年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又可能导致美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将彻底摧毁整个核不扩散与裁军制度”^①。在美俄于 2019 年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能否续约遂成为世界核大国的重点关切，因为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如果自己连任，将不再寻求与俄续签该条约。此番言论在国际社会引发极大恐慌，使国际政治观察家对国际核安全体系的平衡与走向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然而，不同于“政治素人”特朗普，拜登认为军控削减议题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他深知美俄之间的裁武条约，无论对两国还是对全球战略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②在还未正式就任之前，拜登就曾多次公开表示，寻求与俄谈判并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新一届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上台之初，拜登便通过美驻俄使馆与普京当局取得联系，要求双方尽快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方对此同样做出积极回应。据俄负责与美对接续约工作的一位官员称：“这次是美国人第一次主动提出的一个完全符合我们谈判起点的方案，实为罕见。”^③2021 年 1 月 26 日，美驻俄使馆与俄外交部正式互换照会。次日上午，俄各有关委员会在不到 24 小时内便完成了美俄裁武协议的审批程序，可谓是打破了 2014 年克里米亚并

① 焦一强、王四海：“美俄退出《中导条约》及其对欧洲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39 页。

② См.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ядерными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в 2020-х годах. 6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kontrol-nad-yadernymi-vooruzheniyami/>

③ Договор СНВ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продлён до 2026 года. 3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news.ru/world/mid-rf-zavil-o-prodlenii-dogovora-ob-snv-s-ssha/>

入俄罗斯的法律批准程序的速度纪录。^①随后，美俄两国政府互换照会，并迅速批准和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续协议，为两国今后在军控领域的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缓和美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压舱石作用。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发生后，美俄关系恶化急剧升级，严重影响了双方核军控谈判进程。在此背景下，8 月 8 日俄外交部通知美方，俄罗斯决定暂时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设施核查机制，但俄并未彻底关闭俄美军控谈判与对话的大门。8 月 18 日，美俄新一轮军控对话在维也纳落下帷幕，尽管双方在军控问题上仍存在诸多分歧，但美国并未排除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选项。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样表示，俄罗斯支持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有效期，但美国应集中精力就条约问题进行双边谈判。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在极力促使美俄就军控问题进行谈判。8 月 27 日，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中满泉（Izumi Nakamitsu）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俄必须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下进行谈判，并在该条约 2026 年到期之前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否则世界将失去威慑的手段。^②但同时也应看到，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发展态势以及美欧与俄对抗的几近白热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美俄核军控合作，两国未来的军控谈判之路注定荆棘丛生，4 年之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命运如何，仍需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二、美欧与俄关系变化动因

纵观冷战结束 30 年来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发展起伏不定的曲折历程，囿于战略冲突与对抗以及相互遏制等结构性矛盾，美欧与俄关系在历经短暂重启后总是很快回归对抗与不和谐，敌对关系总体大于合作关系。除最基本的结构性矛盾，不同美国总统任职的不同时期，美欧与俄关系缓和或是恶化均有着具体的根源。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欧与俄罗斯的冲突对抗几乎达到巅峰，双方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恶化状态，其逻辑动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① См. «Безусловное продление»: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и США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по СНВ-3. 2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yandex.ru/turbo/eurasia.expert/s/pochemu-rossiya-i-ssha-dogovorilis-po-snv-3/>

^② См. В ООН призвали Россию и США нач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договору о СНВ. 27 августа 2022 г. <https://www.rbc.ru/rbcfreenews/6309b6749a794741ddb18c2>

第一，美欧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安全观的认知差异和冲突。拜登就任以来，美欧与俄关系持续恶化的态势缘何没有因为美国总统换届而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其根本动因在于，乌克兰危机使双方产生了安全观的认知差异和冲突，安全困境加深。在美欧看来，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彻底颠覆和破坏了战后欧洲的安全秩序；而俄罗斯则认为，冷战终结后，北约没有信守承诺而持续东扩，美欧不但没有将俄罗斯纳入有其参与的欧洲安全体系当中，还不断排挤俄罗斯。安全观上的认知差异和冲突严重破坏了美欧与俄发展关系的互信基础。对此，普京在2021年12月23日举行的年度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并警告，北约违背20世纪90年代“一步都不会东扩”的诺言而进行五次扩张的事实，“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欺骗”，“俄罗斯已经没有退路”，“绝不接受北约继续东扩”。^①事实上，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存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俄罗斯制度载体的演变与西方制度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从历史上看，俄外交政策叙事变化与制度发展动态密切相关。对此有俄罗斯政治学家指出，俄罗斯与西方的制度载体越是不同，俄对主权概念的解释就越广泛，并就捍卫全球制度主权外部边界必要性的论证越是强烈；俄罗斯国内秩序越是向单一中心的从属体系演变，俄就越是加紧将类似的关系归结为全球关系体系，并表示愿意与之对抗，因而外交政策就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工具，并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②苏联解体后，因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与西方趋同，尽管首任总统叶利钦及其政治精英希望借此早日融入西方体系，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非但没有接纳俄罗斯，反而令其面临北约和欧盟双东扩的地缘政治压力与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普京上台执政并奉行“可控民主”的威权主义治国模式，俄罗斯与西方开始逐渐由合作走向对抗，与此同时，西方也加大了“双东扩”的力度。对此，著名冷战设计师乔治·凯南生前曾警告说，北约东扩属于致命的战略错误，会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和影响，不仅会引起许多国

① “普京年度记者会痛批西方‘厚颜无耻’：绝不接受北约继续东扩”，参考消息网，2021年12月24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11224/2463907_2.shtml

② См. Кирилл Рогов. За что и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воюет с Западом? Основные тезисы и выводы. 25 октября 2021 г. <https://liberal.ru/lm-ekspertiza/za-cto-i-pochemu-rossiya-voyuet-s-zapadom-osnovnye-nablyudeniya-i-vyvody>

家的不适和反感，还会遭到来自俄罗斯的反击。^①到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两党各派精英均已将俄罗斯塑造成破坏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其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处处与西方“唱反调”的挑战者形象。

拜登继任美国总统后，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国联合其欧洲盟友再度强化大国竞争与意识形态对抗，把俄视为一个极其“麻烦”的对手。当前美欧与俄在安全威胁问题上似乎已陷入一种自我实现预言的状态，彼此之间不断相互塑造威胁认知。俄罗斯认为美欧借助北约和欧盟东扩挤压其地缘政治和生存空间，并在后苏联空间频繁策动“颜色革命”，严重威胁俄国家安全；美欧国家则认为，俄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核威慑能力、对民主进程的渗透能力以及近几年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强势行动，对西方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由于战略互信缺失，美欧与俄正日益陷入“安全困境”的焦虑之中，双方对彼此侵略意图的感知和恐惧远远大于对基于共同利益合作意愿的认知，这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支配俄与西方关系的走向。随着时间和事件的交替演进，美欧与俄罗斯都愈发觉察到自身正不断陷入各自制造的威胁叙事之中，且已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②显然，2022 年的俄乌冲突更加坚定了美欧与俄罗斯的“安全困境”认知心理，在这种威胁叙事框架下，西方与俄之间的不睦关系将会一直保持下去。

第二，拜登政府固化的反俄倾向。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拜登作为副总统，就曾参与当时美国政府对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大显身手，这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其当选总统后对俄政策的基调。在拜登看来，俄罗斯是一个“三流民主国家”，正在经历着巨大衰落。尽管如此，俄仍能对美国国际安全战略和全球领导地位构成现实威胁，并通过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传播虚假信息和加剧美欧之间矛盾等，来从内部破坏西方民主。^③在拜登执政团队的理念里，特朗普团队的败选对俄当局来说是一大损失，俄罗斯在美国大选落幕之

① 参见唐永胜：“美欧俄战略互动的结构嬗变及其重大意义”，《当代美国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54 页。

② See Jacob Kriminger, “The New Cold War: US-Russian Relation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S. Dissertation,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2020, pp.12-14.

③ См. Как повлияют на Россию отношения Байдена с Европой и Китаем. 7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kak-povliayut-na-rossiyu-otnosheniya-baydena-s-evropoy-i-kitaem/>

后似乎非常不愿意祝贺拜登的胜利，这种念头更是加剧了美国民主党人的对俄敌视情绪。^①另外，拜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参与甚至主导了美国的对乌克兰事务。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拜登曾支持对乌克兰国内政治进程进行直接粗暴干涉，并教唆促成基辅政权以武力镇压乌东南部民众的抗议，致使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俄就已因乌克兰问题交恶，由此奠定了两国关系恶化的基础。

显而易见，拜登早期的涉俄经历及其厌俄、反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其掌权后因乌东问题从各个方面大肆向俄施加压力的惯性基础。^②值得注意的是，和拜登一起重返白宫的还有昔日奥巴马和克林顿团队的成员，他们都是当年乌克兰事务的美国参与者和执行者。这从拜登政府执政团队构成人员的强烈反俄倾向可见一斑。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家，新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就以主张对俄强硬著称。她自上任以来多次在各种场合声称俄罗斯对美国选举和内政的干涉是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国务卿布林肯曾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顾问，有在美国务院工作的经历，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反对者，曾多次支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以进一步威慑俄罗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是前驻俄大使，他强烈建言进一步遏制俄实力恢复与增长，大幅削弱俄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③对此国际社会早有预料，在拜登政府的四年任期内，美俄在言行上发生激烈对抗将是不可避免的。^④拜登政府及其执政团队固化的对俄态度和反俄倾向，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美欧塑造与俄关系的逻辑动因和基础，甚至决定了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的宿命。

第三，拜登执政后重拾“联盟管理”，美欧重归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特朗普单打独斗式的与俄对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拜登在遏制俄罗斯的策略方面十分注重发挥联盟和集体的力量。上任伊始，拜登便重拾“联盟管理”，

① See Sven Biscop and Alexey Gromyko, “Biden’s World? View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Policy Brief*, 2020, No.132, pp.6-11.

② See Tony van der Togt, “How the US and Europe could realign their Russia and China policie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tlantisch Perspectief*, 2020, Vol.44, No.5, pp.53-58.

③ См. Какими будут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при Байдене. 20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www.yaplakal.com/forum3/topic2218970.html>

④ См. Байден не мыслит отнош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вне рамок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27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universe-tss.su/main/politika/94829-bajden-ne-myslil-otnoshenija-s-rossiej-vn-e-ramok-holodnoj-vojny.html>

着手积极修复和改善被特朗普损害的美欧同盟关系。为使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重归于好，拜登上任仅一个月后便在 2021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讲话中发出“美国回来了”这句极具感召力的政治口号，将欧洲盟友紧密团结起来。在拜登看来，欧盟依然是美国的天然盟友，美国需要欧盟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国际行为体和一个更加可靠的盟友，以便在北约安全与防务上承担更多的实际责任。^①为此，拜登政府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盟友心愿的组合式重大举措，使美欧跨大西洋传统盟友关系逐渐“复位”。与此同时，拜登还将应对俄罗斯威胁视为巩固和强化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并以此为借口大肆渲染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欧洲国家因此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对待俄威胁问题上加大对欧洲安全的关注程度和战略力量投送力度，以便更好地做欧洲安全的卫士。为了重新获得欧洲盟友的普遍信任，并借此巩固北约内部安全和防务联系。拜登政府将北约定位为对抗和遏制俄罗斯“侵略行为”和影响力的关键工具。^②从欧盟方面来看，拜登执政后欧洲国家的“归队”意识尤为强烈，欧美在价值观问题上重新找到共同语言，欲以意识形态划线，更为明确地区分敌我。^③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的升级加强了美国对欧洲的控制，为美欧关系更加紧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有了联盟力量作为基础和保障的情况下，美欧双方在涉俄议程上再次不断走向联合，在对俄政策和立场上更加突显新的协调与联动，为美欧对俄实施群体性攻击和制裁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第四，乌克兰问题的消极后果持续发酵的影响。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的外溢效应以及给大国、地区乃至全球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消极后果时至今日远未完全消弭，而是在持续发酵。在全球转型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百年变局之下，乌克兰问题的消极影响及其惯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拜登执政期间美欧与俄对抗关系的宏观历史背景和总体逻辑动因。乌克

^① See Effie G. H. Pedaliu, “The Biden era: What can Europe expect from America’s new President?” *LSE*, November 9, 2020,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20/11/09/the-biden-era-what-can-europe-expect-from-americas-new-president/>

^② See Thomas Wright, “The US must now repair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tlantic*, January 11, 20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1/us-must-now-stand-democracy-home-and-abroad/617626/>

^③ 参见张健：“大变局下欧洲战略取向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1 期，第 19 页。

兰问题造成俄与西方的冲突已延伸至大国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信息等各个领域，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今美欧的对俄政策和议程。

首先，乌克兰问题激活了西方根深蒂固的“恐俄症”，为美欧借此联手打压和孤立俄罗斯提供了强大的口实与民意基础。受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恐俄症”在西方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东西方对抗以来就一直存在，而西方的目的是剥夺俄罗斯的欧洲身份并摧毁其文明。乌克兰问题因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极大震惊和恐慌，给欧洲民众的安全心理造成重创。“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以后，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在西方急剧恶化，欧美民众对俄罗斯的负面认知和评价陡增，并逐渐失去了对俄好感。德国权威民调机构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一项民调显示，55%受访的德国人称俄罗斯为危险国家，仅10%的受访者认为俄是德国可靠的合作伙伴，而76%的人认为德俄关系遭到了破坏。^①在美国，对俄罗斯的负面认知和情绪同样持续上升，绝大多数美国公民认为俄是其不可调和的敌人。根据2020年2月一项相关的民意调查，72%的美国人认为俄罗斯持负面看法，而到2021年2月，这一数字已升至77%。^②拜登政府上任后，鉴于乌克兰危机持续加深和恶化，基于进一步遏制俄罗斯的战略需求，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极力将俄罗斯塑造成“侵略者”和世界秩序“破坏者”的形象，并借助针对俄罗斯的全球信息战不断释放“恐俄症”，在公众意识中灌输恐俄心理和妖魔化俄罗斯。特别是2021年底以来，拜登政府更是极力渲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起欧洲民众极大的心理恐慌。伴随着美国蛊惑“恐俄”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大多欧洲人确信俄罗斯会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并且认为这次与2014年不同，俄再次“入侵”乌克兰不仅是对乌克兰一个国家的单独攻击，而且是对整个欧洲安全结构的攻击。在当今欧洲人眼里，俄乌冲突已被视为泛欧危机。俄乌冲突爆发前，一项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民调数据显示，受访者中73%的波兰人认为确实有可能发生“入侵”，64%的罗马尼亚人、55%的瑞典人、52%的德国人、51%的法国人和

^① См. ИМЭМО РАН. Отношения Евросоюз-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осква, 2014. С.37.

^② См. Юрий Алухтин. Как русофобия стала патологией западного мира и его спутников. 10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news-front.info/2021/03/10/kak-rusofobiya-stala-patologiej-zapadnogo-mira-i-ego-satellitov/>

意大利人、44%的芬兰人持有同样观点。^①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民众纷纷表示，若俄乌开战，他们将挺身而出，愿意为保护乌克兰付出代价和牺牲，这可以从俄乌冲突爆发后不少西方雇佣军进入乌克兰协助乌军作战得到证实。

其次，美欧与俄罗斯均把乌克兰作为牵制和打击对方的地缘政治工具。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支轴”地位使其成为大国，尤其是美欧和俄竞相争夺的重点对象，这一态势在克里米亚危机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俄罗斯著名智库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库尔图诺夫认为，当今广为流传并被俄专家学者接受的一种观点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和解的主要障碍是尚未解决的“乌克兰问题”。^②作为美欧与俄战略博弈的前沿，乌克兰一直未曾离开过美欧与俄政要的视线。在拜登的认知心理中，俄罗斯始终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威胁。乌克兰危机与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拜登便极力教唆欧洲盟友共同抵制俄罗斯，以便将莫斯科完全孤立于“整个文明世界”之外。早在 2015 年 2 月他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时便直言不讳地说，“绝不允许俄罗斯重绘欧洲地图”。在随后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在其推特发文称：“如果我当选总统，他（指普京）的暴政和试图恐吓美国与东欧的日子将屈指可数。”^③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甚至称普京为“战争罪犯”。2022 年 3 月 26 日在波兰的一次演讲中，拜登竟称“普京不能继续掌权”，尽管白宫事后极力澄清是口误，但仍然引起莫斯科的极大愤怒和强力回应。针对美国欲借乌克兰打压俄罗斯的企图，普京总统在 2022 年 2 月 1 日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并不关心乌克兰的安全，其主要目标是牵制俄罗斯，乌克兰本身及其国内局势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④乌克兰危机是欧洲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其灾难性后果持续影响着西方与俄冲突

① См. Кризис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что европейцы думают о войне на Украине. 12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inosmi.ru/20220212/evrobezopasnost-252972452.html>

② См.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Россия-Запад: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надежд и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й. 4 января 2022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ossiya-zapad-tridtsat-let-na-dezhd-i-razocharovanii/>

③ Глеб Иванов. «Главная угроза Америке». Что Джо Байден говорил о России? 19 августа 2020 г. https://aif.ru/politics/world/glavnaya_ugroza_amerike_chto_dzho_bayden_govoril_o_rossii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Гусев. Россия-Запад: «русophobia» – патолог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7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zen.yandex.ru/media/id/5c62e2c6ae6f0200adeabbc4/rossiiazapad-rus-ophobia-patologiya-vneshnei-politiki-ssha-62023a002c7a791f79ff42f6>

和博弈的逻辑。

最后，乌克兰问题使大国关系重归地缘政治竞争的历史传统。在乌克兰危机带给世界的不利影响中，大国之间剧烈的竞争关系无疑是最醒目的表现。俄著名学者、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认为，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大国博弈堪比 19 世纪俄罗斯帝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争霸。他指出，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标志着俄与西方之间自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形成的建设性关系的结束，从而开启了一个大国竞争加剧的新时代。乌克兰问题虽然不是国际体系的核心，但具有全球影响并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欧洲现状。^①乌克兰问题虽然历时八年有余，但大国博弈的态势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进入 21 世纪以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日趋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不断走向复兴。为了谋求竞争优势和恢复霸权，在乌克兰危机造成大国关系回归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历史思维定式和惯性作用冲击下，拜登政府选择加大对俄遏制力度，有着极其深厚的政治逻辑基础。目前，历经八年的乌克兰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俄乌军事冲突，其背后折射的是美俄之间的战略博弈与较量，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美欧与俄关系的恶化程度。

三、美欧与俄关系变化态势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使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深刻演变与重大调整。随着 2021 年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及美欧关系得以修复与好转，西方与俄罗斯对抗全面升级，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欧与俄罗斯关系变化态势不仅加剧了百年变局的演变，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进一步搅动大国关系和严重冲击国际秩序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国际秩序的走向。拜登政府上台后，基于挽救和重塑美国国际地位的总体战略目标和诉求，美国逐步加大遏制俄罗斯及与中俄对抗的力度。随着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演变，美欧与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和尖锐，这给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同样造成巨大冲击。受西方与俄关系危机的影响，因特朗普时期贸易战引

^① См.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ог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Октябрь 2014 г. С.1.

发的原本就持续恶化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激烈。在拜登看来，中国是目前唯一能够破坏美国全球首要地位的对手，甚至是比俄罗斯更可怕的战略对手。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新范式正在逐渐形成，其中的优先事项就是与中俄两个全球对手同时作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两极：一极是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世界”，另一极是由中俄发挥主导作用的所谓“独裁者世界”。^①因此，拜登政府在国际和地区层面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把中俄两国视为美国霸权体系的主要挑战者和竞争对手，并将中俄置于双重遏制的战略轨道之上，联合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同时向两国施压。^②俄乌冲突爆发前夕，部分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竟然追随美国指责和刁难中国。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公然批评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并呼吁中国谴责俄罗斯，妄图破坏中俄关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表示，中俄关系走近将威胁北约安全。显然，西方与俄对抗关系的进一步加剧已外溢至中美关系，并且恶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走势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欧与俄关系的反向作用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促进了中俄的相互倚重，使双方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牢靠。在西方国家将奥运会政治化并集体炮制所谓“外交抵制”的闹剧背景下，普京总统作为“逆行者”积极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更加彰显了中俄两国患难与共、守望相助、不为“政治病毒”所影响的高水平战略协作关系。

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具有高度的内在逻辑关联，尤其是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并支撑着国际体系。鉴于拜登执政以来频频挑起西方与俄对抗，极大地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进而给现有国际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可见，美欧与俄之间这种长期低位徘徊且不时引发诸多不确定性危机的关系，必将大幅增加全球政治关系的变量，使之变得更加难以预测。^③特别是在俄乌冲突中，美西方不是劝和促谈，而是不断“拱火”，

① См. Дмитрий Сулов. Новая парадигм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17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nova-ya-paradigma-vneshney-politiki-ssha-i-otnosheniya-s-rossiey/>

② См. Россия – враг: чем закончится борьба США и Европы против Кремля. 18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24tv.ua/ru/rossija-chem-zakonchitsja-borba-ssha-evropy-protiv-novosti-rossija_n1572128

③ 参见李冠群、任紫君：“拜登政府的俄美关系走势及其全球性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3期，第139页。

加剧国际格局由渐变转向突变，并引发全球诸多问题，使处于变局中的当今世界陷入更加动荡的深重灾难和危机之中，同时也使脆弱的国际体系面临坍塌的危险，全球秩序未来走势将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二）加剧欧洲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动荡不安的风险

尽管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主要体现在美俄之间，但欧洲却是最大的受害者。首先，拜登上台以来纠集欧洲伙伴不断与俄罗斯打斗和博弈，极大地恶化了欧洲地缘政治环境，加剧了欧洲的分裂。虽然在遏制俄罗斯方面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选择站边美国，但欧洲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另外，它们也有与美国不同的战略利益诉求，加上与俄邻近的地缘联系和特殊的历史渊源，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这在拜登强行要求盟友打压俄罗斯的情况下，反而加深了欧盟内部的政治分歧与裂痕。特别是欧盟的主导者之一德国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并不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担心制裁会使德国经济与欧洲能源安全受损，德国并不主张因美国宣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对俄实施严重制裁，而是强调以外交途径化解危机，由此造成德美关系龃龉不断，致使许多美国人认为德国是“不可靠的伙伴”。^①仅以俄乌冲突爆发后围绕对俄石油禁运的制裁为例，欧盟内部就存在明显分歧和差异。与此同时，在“欧洲战略自主”的背景下，新老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核保护以及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持不同态度，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从而影响欧盟内部的政治团结。其次，拜登上台以来，为遏制俄罗斯，不断向欧洲增派军队和提供武器，特别是北约国家频繁在俄周边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不但加剧了俄乌对抗局势，而且致使俄罗斯采取同样的回应和反制措施，在俄乌边境联合白俄罗斯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使欧洲国家面临巨大安全威胁。此外，随着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迫使俄罗斯在其西部边界加大军事部署和防御力度，引发欧洲对自身安全的极大担忧。为了加大威慑力度，美国不断升级部署在欧洲的反导系统，而俄罗斯在发展本国反导系统的同时，在其西部地区针锋相对地部署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导弹，破坏欧洲地区战略稳定的

^① См. Байден: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2» не будет введен в строй, если Москва нападет на Украину (The New York Times, США). 8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inosmi.ru/20220208/severnuy-potok-252922661.html>

诸多因素不断发酵，^①欧洲安全格局由此重陷冷战时期的危机状态。目前，欧盟国家正在积极追随美国参与对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不断加剧欧洲军事化，这对欧洲未来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将产生巨大消极影响。

（三）乌东问题后续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乌克兰问题是当今西方与俄紧张关系的核心根源。乌东问题作为美欧与俄之间在欧洲问题上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折射出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②俄乌之间这一遗留问题在西方国家的教唆和挑拨之下，对峙色彩加剧，升温趋势日益明显。随着拜登政府加大对乌支持力度，泽连斯基将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反俄政策来阻止他作为总统可信度评级下降的颓势。^③乌东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在于其背后域外势力的长期干涉，致使冲突各方政治利益诉求始终难以调和，相关协商机制难以实施。对此，曾有乌克兰政治学家表示，明斯克协议正在消亡，真正能缓解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是俄美之间的谈判。^④但拜登执政以来，却把“俄罗斯威胁”作为联合与强化其联盟关系的黏合剂，在乌东问题上怂恿基辅与莫斯科对抗，继续通过代理人战争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乃至拖垮俄罗斯，以达到绑架欧洲安全、促使欧洲盟友更加倚重美国的战略目的，从而将特朗普时期欧俄关系缓和的态势彻底掐断。伴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加剧和美欧与俄对抗持续升级，冲突的外溢效应已超出乌东地区并不断蔓延和扩大。在经历了 200 多天激战和对抗之后，目前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乌东四地已进行入俄公投并完成相关法律程序，而乌方则对公投结果予以否认，不承认其合法性。显然，乌东问题已成为横在俄乌乃至俄与西方之间一道严重影响相互关系的鸿沟，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难有解决出路，其后续走向仍然扑朔迷离，充满极大变数，从而影响着整个俄乌冲突的进程和结局，对世界格局同样会产生巨大影响。

① 参见柳丰华：“俄美关系的走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86 页。

② 参见李勇慧：“拜登上台之初的美俄欧互动凸显根本矛盾”，《世界知识》，2021 年第 6 期，第 33 页。

③ См.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ы: как далеки ожидания от реальности? 25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inosmi.ru/politic/20210225/249200385.html>

④ 殷新宇、柳植：“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恶化，美俄警告：局势非常危险”，光明网，2021 年 4 月 13 日，https://m.gmw.cn/2021-04/13/content_1302227304.htm

（四）严重冲击并影响“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与挑战无疑是影响该倡议顺利实施的最大障碍因素。“一带一路”之陆上丝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贯整个欧亚大陆，而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的核心位置，攸关“一带”兴衰成败的命运。有学者评价说：“没有俄罗斯的参加并起到重要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是不可思议的。”^①2022年的俄乌冲突极大地恶化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给“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一定困难和不利影响。首先，俄乌冲突以及乌克兰国内安全形势的急剧恶化使得“一带一路”的在乌项目无法继续实施和完成。其次，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终点，以往的中欧班列大多经过俄罗斯前往欧洲。俄乌冲突爆发后，受西方制裁影响，不少中欧班列不得不改变线路绕开俄罗斯，经由中亚跨越里海和高加索前往欧洲。与此同时，西方制裁严重打击俄罗斯经济发展，也会给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此外，随着西方对俄铁路运输制裁的进一步加深，必然会影响中欧班列的顺利通行和正常运转。总之，俄乌冲突导致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性上升，关系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前景，对此，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以便做到未雨绸缪，将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与挑战降至最低。

四、结语

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是西方与俄关系的一道重要分水岭。八年来，经过不断演化和发酵，演变至冲突、战争的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大国对抗与竞争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自2021年拜登上台执政以来，西方与俄罗斯战略冲突更加尖锐。伴随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逐步改善与好转，美欧联合对俄实施打压和制裁力度更甚，致使俄与西方对抗不断升级，双方关系持续恶化。经过拜登政府一年多的执政，在美欧的破坏性作用下，俄乌对抗与紧张局势在经历白热化之后——战争的阴云终于笼罩在乌克兰上空，不仅将乌克兰

^① 冯维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87页。

兰推向灾难与痛苦的深渊，同样也使欧洲安全秩序、世界大国关系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在全球转型与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百年变局下，拜登政府制造的美欧与俄罗斯的新一轮对抗，使大国关系又重回地缘政治竞争的历史传统，大国政治动机的古老争议再度复活，严重冲击了全球战略稳定，并将大国关系带进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世界和时代，进而给不确定的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未来走势蒙上一层阴影。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剧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化，使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前景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与挑战。

【Abstract】 Since taking office in early 2021, based on the overall strategic goal of reshaping America'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Biden's administration has resumed "alliance management" and western democratic values, norms while inheriting Trump's policy of confrontation with great power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a series of factors, such as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security concepts, solidified anti-Russian sentiments, improvement in transatlantic alliance and the continuous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jointly launched a new round of sanctions and suppression against Russia.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ides in geopolitics, energy games, diplomatic sanctions and other fields are more intense and severe.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are emerg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Russia. Since 2022,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Russia has reached its climax.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motivation of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o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have become more distinct, which seriously undermines the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balance, making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fragile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 century-old changes more complicated and uncertain. Meanwhile, it has also caused quite a few adverse effe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ussia Policy, Russia-Europe

Relationship, Russia-Ukraine Conflict, European Geopolitics

【Аннотация】 С момента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должность в начале 2021 года, исходя из общи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измен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татуса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Байдена восстановила «управление альянсом» и западны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ценности и нормы на основе унаследованной от Трампа политик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с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ряда факторов, таких как когнитив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концепция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укрепившиеся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улучш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транс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и продолжающееся брожение негативны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США и Европа совместно запустили новый виток санкций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и её подавл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ы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оронами в геополитик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игра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анкциях и других областях становятся более интенсивными и острыми, 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ША, Европой и Россией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ряд новых тенденций развития и изменений. С 2022 года, с началом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между США, Европой и Россией обострилось, 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 и мотивация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к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стали более отчётливыми, тем самым серьёзно подрывая глобальну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равновесие, делая будущ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хруп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веков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более сложной и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казывая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яса и Пу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ка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Байден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ЕС, конфликт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责任编辑 苟利武)

俄罗斯政治

“权力再集中”：俄罗斯政治趋势分析*

费海汀**

【内容提要】近年来，俄罗斯在延续国家、个人、社会三大基本政治观念一贯逻辑的同时，由于落差感、隔阂感和安全焦虑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开始对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进行重新定向。这一方向调整可以被概括为“权力再集中”策略。“权力再集中”至少包括政治权力的再集中与政治行动的再集中两部分内容，且都涵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两个面向。政治权力的再集中，是指不再强调分权与赋权，转而强调集中性的权力与排他性的规则，在国际政治中体现为全球化进程向逆全球化进程转变，在国内政治中体现为科层式机构向替代性制度集中以及地方自治向联邦管辖集中。政治行动的再集中，是指不再强调竞争与协商，而是强调统一目标、统一行动。从国际政治的面向看，行动再集中主要体现为大国博弈向大国对抗演变、区域合作向大国主导演变；从国内政治的面向看，行动再集中则主要体现为路径选择的集中、发展步调的统一和政策的激进化。“权力再集中”策略意味着俄罗斯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方面都进行了深度调整。这些调整不应被简单视作短期或临时性的措施，而应从更高的层次、更大的背景、更深的逻辑、更远的历史着眼，将其理解为俄罗斯领导人对过去30年发展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未来政治发展道路的设想。这一策略的实施，既意味着俄罗斯开始对自身百余年来政治史进行反思，也意味着俄罗斯政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发展 俄罗斯政治转型 权力再集中 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5-0148(22)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苏联-俄罗斯政治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19CKS016）的阶段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

** 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2018 年之后，俄罗斯政治中发生了数个重大事件，其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至少包括 2020 年宪法改革、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 2022 年俄乌冲突三项。伴随宪法改革与俄乌冲突两个事件，俄方高层精英启动的不仅是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还有对于俄罗斯政治结构与政治发展趋势的调整。这些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贯的、连续的内在逻辑。因此，一方面，对上述事件不应局限于即时的分析，而是应该从近 10 年（2012-2022 年）与近 30 年（1992-2022 年）两个时间尺度来加深理解；另一方面，也不应孤立地看待上述事件，而是应该从整体上将其视为俄罗斯政治发展趋势发生变化的外在体现。

如果以 10 年为尺度进行观察，可以看出近年来俄罗斯对 2012 年后的诸多政策进行了法理确认、落实贯彻，并予以进一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看，2018 年以后的俄罗斯政治相较于 2012-2018 年间在既定方向上出现了加速。而如果以 30 年为尺度进行观察则可发现，俄罗斯近 10 年的许多政策改变了此前 20 年转型时期所秉持的原则和方向。与其认为俄罗斯近年来的政治发展是在摇摆反复或另辟蹊径，不如认为它更倾向于选择回归到转型的某些关键节点之前重新选择和规划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2018 年后的俄罗斯政治发展趋势相较于 2012 年之前的 20 年（1992-2012 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本文认为，这一变化可以概括为一条“权力再集中”的发展道路。如果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俄罗斯政治是以“集中”为主要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以联邦分权于地方、国家赋权于社会为主要特征，2000 年以后强调国家重构的同时探索如何与社会共同治理为主要特征，那么 2012 年之后，特别是 2018 年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的主要特征则体现为国家从社会与地方两个维度回收权力，实现政治权力和政治行动的“再集中”。此处的“再集中”不是指狭义的总统任期之间政策重心偏移，而是指广义上俄罗斯高层精英所进行的长时段经验总结，是俄罗斯对苏联-俄罗斯转型以来政治历史的阶段性回溯。在 30 年来的转型进程中，一些集中的经验和措施被认为行之有效、符合政治发展目标而得到了延续；一些分权的探索和尝试则被认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否定或逐渐边缘化。

一、政治观念的逻辑延续

俄罗斯政治的变化虽然集中发生在 2020 年以后，但这一趋势实际上早在 2018 年时就已初见端倪。普京总统在 2018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在过去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我们实现了其他国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走出了目前的道路，我们也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未来几年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我现在所说的完全与国内政治周期无关，甚至与总统选举无关。无论谁当选总统，每一位俄罗斯公民，我们都必须共同感受和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正面临的挑战。”^①因此，“即将到来的 2020 年在许多方面是一个里程碑。这是向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过渡。俄罗斯面临着突破性的历史任务，每个人都需要作出重要的贡献。”^②如果以 30 年为尺度对 2018 年后的俄罗斯政治进行长时段观察就不难发现，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保持不变，但变革节奏大大加快。

首先，国家依然被认为是俄罗斯发展的主导者。国家的合法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和统一，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维护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俄罗斯领导人的观念中，俄罗斯国家在保障安全、维护道德规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最大的不足在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迟滞。普京在 2018 年指出，“今天的俄罗斯是具有强大对外经济和国防潜力的主要大国之一。当然，在确保人民生活质量和福祉的关键任务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水平”^③。随后，他又在 2020 年提出了国家建设的任务：“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坚实、可靠、坚不可摧的体制。从外部看，这一体制绝对稳定，能保障俄罗斯的独立和主权。同时，体制内部是有生命力的、灵活的、简洁的、现代的，能适应世界和俄罗斯周边形势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能适应俄罗斯社会本身的发展。”^④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则主要被归咎于国家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 марта 2018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②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582>

③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 марта 2018 г.

④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的低效和腐败两大障碍。此处的“国家”泛指广泛意义上的权力机构，既包括联邦政府，也包括联邦主体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甚至还包含司法机构和检察机关。腐败并不仅是官员个体行为不当，而是系统性、结构性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权力机构对企业的施压与掠夺。效率问题则主要体现为各级执行机构的主动性和责任感缺失，既不能迅速贯彻国家意志，也不能协调一致回应社会需求。上述俄罗斯领导人对国家角色、合法性与问题的表态，都与其2012年第三个任期开始时呈现出连贯性和延续性，但他在解决问题和克服障碍方面的态度则体现出了政治变革节奏的加快。2018年以后，政治变革不再局限于精英改革之类的人员调整，也不再局限于对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等新型治理工具的引入，而是开始启动更为直接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和宪法修改。同时，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监督也不再局限于专门的监管机构，而是大量引入了多种官方与半官方机构或组织。

其次，公民依然被认为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建设者。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自由是个人价值的核心，它包含经营自由、创造自由和公民倡议自由三个方面。这三种自由都不包含个体性的内容，既不处理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处理个人与国家间的界限划分，而是都以集体性的内容为主，指向社会经济发展。2018年后俄罗斯领导人的公民自由观念同样是对2012年的延续，它强调“自由的限度”，是指一种发展的自由而非选择的自由，与公民责任的含义相近。因此，国家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将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提高公民素质，保障公民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基本条件，使其为工作和创造做好准备；其二，提高政府机构的服务能力，特别是经济发展和制定执行公共政策方面的能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强的创造能力；其三，防止权力机构对公民的侵害，避免公民工作和创造的能力遭到削弱和破坏。具体措施包括降低贫困、增加收入、延长寿命，确保公民在教育、医疗、工作、信息、贷款等方面的资源获取能力。2018年以后，俄罗斯领导人明显加大了督促政府提高服务能力和防止权力机构干扰发展的力度。普京在2020年强调，“我们需要更快地、毫不拖延地完成我国的重大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任务。其内容和指导方针反映在国家项目中，这些项目的实施，需要在公共管理、政府工作、各级权力机构与公民的

直接对话等方面都上一个新台阶。今天，我们的社会明确表达了变革的要求。人民渴望发展，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奋力拼搏，愿意承担起各种大大小小的责任。他们往往更清楚地知道那些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城市，地区，村庄乃至全国——为什么需要改变，又应该如何改变。改革的步伐必须逐年加快，使公民在有尊严的生活方面取得让他们能感知到的成果。我再说一遍，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①

此外，社会依然被认为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辅助者。实际上，在俄罗斯领导人的观念中，社会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和意志的行动者，而更接近于一个个人和家庭聚合的场域。它更多是国家和个人观念部分延伸与混合的产物，而不是公共生活、公共利益与公共意志的产生场所。社会更多承载了“向下”即国家面向个人和家庭的行动功能，而非承载着“向上”即个人和家庭面向国家的表达功能。国家的行动能穿透社会触及个人，但个人的行动则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社会作为一个中间层次需要承载一部分国家的职能，即实现对个人和家庭的支持与援助。同时社会作为一个聚合体，也是集体记忆、传统价值和道德规范的承载者。因此，社会虽然为实现其职能依然需要强调社会参与，但这样的社会参与却会包含三部分内容：政府回应、机构参与和志愿活动。在 2018 年以后的各类发言中，普京多次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话，强调从联邦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需要直接回应公民及社会的要求，不可逃避。机构参与则主要是指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如公众院、商业联合会、战略规划会、全俄人民阵线等官方或半官方的各种组织或机构，参与政策制定，提出关于国家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建议。例如 2020 年普京就曾指出，“高度便捷可得在互联网应该成为俄罗斯和我国公民的竞争优势，应该为教育、创新、交流、社会与文化项目的实现创造广阔的空间。当然了，这是人民参与国家生活的新机遇。对我们来说，公民、公共协会、非营利组织的每一项建设性倡议都是重要的，它们的这些努力为国家发展的目标作出了贡献”^②。对于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俄罗斯一般会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和范围内，而志愿组织和志愿活动特别是文化活动，则是 2018 年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② Там же.

后受到国家大力鼓励与支持的主要形式，俄罗斯将之视为团结社会的重要方式。普京曾指出，“2018年被宣布为俄罗斯志愿者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一年始于通过的一项法律，它规定各级权力机关有义务协助志愿者。今天，积极热心的公民和服务于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正是人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主动的公民精神，以及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使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实现重大目标的民族。”^①

二、政治观念的变化特征

回顾 2018 年以来的各类公开材料可以发现，俄罗斯高层精英对待政治发展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落差感、隔阂感和安全焦虑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数十年的时间中逐步累积的。落差感是态度转变的基础和前提，隔阂感是态度转变的主要内容，安全焦虑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态度转变的发生。

其一，落差感。俄罗斯领导人将俄罗斯判定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但其发展速度始终无法完全达到目标，这就使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感得以产生。在 2018 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曾对俄罗斯 30 年来的发展成果进行了总结。这虽然有为选举进行宣传动员的意图，但依然能从中把握俄罗斯高层对其国家的心理定位。在咨文中，普京将俄罗斯定义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多元文化、复杂联邦结构、历史断裂和艰难考验历史记忆的多民族国家”^②。他将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认为俄罗斯在经济方面需要“在世界五大经济体中站稳脚跟”；在人均寿命方面进入“80+”国家行列，与日、法、德比肩；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使“农工联合体具有全球竞争力”；在交通运输方面“不仅成为地球上的关键物流和运输枢纽，而且应该成为世界上存储、处理、传输和可靠保护大数据阵列的中心之一”；在医疗保健方面“以世界最高标准为指导”；在环境保护方面同样“确保高标准的环境福利”；在教育方面延续“世界上最好初级教育之一”的成果；在科学研究方面“走上前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 марта 2018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② Там же.

列”；在研究基础设施方面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效的国家之一”。最后他总结道，“今天提到的所有项目和优先事项——空间发展、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卫生和生态、新技术和科学、经济支持措施以及人才和青年促进措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战略目标——俄罗斯的突破性发展”^①。同时，他更进一步指出发展迟滞、无法完成既定目标可能对国家造成的后果，“我们有义务集中一切资源，集中一切力量，展现出勇气和意志来有成效地工作。不这样做，我们、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国家都没有未来。问题不在于有人会来占领和破坏我们的土地。不，这不是重点。落后才是主要的威胁，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不扭转这种局面，它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它就像一种严重的慢性病，不停地、一步一步地从内部侵蚀和破坏身体机能，身体还往往感觉不到。”^②落差感主要指向的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更重要的是对行政效率的批评。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俄罗斯的人民与社会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和动力，恰恰是臃肿僵化的行政机构和官僚体系拖延了发展的脚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2021 年普京在论述商业环境改善时曾提到，俄罗斯的行政效率不仅需要跟上发达经济体，而且要超过他们。他指出，“我们已经在建筑和其他领域废除了许多古老的规范和要求，放弃了大量不必要的检查，但我们必须加快步伐，改善商业环境的结果必须是直观的、可理解的、可感知的。例如，在俄罗斯以‘交钥匙承包’的方式建设一家工厂应该比世界其他地区甚至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更快速、更便捷、更有利润。”^③这也成了隔阂感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隔阂感。俄罗斯领导人对俄罗斯的发展抱有极高的期望，但当国家意志无法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出现国家权力中层梗阻现象时，就使领导人与基层社会产生了隔阂感。这既是指高层精英感到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无法穿越中间层次触及基层，也是指基层的信息、诉求和意愿无法通过中间阶层准确有效地向国家进行反馈。这样的中层梗阻现象既出现在联邦政府之中，也出现在联邦主体甚至地方自治政府之内。俄罗斯领导人对基层社会的隔阂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 марта 2018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② Там же.

③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1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messages/65418>

感在过去 30 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但在 2018 年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加剧。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近年来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经常强调，作为联邦总统他不得不“亲自干预一些问题”^①，甚至不得不动用内务部或者检察长办公室之类的强力机构与特殊权力机构。更为严重的是，即使领导人亲自干预，也会出现事情进展缓慢的情形。如普京曾在 2019 年指出，“为了实现国家设定的重大目标，我们需要排除限制企业经营自由和自主创新的一切障碍。诚实经营的企业不应该总是受到各种条文和手续的限制，不应该经常担忧受到行政甚至刑事处罚的风险。我已经在另一次国情咨文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数字。不幸的是，情况没有太大变化。”^②梗阻的形成被归纳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利益集团的有意阻挠，二是行政系统的懒政怠政。普京曾提到，“我知道一些有影响力的说客试图尽一切可能阻止这项法案。他们的论据我是很清楚的：需要保障就业，需要应对困难的经济形势。但这一情形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不行。我要提醒大家，在作出这些决定时，我们不应以小团体的利益为指导，也不应以个人和公司的利益为指导，而应以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为指导。”^③同时，“如果有人喜欢因循守旧，不竭尽全力地工作，逃避创新也逃避责任，那么最好马上离开。我听到了一些类似‘那里不行’、‘这里太难了’、‘那里的标准太高了’、‘做不到’之类的话。带着这样的心态最好就不要从事艰巨的工作。另外，你也欺骗不了人民。他们能敏锐地感受到虚伪、不尊重和任何形式的不公正。他们对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不感兴趣。对人民来说，重要的是实际做了什么，以及这些事如何改善了他们和他们家庭的生活。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而是现在就必须行动。我们决不能重蹈过去几十年的覆辙……必须现在就改变情况。因此，各级执行权力机关的工作必须协调一致，内容丰富，充满活力。这样的工作节奏是俄罗斯政府的责任。”^④无论是归咎于利益集团或是官僚主义，隔阂感都会带来对中层及基层政治精英和各级政府机构大范围、系统性的不信任。不信任程度的加深会使行政效率的技术性问题上升为政治体制的结构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0 февраля 2019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863>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性问题，从而影响领导人对俄罗斯发展现状的认知及其对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促使其采取专门的应对措施。

其三，安全焦虑。与落差感和隔阂感一样，俄罗斯领导人始终保持着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国际政治领域的国家安全。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在近年来存在比较明显的议题转变，而不仅仅是程度的加深。换言之，安全问题呈现出从国家安全向政权安全演变的轨迹。最初安全问题主要体现为国家间的博弈。但近年来俄罗斯高层精英日益强调国家间的博弈开始从国际政治领域向国内政治延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构成了对其国内政权的直接挑战。2004 年的“橙色革命”、2013 年的乌克兰危机已经使俄罗斯高层精英开始关注国家安全向政权安全演变的问题，2020-2022 年在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陆续集中发生的冲突事件更是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总结道，“西方是把赌注押在那些不记得苏联的人身上”^①。他指出，“在这些国家，有人押注在苏联解体后才懂事的人们身上。他们对苏联没有切身认知和真实知识。计算表明，初级管理层（27-30 岁）的自然更替几乎已经完成，中级管理层（30-40 岁）的更替将发生在 2026 年前，高级管理人员（40-50 岁）的更替则会在 2036 年前发生。然而，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例子表明，使俄罗斯周边国家的精英整体性采取仇俄行动的过程可以人为加速”^②。普京在 2021 年指出，“不幸的是，世界上似乎所有国家都已经习惯了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的经济制裁，习惯了一些国家以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的粗暴企图。但今天，这种做法正在演变成更危险的现象，我指的是最近在白俄罗斯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实——直接组织政变、刺杀这个国家的总统。然而，毫不意外地，即使是这种触目惊心的行动，也没有遭到所谓西方国家的谴责。人们对此视而不见。每个人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是，请注意，人们可以用任何方式看待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或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我再说一遍，可以用任何方式看待他们。像亚努科维奇，他也差点被刺杀并被武装政变推翻。人们可以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政策保留任何看法。但组织政变、策划

① Патрушев Н.П. Об Отработанных Западом Инструментах 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10 июня 2020 г. <http://www.scrs.gov.ru/news/allnews/2799/>

② Там же.

暗杀高级官员的做法就太过分了，毫无底线……如果白俄罗斯的政变真的发生了会怎么样？有多少人会受伤？白俄罗斯的命运会如何？没有人考虑这些问题。就像当乌克兰发生政变时也没有人考虑乌克兰的命运一样。”^①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后也作出判断：“近年来，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从竞争转向对抗，实际上已经回到冷战时期。制裁的压力、威胁、冲突对抗、捍卫一己私利——所有这些都使世界陷入持续不断的稳定状态”^②。俄罗斯高层精英在安全问题上正逐渐达成共识——俄罗斯对外关系日益承压，甚至于存在失去对后苏联空间影响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俄罗斯的安全关注上升为安全焦虑。

三、权力再集中：政治发展道路的重新定向

一方面由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始终达不到预期，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事务承压并存在逐渐失去优势领域的可能，加上对国家权力中层梗阻的不满，促使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在总结本国过去 30 年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发展道路作出全面调整与规划。“权力再集中”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政治权力的再集中与政治行动的再集中，且每个含义中都存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两个面向。

（一）政治权力再集中

政治权力的再集中是指不再强调分权与赋权，而是强调集中性的权力和排他性的规则。从国际政治的面向看，权力再集中主要体现在全球化进程向逆全球化进程的转变。这既意味着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型、超大型民族国家地位再次上升，国际社会的议程设定和资源分配重新由全球治理与区域合作向民族国家集中，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内部规则开始排斥国家间协商的规则。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两个阵营两极对抗的结束，世界各国开始恢复大规模交往，国家间的联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一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都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难以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因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1 апреля 2021 г.

^② Медведев Д.А. Невыученные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23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www.scrf.gov.ru/news/speeches/2973/>

而要求利益相关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协同应对。国家间虽然依旧存在竞争和博弈,但也由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必须更多地进行协商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在思想上产生了“全球治理”、“全球善治”等理论,在实践上也建立了大量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以促进各个国家间的协同治理。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主导性的组织,它以自己的规则代替和排斥了其他社会组织。而全球化和区域化理念实际上就是强调国家间需要寻求共识并谋求共同制定规范,因为跨国问题的解决符合国际社会或区域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这一过程需要尽量在本国利益与区域利益、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间取得平衡,同时需要尽最大可能避免以本国利益代替或排斥区域和全球利益。任何一国以本国利益取代共同利益都将会使合作分崩离析,而合作的失败则会导致跨国问题继续悬置,并最终给本国利益造成长远伤害。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虽然并没有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但也在不断调试自己的外交战略,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全球化为本国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潜力。俄罗斯不仅积极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主动调整自己在后苏联空间内的角色,在参与世界市场和产业链的同时,也在制定各类经济一体化规划。这一战略方向即使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遭遇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也没有更改,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但在 2007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以后,地缘政治的思维再次兴起,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理念也开始向逆全球化和大国政治复归。2020 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到,“俄罗斯之所以为俄罗斯,只因为她是一个主权国家。我国人民的主权必须是无条件的。我们为此做了很多事情:恢复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一些国家权力职能被寡头团体所窃取的局面。俄罗斯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国家重返国际政治。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储备,这使我们国家的可持续性、保护公民社会权利的能力和国民经济免受任何外部压力的能力倍增。的确,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对国家的基本法规进行一些修改了,这些修改明确保证了俄罗斯宪法在我们法律空间中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国际立法和国际条约的要求以及国际机构的决议只能在不限制个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不违反我国宪法的情况下生效。”^①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立法和条约普遍需要经过国内程序的审议和批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准，这并不是特殊的政策。在俄罗斯，将国际法视作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叶利钦时期“法治国家”理念的内容。^①而普京在此次咨文中提出国际规则必须服从国内规则的原则，是对叶利钦定义的直接否定，也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这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国际规则主要看作威胁和挑战的来源，而不是协商与合作的成果。

从国内政治的面向看，权力再集中主要体现为科层式机构向替代性制度集中，以及地方自治向联邦管辖集中。这实际上意味着俄罗斯决定加快国家的重构过程，从国家与社会、联邦与地方两个维度回收国家权力。从苏联末期开始，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就基本沿着“分权于社会”和“赋权于地方”两个主要方向展开。在国家-社会方向上，俄罗斯推行体制改革，将代表权力机构与执行权力机构分置以建立制约-统治的基本分权架构；同时也改革了选举制度，让不同的政治组织和集团展开竞争以获取选民支持和领导权。俄罗斯希望通过分权制衡与政治竞争两个原则使国家权力得到控制。而在联邦-地方的方向上，虽然并不符合改革的最初设计，但俄罗斯国家依然与各联邦主体签订了联邦条约，划分了央地之间各自的权限。如果能确保国家统一与中央权威，地方的多元化探索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从而成为国家总体战略规划的有益参照。过去 30 年俄罗斯在有限回收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大致保留了分权社会 and 赋权地方两个基本方向。但在 2018 年以后，俄罗斯国家的发展方向出现了调整。如前文所述，低效和腐败被认为是俄罗斯国内发展的最大障碍，而这两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则被认为是源自于国家权力的中层梗阻。在俄罗斯高层精英看来，这一梗阻不仅存在于联邦政府之内，也存在于联邦主体政府之中，因此有必要加快国家权力的回收速度，加大制约中层和基层执行权力机构的力度。主要的回收方式有两种：使国家权力从科层式机构向替代性制度集中，同时使地方自治权限向联邦统一管辖集中。

首先是国家-社会方向。2018 年后，越来越多的替代性制度与组织开始参与政治过程，俄罗斯领导人也多次公开表达，要求这些组织与公民接触、

^① Ельцин Б.Н. Текс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Б.Н. Ельцина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по работ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1 ноября 1991 г. <https://yeltsin.ru/archive/paperwork/10565/>

参与决策过程、监督政策落实。这些组织类型多样，至少包括政党联盟、半官方非营利组织、联合工作组、联席会议、公众院等等。这些组织并非通过单一渠道（如代表权力机构）实现政治参与，而是在各行政层级参与从政策制定到实施的各个环节。同时政党与议会也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在 2020 年的宪法修改中，联邦委员会与国家杜马的任免能力都得到了显著增强。联邦委员会在与总统协商的情况下可以任免政权机关及检察系统官员，也可以在总统建议下任免各法院院长和法官。国家杜马则不仅能与总统商定总理人选，同时可以在候选人阶段与总理商定政府各部门首脑人选。在当前俄罗斯稳定的政党格局之下，上述改革意味着联邦和联邦主体的科层式政府受到的制约与监督大大加强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替代性制度和组织并不能被认定为单纯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组织的代表。这些组织或多或少都存在官方与半官方的背景，其本质并不是对国家机构实施社会监督，而是引入另一些替代性、暂时性、非正式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来制约科层式的政府系统。但权力从科层式机构向替代性制度的集中实际上存在相当风险。无论是分权制衡还是政治竞争，都需要通过正式机构和程序统一在国家权力之内。国家作为一个主导性的组织需要维护其权威性。其他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体制外的监督作用，但不应获得制约国家机构的实质性权力。否则既会削弱国家机构的权威性，又会实际上软化对国家机构的约束。当一种既定规则外的权力能改变约束条件时，行政机构就会主动去寻求这种权力的庇护和支持，从而使原先的约束条件失效。

其次是联邦-地方方向。2018 年之后，俄罗斯国家再次进行了与 2000 年前后相似的国家权力回收行动。俄罗斯领导人多次表达了对联邦主体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落实国家政策情况的不满。普京指出，“然而，各位清楚国家和地方权力机构之间在教育、卫生和其他领域的差距，以及这些差距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多次了。这种权力的分裂和混乱对人民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家立法确定了所有事关公民权利、机会和保障的原则，但在各个地区和地方实行的则完全是另一套。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因为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完整。我认为，有必要在宪法中确立关于统一公共权力体系的原则，并在国家和市政权力机关之间建

立有效的互动。与此同时，地方自治机构作为最接近人民的权力机关，其权限和实际权力可以而且应该得到扩大和加强”^①。另一个典型案例则是地区检察机关官员任免权的回收。普京指出，“与联邦委员会协商后任命的原则也可适用于地区检察官。今天，他们是在与地区立法议会协商后任命的。尊敬的同事们，这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检察官）必须正式或非正式地服从于地方权力机关，从而带来（检察官）失去客观性和公正性的风险”^②。而同时实施的另一个政策则是加强联邦主体首脑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其直接体现就是确定了由联邦主体代表组成的国务委员会的宪法地位。这一委员会恢复于 2000 年，正是俄罗斯第一次回收国家权力时的平衡措施。本次对与国务委员会相关的宪法条款的增补，既可以视为平衡措施的再次应用，也可以视作对 2000 年以来权力回收方向的再次肯定。

（二）政治行动再集中

政治行动的再集中是指不再强调竞争与协商，而是强调统一目标、统一行动。从国际政治的面向看，行动再集中主要体现为大国博弈向大国对抗演变，同时区域合作向大国主导演变。

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俄罗斯重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由于苏联的特殊性，加上改革初期的震荡，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领土，但不可能完全延续苏联原先的国际地位和地区角色。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始终在不断摸索和调整自己的定位，既需要调整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也需要调整与其他大国以及周边邻国的关系。这一时期俄罗斯整体秉持了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在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也保持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但俄罗斯逐渐发现，本国在外交领域的活动没有受到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经济震荡的过多影响，反而取得了一些进展，且基本维持了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影响力，为其在国际和地区实施各种政策创造了空间。俄罗斯意识到，虽然国内发展波动较大且始终未能达到期望，但在其经济和国防能力同邻国存在明显差异、苏联时期的产业链仍具影响且自己握有能源等重要战略工具和外交资源的情况下，俄罗斯对外的战略目标可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582>

② Там же.

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内部实际发展水平的限制。这极大增强了俄罗斯高层精英的信心，也提高了他们对俄罗斯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认知。外交形势的波动和安全焦虑的加深，使俄罗斯领导人日益倾向于在大国博弈中采取主动姿态。例如普京在 2019 年就曾指出，“我已经说过并且我要重申，我们准备就裁军问题进行谈判，但我们不会再敲关闭着的门。让我们等待我们的伙伴们成熟起来，认识到就这一问题进行平等对话的必要性”^①。这意味着俄罗斯将不再主动寻求共识或妥协，而是更加强调本国所受到的威胁，并积极对威胁作出回应和反制。

另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区域合作向大国主导的演变。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的骤然解体带来了诸多遗留问题。虽然已经从一个国家分化为十余个新兴的主权国家，但政治制度的转型并不能立刻改变经济结构及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内部经济循环，各自都在产业链上占据明确的位置，即使是希望变革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此时的俄罗斯由于各种内外问题交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延续苏联时期的区域政策。因此俄罗斯的一体化倡议大多停留在理论和计划层面，在实践中更多是以松散的国际组织或经济共同体形式维持与周边国家的联系。2000 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复苏，国内发展逐渐摆脱了 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震荡，其区域政策也开始变得更加主动和务实。此后俄罗斯更加倾向于将后苏联国家视为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因此它对于其他区域性组织（如北约）的扩张和后苏联国家的政权变动愈加敏感。如果说此时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政策还是以间接介入和影响为主，那么 2008 年俄格战争、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就成了其区域政策明显的转折点。此后俄罗斯对周边事务的参与程度明显加深。到 2020 年前后，当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继发生动乱时，俄罗斯都选择了进行直接干预。这些事件被认为是西方国家颠覆俄罗斯政权的前兆，因此普京指出，“任何挑衅威胁我们安全根本利益的人都会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感到前所未有的悔恨。同时我不得不说，我们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有足够的耐心、责任感、专业精神、自信和正确性。但我希望没有人会冲动地越过俄罗斯的红线。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将这条红线划在哪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0 февраля 2019 г.

里。”^①这样的态度表明，俄罗斯不会再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外交或经济领域，而是会选择进行全面的介入和干涉。

从国内政治的面向看，行动再集中主要体现为路径选择的集中、发展步调的统一和政策的激进化三部分内容。三项特征表明，俄罗斯不仅决意增强本国在大国博弈和区域政策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权，同样也正在回收原先各层级政府治理和发展的自主权，由国家统一设计把控。苏联解体之初，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和社会都出现了剧烈的分化。社会分化为多元的阶层和群体，国家则出现了权力的大面积沉降，原属国家的许多权力都被各层级政府所截获。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各联邦主体或地方联盟都在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模式。即使在 2000 年以后垂直权力体系得到加强，这样的政治格局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地区发展依然不均衡，各联邦主体在重点发展领域、改革次序、改革力度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俄罗斯联邦政府曾经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没有过多触动联邦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自主性，只是要求它们对联邦政治权威的服从。但随着数次央地关系的重新梳理和国家对联邦主体政治精英影响力的增强，俄罗斯近年来加快了国家集中的进程。

路径选择集中，主要体现在以国家项目的方式为地方施政划定优先级，引导地方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向国家的总体规划集中。俄罗斯联邦国家项目（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Ф）是俄罗斯 2000–2010 年间公共财政改革的成果。它是根据联邦总统提出的战略目标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项目包括健康福利、文教旅游、生活环境、工作就业、工业科技、数字转型与地方发展七大模块，实际上是为联邦和联邦主体政府各条块都划定了具体任务目标。项目虽然早已开始实施，但近年来俄罗斯对国家项目的重视明显加强。俄罗斯领导人多次提到，各联邦主体都需要将国家项目列为施政的第一目标，各地方政府都需要把对项目的认识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普京指出，“我想强调和重申：我们的发展项目不是联邦项目，更不是部门项目。它们是国家项目。它们的成果应该在每个联邦主体、每个市镇都能看到。在这个意义上，‘脚踏实地’意味着一大批具体任务目标的达成。”^②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1 апреля 2021 г.

^②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0 февраля 2019 г.

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是俄罗斯国家对统一发展步调的重视。2018 年后，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公开、明确地表达了对各联邦主体发展不均衡状况的不满，甚至直接“点名”一些执行不力、发展滞后的地区。这种不均衡，一方面是由于联邦主体首脑管理团队的工作不力，另一方面则是联邦主体政府与联邦政府沟通不畅。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地方债务重组问题。俄罗斯计划设立联邦基础设施预算贷款来帮助地方发展。2021 年普京指出，“我想提请联邦主体领导人和政府注意：让我们利落明快地工作。我不想在这里，在这个讲台上说粗话或严厉批评谁。但我们必须及时地做好一切，准备这些项目，不要只是用图片向政府求助。而政府必须迅速处理这些问题，帮助能力不足的地区。明白吗？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同事，而不是往垃圾桶一扔说：他们做得太差了。有些人不能按照你的要求去做——那就帮助他们，然后工作才能推进。”^①不难发现，2018 年以后俄罗斯对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发展目标和路径不符合国家战略的地区、发展速度达不到国家要求的地区，都会受到更大的压力。

实际上，压力不仅会指向特定地区，也会指向一些具体领域。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联邦和联邦主体政府的工作在一些领域内成效不彰，与既定目标差距过大，这主要不是客观障碍和任务难度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部门与地方管理团队的工作效率低下，因此需要以更大的力度予以推动促进。这也正是政策激进化的含义。普京多次强调，“改革的步伐必须逐年加快”，“我们还得做些什么，而且还要快”，“我们必须更快地从计划转向行动”^②。而具体措施不仅包括为社会经济发展设定明确的数据和指标，同样也包括确定明确的时间节点。许多领域都被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现出明显的变化，因此一些措施也会更加激进。以监督工作的立法为例，普京在 2019 年指出，“政府建议认真修订监督工作的法律基础。当然，这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应该得到支持。但我认为，即使这样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措施。让我们来划定一个期限：2021 年 1 月 1 日起，我们将废除各部门和地区所有现有的关于监管和监督的行政命令、来往公文和工作条例（приказы，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1 апреля 2021 г.

②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письма и инструкции)。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企业界的参与下，我们需要更新法律法规的框架（нормативная база），只保留那些符合现代要求的文件。至于其余文件——送到档案馆去。”^①监管监督工作立法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这些案例证明，俄罗斯领导人判定俄罗斯在国内外两个方面所受到的压力都在增大，而且所受到的国际压力与国内发展现状之间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匹配现象，因此将会倾向于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达成特定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四、结语：政治史的回溯与新的周期

从上文对“权力再集中”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再集中”不是一系列的临时措施，也不是特定政治周期内的特异性导向，而应放到大时间尺度上进行观察和理解。“再集中”实质上是俄罗斯高层精英对苏联-俄罗斯百年政治史的回溯，是对 30 年来俄罗斯种种政治试验和探索的调整，是对 30 年来俄罗斯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和总结，也是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再次选择。“再集中”的战略意味着，在俄罗斯领导人的观念中，过去 30 年的许多政策都是在历史条件约束下作出的折衷选择，在有能力调整时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同时，过去的一些做法可以延续，但另一些被认为是无效的做法需要被放弃或替代。总体而言，“权力再集中”的道路表明，俄罗斯将对全球化、分权化、地方化、多元化等各种去中心化发展方式进行改革，在某些领域回到关键的选择节点之前，重新延续传统的、熟悉的、被认为是可靠的中心化发展模式。这样向传统政治经验的“回归”会推进到何种程度尚需进一步观察，但这一趋势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权力再集中”战略也意味着俄罗斯继 2000 年后再次进入了一个长稳定的政治周期。新的周期内虽然会延续过去 20 年的既定政治逻辑，但一些过去未能达成的政策目标将会加速实现，过去没有发生的结构性调整将会加速进行。在国际政治领域，可能观察到俄罗斯更多侧重于对国家利益的强调而非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可能观察到更多的大国对抗以替代原先的大国

^① Путин В.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0 февраля 2019 г.

竞争，也可能观察到俄罗斯更主动、更深层次地介入地区政治。在国内政治制度领域，可能观察到对联邦和联邦主体政府的更多制约，可能继续观察到“政权党把控大方向、新政党覆盖新领域”的政党格局，也可能观察到更多官方或半官方替代性制度机构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而纯粹的社会组织活动向志愿服务与文化传播领域集聚。在政治精英领域，可能观察到更加频繁的人事变动，特别是中层精英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也可能观察到精英群体与派系的进一步分化对立。在政策实施领域，可能观察到更多由国家出台的制度和规划以替代地方性的道路探索，可能观察到更迅速的政策颁布，也可能观察到更多突发性、大范围的激进改革。

俄罗斯的“权力再集中”道路选择也给社会科学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启示。社会科学研究中常会采用“棘轮效应”来描述发展进程。这是指发展一旦达到某个指标或越过某个节点，那么它就将以此作为基准，所有关于模式和规则的技术性讨论都会在这个基准线以上展开。政治学研究中也会将这样的现象描述为“路径依赖”，即制度会进行自我再生产与自我强化。新的规则一旦替代旧规则，就会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约束。打破这一规则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此发展会沿着既定的路径一直延续。但无论是“棘轮效应”还是“路径依赖”，实际上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一方面，理论可能高估了试验探索产生的新规则相对于既有规则的比较优势。试验探索中也许会出现大量挫折与失败，这些都会削弱国家与社会对新规则的认同。另一方面，理论可能低估了一些国家对规则制定、制度塑造和道路选择的把握能力。当各个社会群体都在国家总控的框架内展开博弈时，国家是完全可能对发展节奏、发展路径进行调整的，路径依赖的现象也完全可能被国家力量扭转。此外，理论还可能低估了历史与时间的作用。政治精英在关键节点上作出选择时，不仅会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约束，更会受到历史记忆和制度资源的影响。他们的选项并不仅限于横向的有限可能，而且可能在纵向上对现实政治和历史经验进行比较，从而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对节点和路径进行回溯。

2018 年是平凡的一年，没有人意识到，随后的若干年将会发生多少影响俄罗斯政治进程的重大事件。每一个事件在发生时都被预测为可能对俄罗斯政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又会再一次挑战甚至颠覆人们

的固有认知。无论如何，俄罗斯在这一年开始了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未来俄罗斯政治是否能完成其制度设计与道路规划的目标，仍需留待时间检验。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hile continuing the consistent logic of the three basic political concepts, namely, the state,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Russia has begun to reorient its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due to the three main factors of senses of unevenness, estrangement and security anxiety. This orientation could be summarized as a “power reconcentration” strategy. “Power reconcentration” includes at least two parts, i.e., the reconcentration of both political power and political action, both of which cover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reconcent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refers to the de-emphasis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empowerment, and emphasis on centralized power and exclusive rules, which is embodied in transition from globalization to de-glob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to alternative system concentration i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rom local autonomy to federal jurisdiction concentration. The reconcentration of political action means emphasizing unified goals and actions instead of laying emphasis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l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reconcentration of ac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from great power game to confrontation among great powers and from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dominance of great pow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politics, the action reconcentr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path selection, the unification of development pace and the radicalization of policies. The “power reconcentration” strategy means that Russia has made in-depth adjustments in both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se adjustment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simply as short-term or temporary measures, but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a higher level, a larger context, a deeper logic, and a furth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 a summary of Russian leadership 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ver the past 3 decades and a vision of the future pat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 means that Russia has begun to reflect on its own political history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Russian politics has begun to enter a new cycle as well.

【Key Words】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Russian Political Transition, Power Reconcentration, Russian Diplom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должа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ую логику трёх баз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ичности и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пере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 будущ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ы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трёх основ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ощущения разрыва, чувства отчуждённости и беспокойства з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у направленную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у можно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ть как стратегию «пере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власти». «Пере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власти»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как минимум две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переконцентра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и переконцентра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обе эти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охватывают аспекты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ак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ере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означает снижение акцента на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и наде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ями,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ую власть и эксклюзивные правила, что находит отражение 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процесса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в процесс антиглобализма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это выражается в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пользу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и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пользу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юрисдикции.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акцент делается не на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и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на единых целях и еди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я действий в основном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эволюции игры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переходе этой игры к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к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ю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я действий в основном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выбора пути, унификации темпов развития и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и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атегия «пере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власти»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Россия внесла глубокие коррективы как в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так и в реализацию политики. Эти коррективы не следу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е или временные меры, их следу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с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го контекста,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й логики 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альнейш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х следует понимать как обобщение опыта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лидеров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последних 30 лет и взглядов на будущий пу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еализация эт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означ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осмыслив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историю за более чем сто лет, но и чт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начала входить в новый цикл.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е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влас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的复合型政党体制与政治韧性*

朱积慧 杨康书源**

【内容提要】“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普遍未按西方预想的轨道进行民主化转型，相当多国家形成了选举型威权、竞争性威权等混合政体，同时建立起霸权型政党体制，并且在政治实践中展现出明显的政治韧性。作为“第三波”国家中的主要代表，俄罗斯也建立起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混合政体，其政党体制同霸权型政党体制在形式上相似，但存在实质性差异，是一套以“政权党、卫星党、反对党”为主体的复合型政党体制。尽管面临一系列国内外重大挑战，在2016和2021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克里姆林宫均能通过充分调动资源，有效运作复合型政党体制，成功确保统一俄罗斯党取得宪法多数席位，实现控制议会的目标，对维护俄罗斯国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政党体制 俄罗斯政治韧性 俄罗斯国家杜马 俄罗斯政党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5-0170(31)

自2012年普京第三次竞选总统开始，俄罗斯不断面临一系列内外挑战。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呈现螺旋式下滑，美欧对俄的强力经济制裁沉重打击了俄国内经济发展，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更令俄罗斯雪上加霜。面对极其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尽管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以下简称统俄党）（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的政治领导地位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在2016和2021年两次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俄党分别获得了450个席位中的343个席位（占比76.2%）和324个席位（占比72%），居于宪法多数地位，实现了控制议会的目标。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朱积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康书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通常情况下，与外交相比，国内治理的表现对政党和领导人的支持率影响重大。在其他国家，如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困境，恐怕会导致执政党最终败选，但俄罗斯却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理解这一现象？本文认为，以“政权党、卫星党、反对党”为主体的复合型政党体制，是有效维护俄政治韧性的制度安全阀。通过构建、完善、运作这套政党体制，俄罗斯政权有力确保了统俄党最终胜选。本文将重点论述俄罗斯这套复合型政党体制的发展完善，以及其政治韧性是如何维护的。主要分为五部分：一是讨论“第三波”国家政党体制与政治韧性的普遍经验；二是对俄罗斯的转型、政党体制和政治韧性进行分析；三是具体阐述俄罗斯政党体制建设的主要历程，对复合型政党体制的结构和作用进行分析；四是在控制变量基础上用过程追踪法对2016、2021年国家杜马选举进行案例分析，探究政党体制维护政治韧性的因果机制；五是总结并展望俄罗斯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第三波”国家的政党体制与政治韧性

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西方学术界迎来了一场“民主化转型”学术狂欢。但让西方学者颇为失望的是，多数国家在转型中非但没有实现建立起符合其标准的民主政体，而是出现了民主和威权并存的趋势。与此同时，包含竞争性选举制度和非民主政治实践的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越来越普遍。^①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特点，就是在其末期反而出现了大量新的既不民主也非传统威权政体的国家。^②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了假民主（pseudo-democracy）、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选举型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① 关于混合政体的文献有很多，比较有影响力的如：L.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2, pp.21-35; S. Levitsky, L.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2, pp.51-65; G. Graeme, “A new turn to authoritarian Rule in Russia?” *Democratization*, 2006, Vol.13, No.1, pp.58-77; T.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1, pp.5-21.

^② See L.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pp.21-35.

等一系列概念，并开展了激烈的争论。

多国的政治实践表明，混合政体在很多国家表现出较强的政治韧性。在西方国家主导的民主化浪潮中，其核心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得以延续，部分国家政府更展现出了有效战胜危机、保持政权安全的能力。相当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混合政体或威权主义的政治韧性（political resilience）问题。^①政治韧性原是物理学概念，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中的政治韧性通常指一个政权因应内外挑战、维护政权安全、实现生存发展的能力，强调政府在设计政策时面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灵活性以及执行政策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②政治韧性强的政权，其制度安排应具有持久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其政治秩序应呈现“积极稳定”的状态，民众可能对政权内的部分官员、部门或地方政府不满，但对政权整体和中央政府保持总体满意，大规模社会运动较少，社会秩序保持总体稳定。^③

政治制度化是理解这些国家保持政治韧性的一条重要路径。混合政体国家固然可以通过强制、收买等手段来维护统治，但通过完善自身政治制度、以合法正式的政治程序来巩固权力才是长久之道。因此，正如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威（Lucan Way）所强调的那样，国家的组织性权力（organizational power）对混合政体国家能否延续具有重要影响，而组织性权力即国家掌控、压制反对派力量的能力，主要由强力部门、司法机构、议会、政党、税收等制度及其机构能力所决定。^④

① 参见 O. J. Reuter, “Why is party-based autocracy more durable? Examining the role of elite institutions and mass orga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2022; A.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3, Vol.14, No.1, pp.6-17; O. J. Reuter, N. Buckley, A. Shubenkova, G. Garifullina, “Local Election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 Elite-Based Theory with Evidence from Russian Mayoral Elec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Science*, 2016, Vol.49, pp.662-697; O. J. Reuter, R. Turovsky, “Dominant Party Rule and Legislative Leadership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Party Politics*, 2014, Vol.20, No.5, pp.663-674; 张长东：“混合型政体与威权主义韧性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4 年第 5 期，第 36-41 页。

② 参见俞秋阳：“治理的韧性分析及其理论重构：基于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20 年第 5 期，第 44-50 页。

③ 参见项继权、俞秋阳：“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江海学刊》，2017 年第 3 期，第 111 页。

④ See S. Levitsky, L.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4.

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政党体制自然也是政治制度化的核心。正如萨托利所指出的，“现代民主完全是建立在政党上的，民主原则应用得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认为没有政治党派也能够实现民主，那不是幻想就是虚伪”^①。作为政治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政治制度化是通往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而“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性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的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②。因此，要理解混合政体国家的政治韧性，就需要理解其政党体制。

相比传统威权政体，相当多的混合政体国家选择了霸权型政党体制（Hegemonic Parties Systems）而非一党制。霸权型政党体制介于一党制和多党制之间，是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和一党执政的结合，主要特点为：长期垄断政权的政治组织是政党而非军队或家族；多党选举制度得以保存，但不会产生频繁的权力更替。^③在萨托利看来，霸权型政党体制与一党制不同，这种体制允许其他政党作为第二等级的、特许的政党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舆论、监督当权者、进入立法行政机构，但不允许正式的、事实的权力竞争，因此，不仅轮流执政在事实上不会发生，而且霸权党还将长期占据政权。^④

霸权型政党体制下的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制度，对促进混合政体国家的政治韧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一个强大的支配型政党是维系政治韧性的关键角色，可以通过控制国家政治经济资源、建立庇护关系等方式消除反对势力，通过党内意识形态和纪律来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通过党内制度化建设来调解统治精英潜在内部冲突，从而提升国家组织性权力和政治韧性。^⑤另一方面，霸权党需要通过组织定期选举来为其统治地位提供至少是

① [美]萨托利著：《民主新论》，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1页。

③ 参见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69页。

④ 参见[美]萨托利著：《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21页。

⑤ 参见张长东：“混合型政体与威权主义韧性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5期，第36-41页。

程序上和形式上的合法性来源。同时,通过将 these 选举置于其严密控制之下,来继续强化对权力的控制。简言之,混合政体国家希望获得选举的合法性,但不用承担民主的不确定性,通过可控的反对党和有限竞争来帮助其巩固统治。^①反对党不仅不是虚伪的存在,而且其主要的价值是为执政党提供内部和外部的合法性。^②有限的政党竞争对混合政体国家还有着其他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多地扩大利益同盟,为统治集团吸收社会精英、“驯服”反对团体,为民众提供一定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和平台;另一方面,可以将真正的极端反对派边缘化,挤压其生存空间,从而减少执政或选举中的不可预测性,强化执政党的竞争力和控制力,保障政权长期稳定。

从历史来看,珍妮弗·甘地(Jennifer Gandhi)和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通过对 1946-1996 年的威权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发现多党制下的立法机构有助于执政者有效掌控潜在的反对力量,扩大政权支持基础,从而延长政权寿命。^③从现实来看,尽管当前国际舆论对民主、威权的评价,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列维茨基和威提出,在大多数国家中,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仍然被普遍认为是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最主要途径,特别是对一些国家能力不足的政权而言,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的主要价值在于:为压制反对派、维系内部团结和巩固统治提供重要力量。^④

二、俄罗斯的转型、政党体制和政治韧性

人们在讨论民主化转型时,无法回避的就是俄罗斯这个最大的“民主转型”国家。一定程度上讲,民主化转型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主流理论,恰恰是因为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为西方政界、学界提供了“威权崩溃”的例子。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义无反顾地投向西方,全面开启民主化与市场化改革,更是

^① See A. Schedler,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2, pp.36-50.

^② See D. Solinger, “Ending One-Party Dominance: Korea, Taiwan, Mexico”,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 Vol.12, No.1, pp.30-42.

^③ See J. Gandhi, A. Przeworski,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Survival of Autocrats”,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2007, Vol.40, No.11, pp.1279-1301.

^④ See S. Levitsky, L. Way, “The New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20, Vol.31, No.1, pp.51-65.

提供了绝佳案例。但俄罗斯并未沿着西方设想的路径进行民主化转型，哪怕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也与西方民主标准相去甚远。2000年普京上台，在经历了国家濒临分崩离析的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复杂艰巨的内外挑战，同时也由于俄罗斯国力逐步恢复，克里姆林宫开始逐步加强对国内政局的控制。特别是在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等恐怖主义活动、欧亚地区一连串“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等内外压力下，克里姆林宫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在苏联解体10周年之际，俄罗斯学者就曾提出，尽管民主几乎仍然是“最值得关心的事情”（The only game in town），但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依然很不理想，俄罗斯成了建立在组织虚弱的政府之上、同时依靠个人领导和民主立法的混合政体。^①尽管依然保留着多党制和议会（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总统、地方行政长官等不同层次的竞争性选举，但其政治运作已与西方理想的民主政体相去甚远。此时，俄罗斯也逐步成了混合政体研究的典型案例。^②

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演进也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家政治变化的关键部分和重要表现。经过30多年的发展，尽管形式上仍然存在行政、立法、司法的基本架构，但俄罗斯当前的政治体制并非一般意义的三权分立，而是呈现“总统-三权”的二元结构，总统作为超然的权力中心对三个权力分支进行领导和支配。^③经过苏联解体后从无到有的探索，俄罗斯逐步建立起了以统俄党为核心的“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体制，成为俄罗斯基本政治体制的重要配套和支撑。从政党类型学来看，更接近多党竞争、一党长期主导的霸权型政党体制，但又与其存在着差异（下文将进一步详细阐释）。学界普遍认为，政党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比较边缘化，总体上附着于克里姆林宫。俄

^① See L. F. Shevtsova, M. H. Eckert, “Russia’s Hybrid Regim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 Vol.12, No.4, pp.65-70.

^② 关于俄罗斯混合政体的判断在西方学术界已有较多共识和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参见 H. Hale, “Eurasian politics as hybrid regimes: The case of Putin’s Rus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0, Vol.1, No.1, pp.33-41; N.Petrov, M.Lipman, H. Hale, “Three dilemmas of hybrid regime governance: Russia from Putin to Putin”, *Post-Soviet Affairs*, 2014, Vol.30, No.1, pp.1-26; D. Treisman,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in a hybrid regime: Russia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1, Vol.55, No.3, pp.590-609.

^③ 参见费海汀：“俄罗斯的政治结构及发展趋势——2020年宪法修改前后的比较”，《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第61-88页。

俄罗斯的历史传统、联邦制、超级总统制以及寡头集团等多重因素造成了政党的政治空间被挤压，从而阻碍了俄罗斯的民主发展。^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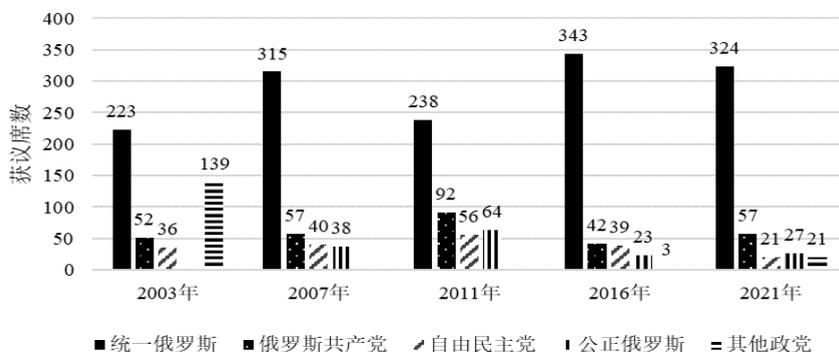


图 1 2003—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结果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自制。^②

俄罗斯的混合政体也展现出了较强的政治韧性。首先，最显而易见的表征就是俄罗斯政权的稳定性。政权党统俄党实现了对议会的长期掌控，在 2003 年以来的 5 次杜马选举中均成为第一大党，2016、2021 年均以绝对多数胜选。其次，俄罗斯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也保持总体稳定：虽然在 2020 年前俄罗斯已对 1993 年宪法进行了 16 次修改，但宪法基本框架与核心内容始

^① 部分关于俄罗斯政党体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 H. Hale, T. Colton, “Who Defects? Unpacking a Defection Cascade from Russia’s Dominant Party 2008-1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Vol.111, No.2, pp.322-337; Y. Gaivoronsky, “The dual logic of Russia’s party system nationaliza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9, Vol.52, No.4, pp.323-330; M. Seredina, “Parties in Russia: party system nationalisation in dominant party system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22, Vol.38, No.2, pp.208-226; V. Gel’man, “Party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Competition to Hierarchy”,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6, pp.913-930; H. Hale, *Why Not Parties in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R. Smyth, “Strong Partisans, Weak Partie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Partisanship in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6, Vol.38, No.2, p.209-228; K. Wilson, “Party-System Development under Putin”, *Post-Soviet Affairs*, 2006, Vol.22, No.4, pp.314-48. 方婷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3 期；范纯：“论当代俄罗斯政党体制特征”，《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8 页；唐贤兴：“无执政党的政治：后苏联俄罗斯政党体制的变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2 期，第 77-83 页。

^② ЦИК России. Календарь выборов. 15 июня 2022 г.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izbirkom>

终未变，2020年修宪也是对普京20年执政经验的总结，巩固了俄罗斯现行政治制度。^①此外，俄罗斯民众对政权、政府和政党呈现出了不同的评价。如图2所示，列瓦达中心2000—2020年的跟踪民调显示，20年来普京的支持率始终保持在超过60%的高水平区间，而对俄罗斯政府和国家杜马的支持率明显偏低，政府仅有7年支持率超50%，对国家杜马的支持率甚至没有一年超过50%（2006—2010年杜马数据空缺）。这也恰好符合政治秩序的“积极稳定”状态，即对政权的具体组成部分（政府、杜马）存在不满，但对政权（总统作为其代表）总体认可。

一般认为，强化政权的政治韧性主要有国家能力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两种途径。^②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怀特（David White）认为，俄罗斯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相对较弱，俄政府在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经济治理能力等方面动力不足，更专注于通过建立“垂直权力”控制地方、压制反对派、强化强力部门等方法巩固政权。^③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俄罗斯的政党体制和选举实践是提升俄政治韧性的关键构建之一。扎瓦德斯卡娅（Magarita Zavadsкая）等的研究认为，俄罗斯的选举实践堪称服务政权的典范，俄当局充分发挥了竞争性选举信息收集和拉拢、吸纳功能，有助于维持统治。^④俄罗斯选举呈现出一种混合政体下受行政当局控制的可控民主。^⑤克里姆林宫通过调动运作政党体制、充分发挥总统的个人魅力，来消弭选举的混乱和不确定性，确保选举结果符合克里姆林宫意图，确保政权党控制议会、行政

① 参见庞大鹏：“论俄罗斯的宪法改革”，《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第73-105页。

② 参见项继权、俞秋阳：“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第112-113页。

③ See D. White, “State capacity and regime resilience in Putin’s Rus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8, Vol.39, No.1, pp.130-143.

④ See M. Zavadsкая, M. Grömping, F. M. I Coma, “Electoral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Russia: Varieties of Electoral Malpractice, 2007-2016”, *Demokratizatsiya*, 2017, Vol.25, No.4, pp.455-480.

⑤ 关于可控民主的研究成果参见 T. Colton, M. McFaul, *Popular Choice and Managed Democracy: The Russian Elections of 1999 and 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3; L. March, “Managing Opposition in a Hybrid Regime: Just Russia and Parastatal Opposition”, *Slavic Review*, 2009, Vol.68, No.3, pp.504-527.

系统对总统保持忠诚，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政治一致。^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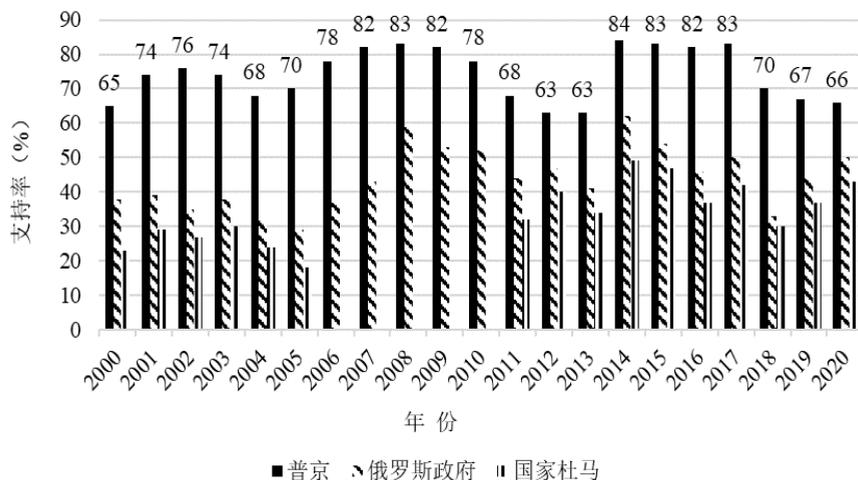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民众对普京、俄政府、国家杜马的支持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列瓦达中心 2020 年民调数据自制。^②

三、以“政权党、卫星党、反对党”为主体的复合型政党体制

(一) 掌控规则的政权党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逐步出现极为特殊的“政权党”现象。尽管 1993 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13 条第 1、3 款明确规定“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承认政治多样性和多党制”。但事实上，90 年代的俄罗斯经历了一段“无政党的政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化位置，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克里姆林宫通过行政权力主导俄国家政治生活，政党基本被“超级总统制”隔离在政治权力运作之外。^③

^① 参见杨成：“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模式的内在逻辑及发展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2-18 页。

^② Levada Center, “Approval Ratings”, September 21, 2020, <https://www.levada.ru/en/2020/09/21/approval-ratings-16/>

^③ 参见唐贤兴：“无执政党的政治：后苏联俄罗斯政党体制的变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2 期，第 78 页。

出于获得并保持执政合法性和其他便利的需要，克里姆林宫开始组建服从于自己的政党。根据叶利钦的建议，1995年由前总理切尔梅诺金领导成立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Наш дом – Россия）并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很多地方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可谓是首次组建政权党的尝试。^①但在之后几次杜马大选中，该党并未成为多数党，对叶利钦总统的支持力度也相对有限。普京上台后，重新整合政党资源，将“团结”党、“祖国”和“全俄罗斯”运动合并起来，于2001年成立了明确支持普京的统俄党。统俄党在2003年杜马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此后，该党先后推举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作为候选人参加2004、2008和2012年的总统大选并获胜，普梅二人还分别在担任总理期间成为该党主席。除控制议会外，统俄党还通过在全俄各联邦主体建立党组织对地方官员加强影响，大大增强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威。^②可以说，到2003年统俄党成为杜马多数党后，政权党已经正式形成了。

需要明确的是，政权党（Party of Power）并非执政党（Party in Power）。执政党有着明确的党组织、党员和选举机器，政治精英作为党的成员通过选举上台来组织政府，控制国家机器。而在俄罗斯出现了十分不同的情况：参选总统不一定由政党推举，有时甚至可能以独立身份参选，议会多数党也没有组阁权。政权党的终极目标是要在行政官员们的权力不被分散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立法支持。^③如果说执政党是“先政党后政权”，那么政权党则是“先政权后政党”。

俄罗斯的政权党也和混合政体中的霸权党不同。事实上，尽管政权党与霸权党有相似之处，但最关键的不同在于，霸权党拥有大量党员、严密的组织和一贯的政策主张、意识形态，也是政策制定和政府运作的核心；但政权党的权力不源于党自身，而是源于党外的总统。^④换言之，政权党没有党的

① 参见孙凌齐：“切尔诺梅尔金与‘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8期，第23-25页。

② See F. Okeke, A. Karnieli, “Federalism and Political Recentraliz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nited Russia As the Party of Power”, *Publius*, 2006, Vol.36, No.4, pp.503-522.

③ 参见那传林：“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权党’现象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第90页。

④ See L. March, “Managing Opposition in a Hybrid Regime: Just Russia and Parastatal Opposition”, *Slavic Review*, 2009, Vol.68, No.3, pp.504-527.

自主性，并不能实际掌控政权，是克里姆林宫维护政权的一种途径。无论是统俄党在杜马的压倒性多数还是梅普二人轮流担任党主席，并不意味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精英就已成为党的一部分、党成为权力中心。相反，是克里姆林宫选择了统俄党，而非统俄党选择了克里姆林宫。这意味着，统俄党执政是假象，它必须依赖官僚体系和总统庇佑才可能保持“掌权”姿态。换言之，一旦总统放弃（尽管可能性不大），统俄党就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政权党的生成逻辑也为其带来了最大的内生性危机，即所谓“代表性断裂”问题。汪晖认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普遍性危机，是各国政党在国家化过程中日益服从国家逻辑，逐步与国家机器同构，一方面以宣称普遍代表性来超越阶级范畴，另一方面却与大众特别是底层民众更加疏远，进而出现“代表性断裂”。^①作为一个由政权创建、服务于政权的政权党，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党，统俄党甚至不存在政党国家化过程，因为其自始至终都是政权的附属品。国家性先于阶级性、脱离大众、缺乏群众基础，是统俄党的重要内在特征。这造成的问题是，在不改变其内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凝聚力的情况下，统俄党所能代表的社会团体更加受限，由此可能逐步丧失政治代表性，进而失去了其合法性。

从统俄党对自身群众基础的定义来看，在党章中就对支持者给出了一个近似“全民党”的模糊泛化的定义，即“统俄党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政党，即支持俄联邦总统及其战略方针的公民”^②。事实上，民众支持度低、社会声望不充足也成为统俄党的最大困境。在最新一届政府中，除总理不是统俄党的党员外，许多部长也不再是统俄党的党员，政府反而在努力和统俄党进行切割。统俄党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近年来更加注重贴近民众，“下沉基层”，致力于解决更迫切的民生问题，提出“人民纲领”（Народ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强调将“尽一切努力为公民谋福利，提高生活质量，巩固社会，确保国家可持续、进步发展。为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为舒适和安全的生活、体面的工作和收入、成功的事业创造机会”^③。统俄党还打造了包括住房保障、

① 参见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第70-79页。

② Устав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1 июня 2022 г. <https://er.ru/party/rule>

③ Народ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1 июня 2022 г. <https://er.ru/party/program>

残疾人关怀、卫生健康、儿童体育等 13 个政党项目（Проекты партий），选派资深杜马议员推进有关立法和社会保障工作。^①

（二）挤压真正反对派的卫星党

在对俄罗斯混合政体的研究中时常忽略的一点是卫星党，如公正俄罗斯党（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Россия）和祖国党（Партия «Родина»）等^②。俄罗斯的卫星党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具有半官方特点，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克里姆林宫的掌控较强，在重要问题上对普京强力支持；二是，通过自身主张、意识形态吸引特定人群支持，扩大国家政权的支持基础；三是，保持反对派的外在特点，具有形式上独立的组织、纲领和活动，以提升政权合法性基础。但卫星党不是反对党，其关键的区别在于政党的自主性。^③卫星党存在的主要目的在于替国家政权争取不同社会群体的支持、吸纳驯服潜在反对力量，“克里姆林宫制造”的特点突出，本质上可以说是政权党的“次级形态”，甚至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党。

卫星党存在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统俄党面临的“代表性断裂”问题。这一点在俄左翼更为明显。俄罗斯是苏联的最大继承人，很多俄罗斯中老年人依然对社会主义的生活充满怀念。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困顿的背景下，一些年轻人也对社会主义思潮更加认同。因此，重新组建的俄罗斯共产党在久加诺夫带领下在左翼群体中十分有吸引力，特别是其继承自苏共的组织性使得俄共一直保持较强的影响力，基本上长期占据杜马第一大反对党的地位，1996 年甚至一度成为杜马第一大党，对克里姆林宫形成现实的威胁。如何应对这一威胁，成为俄罗斯当政者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公正俄罗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克里姆林宫创建出来的卫星党。据祖

^① См. Проекты партий. 1 июня 2022 г. <https://proekty.er.ru/#content>

^② 祖国党一直以“普京的禁卫军”定位，于 2012 年再次独立建党，现任党主席为前统俄党成员茹拉夫廖夫（А. Журавлёв）。

^③ 政党自主性主要是指，作为一个具有自身意志的政治组织，政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既有能力避免外部势力的控制与支配，也有能力抑制自身内部势力的分裂与异化，自觉认同并坚持意识形态，通过有效方式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致力于实现自身任务。有关概念参见李海青：“使命型政党的自主性：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主体特质”，《理论视野》，2020 年第 8 期，第 73-80 页；董亚炜：“论政治文明中制度建设的基本关系：政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晋阳学刊》，2004 年第 4 期，第 16-19 页；高卫民：“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国家自主性新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 年第 1 期。

国党领导人罗戈津（Д. Рогозин）的回忆，普京曾在 2003 年告诉他，“必须出现一个严肃的、有现代思维的左翼政党来取代俄共，这对国家有好处”^①。2006 年 3 月 24 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В. Сурков）在参加俄罗斯生活党会议时发表谈话：“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除了大党之外，在社会上没有‘第二条腿’（second leg）可以提供支撑，而第一条已经麻木，这使得系统不稳定……下阶段的任务就是形成一支政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现在的统治党。”^②仅 7 个月后，2006 年 10 月 28 日，俄罗斯生活党、祖国党、俄罗斯退休者党三个左翼政党宣布合并为公正俄罗斯党，以“21 世纪的新社会主义”为纲领，推选与普京关系紧密的米罗诺夫为党主席。2007 年 12 月该党首次进入国家杜马，并在 2008 年总统大选中支持梅德韦杰夫。合并后的公正俄罗斯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俄政治生活的一股重要力量，成为杜马中的第三或第四大党，为克里姆林宫稳固左翼阵营做出了贡献。2007 年，公正俄罗斯党在组党后首次参加的杜马选举中，吸纳了很多之前的左翼小党支持者，再加上统俄党的强势，议会中四大党派格局基本奠定下来并延续至今。为了提升在 2021 年杜马选举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该年 1 月，公正俄罗斯党同俄罗斯爱国者党、为了真理党合并，改名为“公正俄罗斯-爱国者-为了真理”党，并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政党，仍由米罗诺夫任党主席。^③

在右翼也存在相似功能的政党，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Либер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这个右翼政党在 1989 年由著名的俄罗斯“大嘴”日里诺夫斯基（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建立，是苏联实行多党制后建立的第一个体制外政党。该党向来以民族主义闻名，主张“联合俄罗斯国家的所有爱国主义力量，以实现国家的民族复兴，防止俄罗斯蜕变为西方的半殖民地，恢复俄罗斯的伟大强国地位”^④。他们既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也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日里诺夫斯基还经常发表

^① See L. March, “Managing Opposition in a Hybrid Regime: Just Russia and Parastatal Opposition”, *Slavic Review*, 2009, Vol.68, No.3, pp.504-527.

^② Ibid.

^③ See Sergei Vedyashkin, “Russian Parties Merge Ahead of Highly Anticipated State Duma Race”, *the Moscow Times*, Jan. 28, 2021,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1/01/28/russian-parties-merge-ahead-of-highly-anticipated-state-duma-race-a72766>

^④ 李兴耕：“俄罗斯四大议会政党的意识形态比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 年第 12 期，第 88 页。

惊人言论。西方学者常常评价自由民主党“除了名字以外，既不自由也不民主（neither liberal nor democratic）”^①。尽管该党时常批评克里姆林宫，但日里诺夫斯基在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大多数国际事务上，是普京的坚定盟友。例如他坚定地反对北约东扩，反对西方。2007年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А. Литвиненко）在英国遭暗杀后，日里诺夫斯基就高度赞扬此行动，甚至将英国认定的嫌疑人安德烈·卢戈沃伊（А. Луговой）推举为该党杜马候选人。^②在国内事务中，不论发出多么激烈的措辞，自由民主党也很少反对统俄党的议案。

为加强同各政党联系，时任总理的普京于2011年发起成立了全俄人民阵线（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缩写为ОНФ），作为明确支持普京的政党联盟，其口号为“如果你支持普京，那你就是在支持阵线”（Если ты за Путина, значит ты за Фронт），成员包括统俄党、公正俄罗斯党、祖国党、新人党、俄罗斯生态党“绿党”和乌克兰进步社会党，该阵线的意识形态与普京相同，即中间偏右的“温和保守主义”。全俄人民阵线被视为普京和统俄党同选民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新思想、新人才的培养皿，深受普京的重视，地位不断上升，甚至不时有议论称要用它来替代名声不佳的统俄党。^③考虑到全俄人民阵线旗帜鲜明地支持普京的主张和以中小党为主的构成，该阵线也可以被视为事实上的“卫星党联盟”。

除增强代表性、提升总统的执政合法性外，这几个政党领导人也在政权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被吸纳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了现政权的利益同盟。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罗诺夫在2001—2011年期间就一直担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也在2001—2011年担任国家杜马副主席。祖国党领袖罗戈津长期获得重用，2007年被任命为驻北约大使，2011—2018年任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总理，2018年后任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在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① T. Colton, *Yeltsin: A life*, Arizona: Basic Books, 2008, p.282.

② 参见“毒杀俄前特工利特维年科的嫌犯声称将竞选俄总统”，中国新闻网，2007年9月18日，<http://www.chinanews.com/gj/gjrw/news/2007/09-18/1029684.shtml>

③ See E. Ferris, “The Friendlier Face of Putinism”, *Foreign Policy*, January 7,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1/07/onf-all-russia-peoples-front-putin-public-popularity/>

（三）进退维谷的反对党

西方学术界常将反对党分为“体制内反对党”（systemic opposition）和“体制外反对党”（non-systemic opposition）。目前对俄罗斯反对派的划分也大致沿用这一方法。^①前者主要指除统俄党之外进入国家杜马的主流政党；后者则指纳瓦尔内等未正式注册、未组成政党的反普京力量，认为当前俄罗斯政治出现了一种“有反对派”而无“反对党”的局面。诚然，尽管以纳瓦尔内为代表的亲西方势力^②始终扮演着普京的强力批判者和反对派的角色，深受美西方国家的青睐和支持，但纳瓦尔内及其支持群体并无任何建设性纲领，更接近于一个“逢普京必反”的民粹主义者，只能采取院外活动的方式来表达意见，在俄当局的全力打压下生存更为艰难。此外，亚博卢集团等传统自由派政党的生存空间近年来也持续遭受挤压，难以进入国家杜马，更谈不上对普京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本文对反对党的讨论主要是在“体制内”的框架下进行，因此成为反对党的先决条件是要成为政党，即要正式注册和具备政党在组织、纲领、活动等方面的基础条件，故纳瓦尔内等难以被纳入其中。其次，要具有实质性的反对力量，通过进入国家杜马或至少在地方占据一席之地发挥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按照这样的标准，亚博卢集团等小党是难以发挥反对党的作用的。最后，如上文所述，反对党和卫星党的关键区别在于政党自主性，因此，真正能持续对克里姆林宫产生实质性反对党作用的只有俄共。

从自身发展历程看，俄共的地位和影响力总体下降，但仍然是普京政权不能忽视的一支力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 1993 年重建，俄共一直在杜马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在 1995 和 1999 年的杜马选举中还两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 1996 年的总统选举中，俄共组织了强大的左翼联盟支持久加诺夫参选，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 32.5% 的选票，仅比叶利钦少 3.3 个百

① See C. Ross, *Systemic and Non-Systemic Opposi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ivil Society Awakens?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2-10.

② 有学者认为纳瓦尔内为代表的俄罗斯自由派意识形态较为复杂，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既亲欧洲、支持民主，又有仇外思想。参见 M. Laruelle, “Alexei Navalny and challenges in reconciling ‘nationalism’ and ‘liberalism’”, *Post-Soviet Affairs*, 2014, Vol.30, No.4, pp.276-297; N. Moen-Larsen, “‘Normal nationalism’: Alexei Navalny, LiveJournal and ‘the Other’”,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4, Vol.30, No.4, pp.548-567.

分点，在第二轮选举中获得了 40.7% 的选票，但惜败于叶利钦。^①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历使得俄共确立了其第一大反对党的地位，也使得克里姆林宫一直对其颇为忌惮。但在普京执政后，当局对俄共进行了持续有效的打击削弱，同时俄共自身严重内耗，以舍宁为代表的“激进派”等多个派别与俄共分道扬镳，使得俄共内部的凝聚力和对外形象均受到影响。^②同时，俄共也逐步从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党向“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政党转型，更多地选择与国家合作的中左道路，对普京政权的威胁大不如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俄共已逐渐转变为“体制内反对派”。^③尽管如此，俄共的第二大党地位总体稳固，始终占据着国家杜马第二多的席位，俄共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在历次大选中的得票数也均排名第二。

相比其他几个政党，俄共仍然有其显著优势。第一，在俄罗斯国内，依然弥漫着较为广泛的苏联和社会主义情怀。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多次的全国性调查中，大量俄罗斯民众都表达了对苏联的怀念。2013 年列瓦达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认为苏联是最佳体制的民众占比 36%，支持计划经济的民众占比有 51%；^④2016 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有 64% 的俄罗斯人赞成保留苏联，甚至在 18—24 岁的年轻人中支持保留苏联的人数占比也达到了 47%。^⑤在俄乌冲突和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情怀对民众的吸引力有所上升。^⑥马奇（Luke March）也认为，尽管俄共等左翼政党表现出停滞状态，但社会内部变化仍可能推动俄罗斯左翼运动重生。^⑦

① See T. Colton,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34-235.

② 参见李瑞琴：“多党制下的俄罗斯左翼政党：困境与出路”，《当代世界》，2017 年第 11 期，第 54—57 页。

③ 参见李永全：“作为政治反对派的俄共及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8—30 页。

④ See “Number of Soviet System Supporters Grows in Russia – Poll”, *Sputnik*, February 2, 2013, <https://sputniknews.com/russia/20130208179305284-Number-of-Soviet-System-Supporters-Grows-in-Russia--Poll/>

⑤ 参见“民调结果显示：逾六成俄罗斯人赞成保留苏联”，中国日报中文网，2016 年 3 月 17 日，http://world.chinadaily.com.cn/guojiji/2016-03/17/content_23907643.htm

⑥ See Liz Cookman, “Soviet nostalgia on Ukraine’s impoverished front line”, *Al Jazeera*, February 4,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2/2/4/soviet-nostalgia-ukraine>

⑦ See C. Ross, *Systemic and Non-Systemic Opposi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ivil Society Awakens? (1st ed.)*, pp.96-110.

第二，俄共继承了苏共的遗产，除统俄党以外，俄共是目前唯一有完善组织架构的政党。俄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鲜明，政治基本盘也较为牢固，政治地位总体稳固。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俄共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共有 85 个地区机构，有超过 1.4 万个基层党组织，共有约 16 万名党员。^①第三，俄共开始更加重视组织建设和代际更新。在 2018 年总统大选中，“草莓大亨”格鲁季宁被推举作为候选人，地方党组织也涌现出一批年轻代表，并且他们曾在地方担任行政长官，如俄共党员波托姆斯基曾任奥廖尔州州长，列夫琴科任伊尔库茨克州州长，洛科季当选俄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市市长等。^②第四，俄共仍然具有较强的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将群众运动作为其进行议会斗争的重要辅助，致力于重振工人运动，高度重视组织抗议活动，仅 2016 年全年就开展了 11 次覆盖全俄的、总共约 1200 万人参加的大范围联合抗议活动。^③

俄共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第一，俄共近年来采取了同普京政权合作求生存的策略，不少人也将其视为“体制内反对党”，尽管俄共政治力量明显强过其他政党，但如果不能有效重新建立和扩大其政治吸引力，俄共也有失去其自主性、进而沦为卫星党的风险。第二，俄共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看上去是一支没有变化的、越来越衰老的政治力量。久加诺夫执掌俄共超过 20 年，据俄共官网显示，其党员平均年龄高达 55.6 岁。^④第三，俄共内部相继有力量退出，在较长时间内呈现消耗状态。2000 年，比较激进的“列宁派”退出；2002 年，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被开除出党，另立门户，宣布与俄共划清界限；2003 年，俄共外围组织“人民爱国联盟”领导人格拉济耶夫与俄共分道扬镳；2004 年的俄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又发生了反对派在另一个地方“另立中央”的闹剧，最终在俄司法部干预下才明确了久加诺夫的领导地位。^⑤

① См. КПРФ. О партии. Краткая справка. 1 июня 2022 г. <http://kprf.ru/party/>

② 参见许鹏、陈弘：“交流与交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斗争实践与生存定位”，《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 3 期，第 130-139 页。

③ 同上。

④ См. КПРФ. О партии. Краткая справка.

⑤ 参见戴隆斌：“俄罗斯共产党的现状、问题及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 年第 6 期，第 105 页。

四、案例分析：政党体制如何维护国家政权的政治韧性

通过对“第三波”国家和俄罗斯的政体、政党体制和政治韧性进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考察，我们发现，俄罗斯建立起了一种介于民主和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其政党体制与作为理论形态的霸权型政党体制相类似但不同，理解其异同的关键概念是政党的自主性，具体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权党不是霸权党，霸权党“先政党后政权”，政权党“先政权后政党”，自主性较弱；第二，卫星党不是反对党，由政权创建和间接控制，可被视为“半个政权党”，自主性较弱；第三，反对党数量少，通过与政权合作求生存，有沦为卫星党的风险，但仍保有相对较强的自主性（详见表1）。

表1 俄罗斯政党体制与霸权型政党体系的异同

理论形态	俄罗斯特殊形态	主要异同	政党自主性
霸权党	政权党	霸权党“先政党后政权”，政权党“先政权后政党”	较弱
反对党	卫星党	“克里姆林宫制造”特点突出，主要目标是完善政权政治光谱	较弱
	反对党	保有政党自主性，通过与政权合作求生存，但有沦为卫星党风险	较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俄罗斯的混合政体具有较强的政治韧性，而以“政权党、卫星党、反对党”为核心的复合型政党体制及其运作过程，是维持这种政治韧性、保卫普京政权的关键因素。

那么，政党体制具体是如何维护普京政权的政治韧性呢？考虑到俄罗斯复合型政党体制从属于政权、服务于总统的特殊性，在俄罗斯全国性选举中，政党体制对总统选举的影响最多只是间接的，选民支持的往往是普京个人而非统俄党等支持普京的政党；而在国家杜马选举中，选民直接对政党投票，包括总统等政权因素对选举的介入实际上也是政党体制的一部分。此外，从时间上看，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到

2014 年修改《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恢复混合选举制后，俄当前的政党体制和选举模式才基本成型。^①因此，出于控制变量的考虑，本文选择对 2016、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进行案例分析。从方法上，本文将使用过程追踪法^②，探究普京政权是如何通过运作政党体制克服不利因素控制议会的，寻求政党体制维护国家政权政治韧性的因果机制和主要变量。

表 2 案例总结

案例	不利因素	主要运作策略			选举结果
		支持政权党	操控卫星党	削弱反对党	
2016 年国家杜马选举	政治上，普京和统俄党遭遇政治低谷；经济上，国家发展面临困境；外交上，外部干涉风险上升	利用多数党地位修改《杜马代表选举法》；利用中选委将选举时间改至 9 月	降低进入议会门槛和小党参选资格，抢占俄共选票；共产党入党、支持正义退休者党吸引部分左派选民、挤压俄共选票	“克里米亚共识”使俄共陷入两难境地	统俄党获得宪法多数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	政治上，统俄党深陷形象危机；经济上，国内发展出现困境；外交上，外部干涉风险上升	拉夫罗夫、绍伊古等临时代表统俄党参选；推动顿巴斯居民为统俄党投票	创建新入党吸引年轻选民；改组俄罗斯自由和公正党吸引激进左翼选民	持续打压俄共候选人格鲁季宁；全面封杀“智能投票”	统俄党获得宪法多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2016 年国家杜马选举

1. 不利因素

一是政治上，普京和统俄党遭遇政治低谷。统俄党在 2011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遭遇滑铁卢。尽管仍获得了过半数席位，但较 2007 年的 70% 压倒性多数大幅减少了 77 席，未获宪法多数，其他三个主要政党席位数都增加了 12%—20%。此次选举还爆出选举造假和舞弊丑闻，多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

^① 参见方婷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3 期，第 104—112 页。

^② 关于过程追踪法的应用参见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 期，第 97—108 页；唐世平、熊易寒、李辉：“石油是否导致族群战争？——过程追踪法与定量研究法的比较”，《世界政治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54—87 页。

游行，^①当局进行镇压，亲普京团体也相应举行了支持政府的游行，^②一时间政局混乱。此外，2012年普京第三次竞选总统也颇为艰难，久加诺夫等竞选对手抨击选举舞弊，普京就职当天莫斯科发生了大规模示威。

二是经济上，国家发展面临困境。受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大规模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如图3所示，俄罗斯GDP增长率自2011年起持续放缓，在国家杜马选举的前一年（2015年）出现了负增长（-2%），人均GDP在2013—2016年间出现“三连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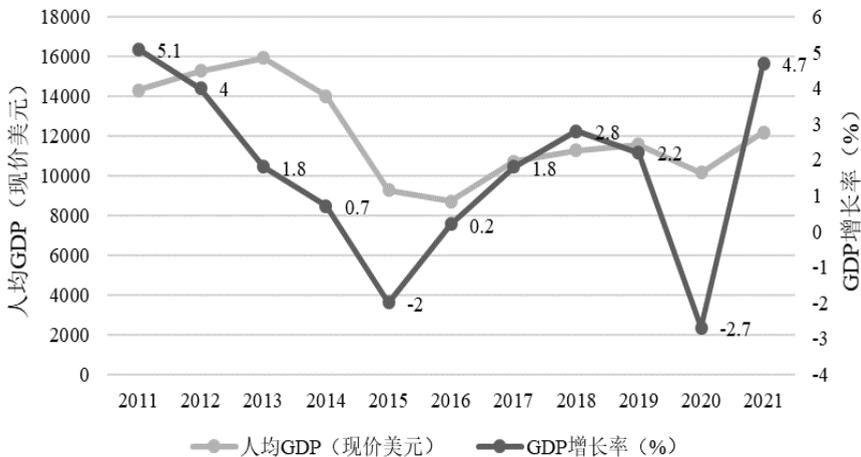


图3 俄罗斯人均GDP和GDP增长率（2011—2021年）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2).

三是外交上，外部干涉风险上升。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同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同时西方进一步将普京长期执政视为对俄推动自由民主的最大阻碍，采取信息战、资助非政府组织、扶植反对派等方法加大力度对俄罗斯内政进行干涉。据统计，2016年俄罗斯境内有超过4000个非政府组织得

^① See “Russia election: Hundreds rally against Putin in Moscow”, *BBC*, December 5, 2011,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6042797>

^② See Miriam Elder, “Russian election: police, troops and youth groups stifle anti-Putin protests”, *the Guardian*, December 6, 2011.

到美、德、英和挪威等西方国家提供的资助，规模超 720 亿卢布。^①

2. 运作策略

第一，利用多数党地位对选举制度进行调整。国家杜马 2014 年 2 月对《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为：一是将选举制度从比例代表制重新改为混合选举制，将 450 个席位中的一半（225 席）按各政党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名额，另一半按照选区进行单一席位竞争，即一个选区一个名额；二是进入议会的得票率门槛从 7% 降为 5%；三是在选举资格上有所放松，有 14 个政党有权参加杜马选举，比上一届翻了一倍。^②从形式上看，改革为更多小党参选和最终进入杜马提供了可能性，可视为是针对 2011 年选举混乱、顺应变革呼声的举措。但事实上，改革也有助于吸纳小党参与选举，分散反对派票仓，对反对党分而治之。在比例代表制的 225 个席位中，很多小党往往很难达到 5% 的门槛，但却分走了其他政党的选票；在单一席位的竞争中，统俄党又可以通过其遍布全国的强大行政资源来占据优势，其他党派更是难以与之相匹敌。如改革通过，俄罗斯共产党将面临既无强大资源、又遭遇小党挑战的被动局面，因此俄共极力抵制。最终法案投票呈现的局面是：统俄党全票赞成，自由民主党除一票弃权外全部赞成，公正俄罗斯党除一票反对外全部赞成，而俄罗斯共产党在总共 92 票中 2 票弃权、90 票反对。^③

第二，利用行政资源对选举细则进行调整。2016 年 6 月，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还决定将杜马选举从往年的 12 月提前至 2016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不少人认为这对最终的选举结果也产生了影响。因为这反映出俄当局有意通过控制投票率，特别是城市投票率，来削弱竞争对手。由于是周末，很多城市选民在选举当天会去郊区别墅，事实上对

① 参见蒋莉、李静雅：“西方与俄罗斯的干涉和反干涉”，《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10 期，第 18-26 页。

② См.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 февраля 2014 г. http://pravo.gov.ru/proxy/ips/?docbody=&link_id=0&nd=102171479

③ С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правка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по вопросу: (третье чтение) О проекте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232119-6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 февраля 2014 г. <http://vote.duma.gov.ru/vote/87892>

最终投票率偏低也产生影响。9月的选举也导致竞选活动被迫安排在8月，由于正值暑假，各党竞选效果大打折扣，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最终投票率也产生了负面影响。^①

第三，利用外部危机挤压反对派。2014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正式加入俄罗斯，随之在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克里米亚共识”(Крымский консенсус)。该共识主要包括：一是一致支持收复克里米亚，二是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族民兵，三是支持普京对西方的强硬外交政策，四是反对西方对俄试图采取的颠覆行动。据调查，这一共识的社会基础包括了85%—95%的俄罗斯民众，影响力可见一斑。^②由于核心内容是支持收复克里米亚和支持普京，该共识也被称为“普京共识”。俄共对此也高度评价，久加诺夫认为，“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回归祖国，为深入展开全民族对话奠定牢固基础。俄民众对顿巴斯人民共和国的英勇斗争的支持表明，社会上存在非常强烈的对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渴求！”^③在以往，俄共往往以普京批评者的姿态出现，但“克里米亚共识”导致各党派都团结在普京周围，俄共难持反对态度。此时，批评就会站在俄社会的对立面，不批评又会使俄共丧失其反对党的独立性，从而丧失对选民吸引力。这就使得俄共陷入两难境地，客观上为这次选举失利埋下祸根。

3. 选举结果

从结果看，事前部署顺利发挥作用，统俄党大获全胜。修改选举法对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两个左翼政党损失更为惨重，俄共和公正俄罗斯党分别损失50和41个议席。对公正俄罗斯党而言，由于与克里姆林宫走得过近，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批评为普京的“傀儡”，本次选举中也被很多选民抛弃，不仅议席大幅减少，在更反映民众呼声的比例代表选举中，得票率也减少了7.01个百分点，较2011年得票率下降超一半。极右的自由民主党取得不错成绩。尽管也减少了17个议

① 参见古谢列托夫：“201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及其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影响”，《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1期，第11页。

② См. РИА Новости. Крымский консенсу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мысл и значение. 24 марта 2014 г. http://ria.ru/zinoviev_club/20150324/1054181774.html

③ 转引自李兴耕：“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第108—114页。

席，但损失相对较小，在比例代表制中还获得 13.14% 的增长。自由派总体表现不佳。在比例代表选举中，亚博卢集团和人民自由党分别只获得 1.99% 和 0.73% 的选票，均未能达到 5% 的进入杜马门槛，在单一席位竞争中未能胜出，再次未能获得议席。除了选举规则变动外，选举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同俄国内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关，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推动右翼民粹势力上升，民众对于处于“克里米亚共识”之外的政党没有太多信任，并不接受自由化的纲领和倡议，这在莫斯科以外的广大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表 3 2016 年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果（仅包括进入杜马的政党）

	比例代表		单一席位		总数	
	比例 (%)	席位	比例 (%)	席位	席位	变动
统俄党	54.2	140	50.12	203	343	105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3.34	35	12.93	7	42	-50
自由民主党	13.14	34	10.09	5	39	-17
公正俄罗斯	6.22	16	10	7	23	-41
祖国党	1.51	0	2.47	1	1	1
公民平台	0.22	0	0.73	1	1	1
独立候选人			0.85	1	1	1

数据来源：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①

（二）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

1. 不利因素

一是政治上，统俄党深陷形象危机。受 2018 年退休金改革冲击，本已名声不佳的统俄党名望严重恶化，如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等政治精英纷纷主动与其保持距离。^②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数据，在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前，统俄党支持率已下降至 27%，相比 5 年前重挫近一半。同时选举既是

^① ЦИК России.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едьмого созыва. 18 сентября 2016 г.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region/izbirkom?action=show&root=1&tvd=100100067795854&vrn=100100067795849®ion=0&global=1&sub_region=0&prver=0&pronetvd=0&type=233

^② See Yelizaveta Mayetnaya, Robert Coalson, “Not So United: Russia’ Ruling Party Rattled by Pension-Reform Crisi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August 5, 2018, <http://www.rferl.org/a/not-so-united-russia-ruling-party-rattled-by-pension-reform-crisis/29413547.html>

俄罗斯 2020 年宪法改革后的首场政治大考，也是 2024 年总统大选前最重要的选举，将决定 2024 年前俄罗斯的基本政治版图。

二是经济上，国内发展出现困境。2020 年新冠肺炎暴发和油价下跌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如图 2 所示，俄罗斯经济在 2019 年已经出现放缓迹象，在国家杜马选举的前一年，俄罗斯 GDP 增长率下跌至-2.7%，衰退水平甚至超过 2015 年，人均 GDP 也出现了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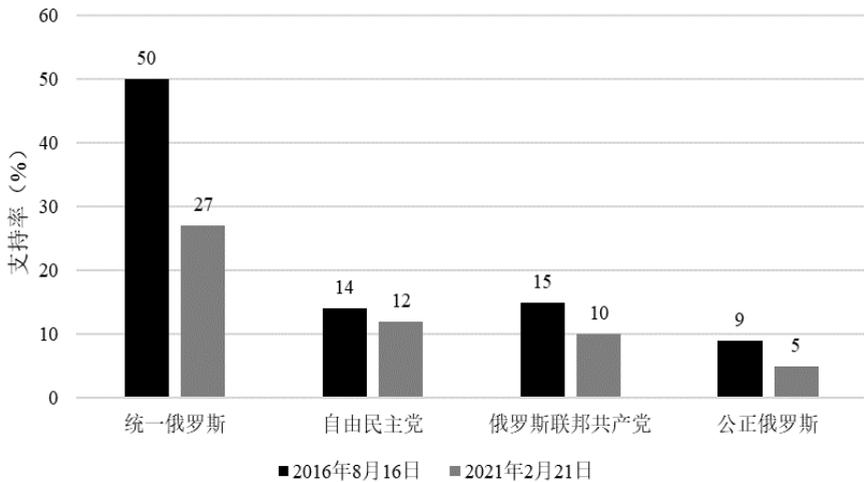


图 4 国家杜马选举前各主要政党民调支持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列瓦达中心 2016、2021 年民调数据自制。^①

三是外交上，外部干涉风险上升。自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态，美国政府两轮更迭也并未对俄美关系有实质性改善。受 2020 年 8 月纳瓦尔内中毒事件影响，俄罗斯同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在美西方支持下，纳瓦尔内阵营开发出一款“智能投票”应用程序，旨在为选民提供最可能击败统俄党候选人的投票建议。该选

^① 2016 年民调数据参见 Levada Center, “Electoral Ratings of Political Parties”, September 20, 2016, <https://www.levada.ru/en/2016/09/20/electoral-ratings-of-political-parties/>; 2021 年民调数据参见 Levada Center, “Electoral Party Ratings”, March 18, 2021, <https://www.levada.ru/en/2021/03/18/electoral-party-ratings/>

举策略在 2019 年地方选举中已发挥作用，导致统俄党损失大量席位。^①

2. 运作策略

第一，国家政权给予统俄党更大力度支持。通过允许在政党选举名单中加入不超过 50% 的非党内成员的最新规定，统俄党加入了大量社会名流为其助选。^②2021 年 6 月 19 日普京出席统俄党党代表大会，亲自提名在俄名望极高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等 5 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领衔统俄党的比例代表制候选人名单。拉夫罗夫和绍伊古在竞选期间竭力摇旗呐喊，为吸引选民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选举结束后立即宣布放弃杜马议员的资格。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陆续向顿巴斯地区居民发放了超 30 万份俄罗斯护照。2021 年 7 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裁定，允许持有俄护照且未在俄永久居住地登记的顿巴斯居民在线投票参与杜马选举。由于顿巴斯地区居民总体支持普京，此举为统俄党提供了重要票仓。^③

第二，利用行政资源打压反对派。针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最直接的举措是当局利用中央选举委员会对 2018 年俄共总统候选人格鲁季宁的持续打压。格鲁季宁对克里姆林宫的批评一向直言不讳，2018 年还被视为最受民众信任的反对派政治家之一，是 2021 年杜马选举的热门人选。2019 年，格鲁季宁被俄共推举接替去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费罗夫的国家杜马议员职位，但遭俄中选委拒绝。^④2021 年 6 月，俄中选委又以隐瞒国外资产为由取消了格鲁季宁的议员候选人资格，这可能导致其政治生涯就此终结。此举引发俄共强烈不满，久加诺夫称之为“非法且非正常的行为”；^⑤久加

① 关于智能投票对削弱统俄党选举优势的研究参见 T. Mikhail, G. Golosov, “Smart enough to make a differenc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efficacy of strategic voting in Russia’s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2021, Vol.37, No.1, pp.65-79.

② 参见庞大鹏：“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折射俄罗斯政治基本特点”，《世界知识》，2021 年第 21 期，第 48 页。

③ See Konstantin Skorkin, “In the Donbass, Russia’s Newest Citizens Prepare to Vote”, *The Moscow Times*,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1/08/27/in-the-donbass-russias-newest-citizens-prepare-to-vote-a74912>

④ See J. Tickle, “Leading Russian Communist politician Grudinin barred from running in election after ex-wife reveals hidden foreign investments”, *RT*, July 26, 2021, <https://www.rt.com/russia/530252-grudinin-hidden-foreign-investments-scandal/>

⑤ See “Who Has Been Banned From Russia’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he Moscow Times*, September 10, 2021,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1/09/10/who-has-been-banned-from-russias-parliamentary-elections-a74848>

诺夫还表示，将投票延长至三天以及引入在线投票的干预措施，“会使得爱国人士多年以来建立的社会稳定性毁于一旦”^①。针对纳瓦尔内等体制外反对派对选举可能造成的干扰，克里姆林宫采取了系列手段，推动莫斯科仲裁法院决定谷歌和 Yandex 屏蔽“智能投票”一词，并禁止访问“智能投票”网站，苹果、谷歌公司分别从其应用商店中下架“智能投票”应用程序。^②

第三，对卫星党进行重组更新。除上文所提及的公正俄罗斯党的合并之外，俄当局根据时局需要创建或改革了新人党（Новые люди）、俄罗斯自由和公正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вободы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绿色替代（Зелён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3月俄罗斯化妆品生产公司 Faberlic 的创始人阿列克谢·涅恰耶夫领导建立的新人党。正如其名称所示，该党对年轻选民具有较强吸引力，同时也是全俄人民阵线的成员，是明确支持普京的卫星党。在2021年杜马选举中成功获得13个席位，一跃成为杜马第五大政党。俄罗斯自由和公正党创建于2012年，原名为俄罗斯社会公正共产党，未参加2016年的杜马选举，2021年改为现名。普遍认为该党与克里姆林宫和统俄党关系密切，通过吸引激进左翼选民来稀释俄共选票。^③

3. 选举结果

从结果看，面对选举前的不利局面，2021年杜马选举总体实现了国家政权的预期目标（详见表3）。统俄党尽管较上届减少了19个席位，但仍然保住了宪法多数席位，实现了对议会的有效掌控。具体观之，比例代表制中统俄党获得50%选票，显著高于选前民调的27%；统俄党在单一席位选举中获得225个席位中的198席，压倒性优势依然明显。受新冠疫情、经济萧条等因素影响，世界范围内左翼思潮和左翼政党出现回潮现象。^④与此相呼应，

① Tom Balmforth, “Communist Leader Asks Putin to Call off Party Crackdown, Voting Reforms”, *Reuters*, Oct. 10, 2021.

② 参见韩显阳：“美国借‘智能投票’干涉俄选举草草收场”，《光明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2版。

③ См. Коммерсантъ. У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ни свободы, н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28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www.kommersant.ru/doc/4793003>

④ 有关近年来全球左翼的评述参见周淼：“百年变局下国际左翼力量的新特征与新动向”，《当代世界》，2022年第5期，第61-66页；王友明：“拉美左翼回潮的特征、成因及影响”，《当代世界》，2022年第1期，第50-55页。

在 2021 年杜马选举中，俄左翼政党整体受益，俄共新增 15 个席位，巩固了杜马第二大党地位，改组后的公正俄罗斯党也新增 4 席，超越自由民主党成为第三大党。右翼政党普遍表现不佳，作为中右的统俄党遭受一定损失，自由民主党遭遇重挫，丧失近一半席位，失去第三大党地位，温和保守的新人党依靠年轻人支持进入杜马。

表 4 2021 年第八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果（仅包括进入杜马政党）

	比例代表		单一席位		总数	
	比例 (%)	席位	比例 (%)	席位	席位	变动
统俄党	49.85	126	45.86	198	324	-19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8.96	48	16.35	9	57	15
公正俄罗斯-爱国者-为了真理	7.44	19	8.78	8	27	4
自由民主党	7.5	19	5.89	2	21	-18
新人党	5.33	13	4.88	0	13	新政党
成长党	0.52	0	0.94	1	1	1
祖国党	0.8	0	1.51	1	1	±0
公民纲领	0.15	0	0.7	1	1	±0
独立候选人			1.18	5	5	4

资料来源：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①

五、总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按照西方学者设想的民主转型的预定轨道发展，而是形成了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混合政体，并在总统长期执政中显示出明显的政治韧性。政党体制是维护该政权政治韧性的重要因素，通过控制国家杜马、统筹协调政治资源等方式，对克里姆林宫掌控政局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历经起起伏伏，从无政党到有政党，从混乱走向有序，俄罗斯政党体制以 2014

① ЦИК России.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осьмого созыва. 19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izbirkom?action=show&root=1&tvd=100100225883177&vm=100100225883172®ion=0&global=1&sub_region=0&prver=0&pronetvd=0&vid=100100225883177&type=242

年修改《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为标志总体稳定下来，建立起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复合型政党体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代表克里姆林宫、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权党，即统俄党；二是有反对党之形而又实质性顺从于克里姆林宫的卫星党，如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三是尽管遭持续削弱但仍保有政党自主性的反对党，目前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只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此外尽管以纳瓦尔内为代表的体制外反对派声量不小，但不成政党，故不在本文框架之内。

从政党类型学来看，这套复合型政党体制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党制，因为其形式上允许许多党竞争性选举存在；更不是多党制，因为其选举高度受控，混合政体下的可控民主特点突出。该体制同霸权型政党体制形式上相似，统俄党“一党独大”，卫星党和反对党也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反对党的法律地位。但二者存在实质性不同，首先统俄党是政权党，与霸权党的核心差异在于政党自主性不足，主要依靠总统的支持生存，在俄政治版图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次，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等大量的卫星党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党，主要由国家政权掌控，政党自主性更为欠缺，相当多的小党甚至没有形式上明确的纲领和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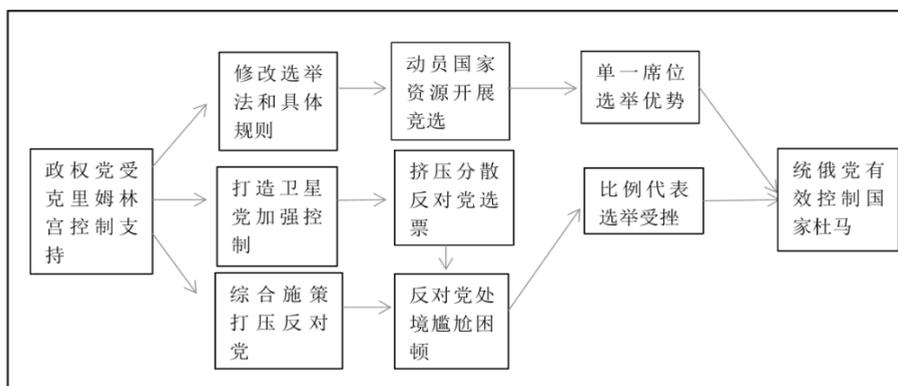


图5 复合型政党体制推动政权党赢得国家杜马选举的逻辑链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功能来看，俄罗斯建立复合型政党体制，其目的是维护俄罗斯政治稳定，特别是巩固总统的执政地位，具体包涵两层含义：从国内看，该体制源

于俄“总统一三权”的二元政治结构，政权党、卫星党均由克里姆林宫创设，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接受行政当局支配，在重要问题上为其保驾护航；从国际层面看，欧亚地区“颜色革命”爆发对该体制的制度性建设有重要影响，通过在选举和其他重大问题上支持策应克里姆林宫，挤压外国插手俄内部事务的空间，为克里姆林宫应对西方对俄进行“颜色革命”、开展反干涉斗争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从因果机制来看，2016、2021 年两次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俄罗斯当前的复合型政党体制，成功因应了俄当下纷繁复杂的政治参与进程，有效确保了总统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达到了其预期目的。第一，附着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权党掌握强大的国家资源，通过提前部署对选举法、选举日期等技术性选举规则朝有利于统俄党方向修改。通过充分调动国家资源为其竞选服务，统俄党在单一议席的选举中几乎囊括了绝大多数席位。第二，行政当局以左右并重、动态调整的方式构建卫星党体系，稀释挤占了反对党的基本盘和选票，为选举带来确定性和稳定性。第三，行政当局采取综合手段压制反对党，同时利用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等偶发事件提升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度，在客观上使统俄党成为最大受惠方，使反对党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同时对体制外反对派进行强力打压，进一步减少了选举的不确定因素。

最后，俄罗斯政党体制的变迁，本质上是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进程仍在发展演变，在俄国内政治参与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未来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从亨廷顿对政治制度化程度的标准来看，俄政权党和卫星党在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四方面均存在明显短板，尤其是自主性的缺乏，将成为制约其政党和政党体制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为俄政治现代化进程增添不确定性。^①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third-wave” democratized countries have not undergone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West’s expected trajectory. Quite a few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hybrid regimes of electoral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18页。

authoritarianism and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with hegemonic party systems, which demonstrated obvious political resilience in political practices. As a maj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wave” countries, Russia has also established a hybrid regime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ts party system is similar to the hegemonic party system but different in essence. To be more accurate, it is a compound party system with “power party, satellite party and oppositional party” as its core. Despite a series of major domestic and foreign challenges, through fully mobilizing resources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hybrid party regime, the Kremlin managed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ongress and has succeeded in securing a constitutional majority for the United Russia in the 2016 and 2021 State Duma elections,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keeping Putin in power and ensuring political stability.

【Key Words】Russia’s Party System, Russia’s Political Resilience, the State Duma, Russian Party’s Autonomy

【Аннота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третьей волны»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целиком не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ожидаемой траекторией Запада, 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установили гибридные режимы в формах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го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а и конкурентного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а с набором гегемонист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ы,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в силь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е. Являясь глав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стран «третьей волны», Россия также установила ряд смешанных режимов с характерны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Её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о форме похожа на гегемонистскую партийную систему, но име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отличия. Точнее говоря, это слож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 ядром которой являются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партии-сателлиты и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парти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ряд серьёзных внутренних и внешних вызовов, благодаря пол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ресурсов и эффективной работе гибридного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ежима Кремлю удалось рациональн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арламент и добиться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для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на выборах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 в 2016 и 2021 годах, что сыграло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правящего статуса путинского режим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партий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责任编辑 崔珩)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2年第5期(总第237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元